

## 编 辑 凡 例

一、本刊编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史料工作的开展。所选载的资料，大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事可能不尽详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刊只在一定范围内作内部发行，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和有关部门的参考。

二、本刊选载的资料，包括从戊戌变法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刊选载的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质疑、补充和订正。

四、本刊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 复 刊 同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敬爱的周总理发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三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闭幕以后，周总理在招待六十岁以上委员的茶会上提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从那时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从一九五九年起，各方面人士积极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写成各种体裁的资料，为我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政协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把收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列为政协主要进行的工作之一，给予我们很大的鼓舞。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根据周总理的号召和指示，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指导下，从一九六〇年起，建立文史资料工作机构，积极开展史料征集工作，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共收到各种类型的史料稿件两千多篇，约一千万字，编印了《湖南文史资料》九辑，在内部发行。由于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历史研究的需要和可以发掘的潜力看，过去征得的资料，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还有很大的差距。现在，为了进一步推动史料征集工作更广泛地开展，促进近代现代史、革命史的研究，我们决定继续编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仍在一定范围内作内部

发行，供历史研究部门和有关方面参考。

根据政协新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过去工作的经验，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着存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搜集、整理、研究和编写文史资料。为使资料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史实和人物等情况，要着重征集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提倡百家争鸣；发现事实有出入的资料，要向有关人员请教，或作必要的调查访问和集体研究。我们殷切希望具有丰富阅历的革命老同志和各界爱国人士，踊跃撰写史料，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同时，希望史学界同志们随时给以帮助和指导，使我们的工作做得较好一些。

当前，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形势发展很快很好，革命团结进一步加强。让我们同心协力，克服困难，发挥革命统一战线的力量和作用，更好地完成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 目 录

### 复刊词

- 黄花岗起义亲历记……………黄一欧 (1)
- 回忆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周武彝 (11)
- 回忆孙中山先生……………肖仲祁 (20)
- 清末留东回忆……………郭之奇 (23)
- 辛亥革命杂忆……………黄一欧 (26)
- 辛亥时期的片断回忆……………李 裕 (52)
- 辛亥革命史事拾零……………刘 蕊 (55)
- 记《血泪书》案与《俚语日报》被封……………马文义 (58)
- 辛亥革命前的女子教育……………许佩琅 (60)
- 宜章辛亥起义回忆……………彭 侃 (65)
- 辛亥衡阳光复经过……………屈子健 (70)
- 郴州辛亥革命始末……………李大梁 (73)
- 回忆辛亥革命前后的醴陵……………李味农 (74)
- 湘潭辛亥革命二三事……………马文仁 (76)
- 辛亥岳州光复见闻……………廖莘耕 (79)
- 辛亥革命后的湘西……………戴季韬 (83)

|                     |          |
|---------------------|----------|
| 黄克强游美休养见闻·····      | 黎照寰(86)  |
| 蔡锷轶事·····           | 杨思义(92)  |
| 蔡松坡在日本·····         | 陈新宪(94)  |
| 记宋教仁·····           | 陈楚涛(96)  |
| 关于祖父宋教仁的几件事·····    | 史奇璋(101) |
| ○我所知道的谭人凤·····      | 邹协勋(104) |
| ○禹之谟革命事迹补述·····     | 宁纯宦(114) |
| 记蒋翊武之死·····         | 万武(117)  |
| 仇亮事迹·····           | 胡达(119)  |
| 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      | 刘安鼎(122) |
| 龙璋事略·····           | 龙伯坚(131) |
| 回忆我的父亲陈强·····       | 陈克难(134) |
| 谭延闿的生平·····         | 阎幼甫(139) |
| <br>孙中山、黄兴来往书信····· | (151)    |
| 黄兴诗、词、联选·····       | (161)    |
| 凌容众东游日记·····        | (171)    |
| 陈嘉会日记摘抄·····        | (177)    |
| <br>湖南辛亥革命书录·····   | 刘志盛(192) |

## 编 后 记

# 黄花岗起义亲历记

黄一欧

## (一)新军起义失败

辛亥（一九一一年）农历三月二十九广州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集中全力，拼死决战，不计成败利钝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筹备最久，影响也最深远。

在这之前，一九一〇年农历春节，广州新军起义。因事前缺乏周密准备，临时发动，孤立无援，结果归于失败，倪映典等不幸牺牲了。这次新军起义，是由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的。先君克强先生于春节前不久自东京到香港，加强对南方支部的领导，主持起义筹备工作。到港后，发现人力、物力都很欠缺，于是写信给在东京的宫崎寅藏，告以革命军不日大起，人材缺乏，请他赶快召集各种军事人才（我猜想先君指的是日本退伍军人）前往香港助援。信中并要宫崎寅藏通知我先期去港，准备参加起义。我那时正在东京东斌学校学习，得到宫崎寅藏转告先君来信后，立即同定平伍一（日本退职炮兵大尉）一道束装启程。临走时，带去宫崎寅藏给先君的复信。记得到香港已是春节过后，新军起义以失败告终，在香港呆了个把月，空跑一趟，无所作为。先君看到这一情况，要我暂回东京等待时机。临行前，交我一封给宫崎寅藏的信，谈到新军起义致败的经过。并说今后人心更加奋发，

一有机会，即再举动，可望成功。

我在香港逗留期间，曾听到先君以及其他入谈起这次新军起义致败的经过：原先，同盟会在广州新军中发展组织很顺利，士兵群众的反清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同盟会还派人去惠州运动会党响应起义。又策动广州附近的民军准备入城支援，在巡防营旧军里面也做了工作。南方支部估计大举起义的时机已到。于是一面打电报给在美国的中山先生，请他赶快筹款接济；一面电邀先君和赵声等来港主持一切。不料在农历除夕晚上，有两名新军士兵到广州城隍庙前一家刻字店刻印名片，与店主发生口角。过路巡警出面干涉，新军不听，军警相互殴打，巡警吹警笛集众，抓走新军拘留于警署，新军包围警署要人，冲突愈演愈烈。局面十分严重。倪映典匆忙去香港和先君、赵声商量，决定提前起义。当他于庚戌正月初二从香港回到广州的时候，清廷调动水师和巡防营，计划镇压新军，新军士兵也磨拳擦掌准备干起来，倪映典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只好挺身而出领导起义，不幸在战斗中中弹阵亡，一时指挥无人，又无后援，就仓皇败退了。先君对这次起义失败感到痛心，但并不灰心，在谈话中常对同志说：“不要紧，慢慢细细再来！”

## (二) 檳榔嶼会议与香港统筹部

新军起义失败后，中山先生在美国接连发电报、写信给先君，提议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四月初五，先君在致中山先生信中，陈述选择广州再次发难的具体意见。十月间，中山先生在英属檳榔嶼召开秘密会议，先君应召由香港赴会，到会的还有赵声、邓泽如、孙眉以及南洋群岛各地和国内东南各省的代表。会上，决定积极筹募巨款，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并计划占领广州后，

山先君率一军出湖南，下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这是因为考虑到先君过去在湖南创办华兴会，有些群众基础；赵声曾任江宁督练公所参谋官、三十三标标统，与新军感情融洽，时机一到，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事可大定。槟榔屿会议在中山先生亲自主持下召开，可算是黄花岗起义的前奏。会后，先君同胡汉民、邓泽如等分赴南洋群岛各埠华侨中募款，年底回到香港，在跑马地三十五号成立统筹部，先君任部长，赵声付之，统筹部分设调度、储备、交通、秘书、编辑、出纳、调查、总务八课，课设课长，并分派专人去广州发动新军、巡防营及警察，联络番禺、南海、顺德、惠州等地会党和绿林豪杰。

香港统筹部成立后，东京同盟会本部的活动顿见活跃。起义需要储备军火，而华侨捐款已陆续寄到，有了买军火的钱，于是，统筹部派遣同志出去购运枪支弹药。在当时情况下，采购军火不容易，买到手后秘密运到香港更困难。辛亥年春，我仍在东京东斌学校读书，寄居宫崎寅藏家里，也参与了购运军火的活动。约在农历正月底，通过宫崎寅藏的内弟前田九二四郎的介绍，向日本人仓地铃吉买到一批枪弹，买到之后又要我负责运往香港。我冒充宫崎龙介（宫崎寅藏长子），穿的和服，讲一口日语，同住在宫崎家里的日本浪人龟井一郎一道，将几十支手枪和万多发子弹装在四口皮箱内，搭一艘外国邮船运到香港，交给了统筹部。这个冒充日本人化名运军火的主意，是前田九二四郎想出来而为宫崎寅藏所认可的。在香港替统筹部接收这批军火的，是广东人阿信，矮小个子，他的名字我记不起了。

我在统筹部见到了先君，他见这批枪弹平安运到了，很是高兴。统筹部租的房子，是一栋两层的公馆式房屋，我当晚就住在这里，同先君谈到深夜。他问到我在东京的读书和生活情况，同

盟会东京本部的活动，以及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日本朋友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在统筹部住了几天，先君要我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房子在山腰中间，要坐吊车上，具体地名记不起了）。因为统筹部忙于策划起义，每天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他们有的是来参加发难的“选锋”（敢死队），有的运送枪支弹药，也有领捐册送捐款的，统筹部各课人员，并没有都住在机关内，但是每天来找先君研究问题的却不少。外来人员中以福建人居多，湖南人也不少，我碰见过李壁和、谭人凤等多人，李壁和那时在荷属帮甲岛以教书为掩护，搞光复会的活动，同他一起来港的还有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梁等。

当时，在香港本地买军火是比较困难的，英国人深怕推翻它的殖民地政府，查得很严。为筹备起义而购买武器，主要来源靠日本。有一次，统筹部分配我同阿雷去接应一批军火上岸，这批军火是湖南留日学生周来苏押运来的。我们乘汽艇出海，靠拢周所乘的海轮美国总统号，好不容易在船上找到了他。周来苏十分尴尬地细声告诉我，一百多支手枪和几千发子弹，都被他丢到海里去了，身边一无所有。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香港是个自由港，不征入口税，轮船靠岸向不检查行李。有一天，洪承点看到上海金山船到港时却经过检查，他马上报告先君，先君便通知在东京发付军火的吴永珊（玉章）注意。吴于是派人赶到神户去，把周的船票换为头等仓位，因为头等仓的旅客不检查行李，而军火都是装作行李运送的。谁知周来苏胆小如鼠，怕得要死，在途中竟把所运的枪弹全部丢到海中。先君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气愤，埋怨周来苏太不沉着了。周来苏从此得到一个“周丢海”的绰号，在党人中声名狼藉，辛亥革命以后，也没有什么作为。

另外还接运过两次军火。一次是王子骞、陈可钧、曾宝森三

人，乘坐一艘德国的大海轮，从日本押运一批军火到了香港。统筹部得讯后，派我和洪承点乘小火轮去接。王子骞等把军火交给我们，平安地完成了护送任务，他们在统筹部见了先君，要求留下来参加起义。先君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后因一再改期发难，没有来得及赶上参加。王子骞是四川人，说得一口纯熟的日本话。事有凑巧，辛亥上海光复后成立沪军先锋队（一称沪军），洪承点和我任正、付司令，王子骞在司令部任一等参谋。另一次是同赵声之弟赵光（绰号“赵三麻子”）去接运上岸的，没有发生问题。

### （三）在巡警教练所

我在香港呆了二十来天，有一天，党人龚敬夫从他的亲戚那里打听到巡警教练所有几名缺额可补，先君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进去以后，既可以借巡警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做些发难必需的准备工作，又可以联络同志，发展组织，团结爱国志士，一旦发难，可为内应。于是决定，派我和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梁四个人去广州应考。我们四个人中，以陈方度的年岁较大，阅历较深。先君在我们动身去广州时当面交代，此去关系将来起义前途。一要戒骄戒躁，谦虚待人，好好联络同志，扩大影响，二要听从陈方度的调度，四个人步骤一致，不要各搞一套，把力量分散了。我们到达广州后，马上去报名应考，可能是由于我在东京受过一些体育训练，陈方度他们在荷属南洋中华学校当教员，都有些基础知识，结果都考取了。但是巡警教练所规定新学员进所要有保证人，我们一时又找不到适合的人作保，延至三月初，才由周达夫（同盟会员，湘阴人，时任广州西关警察署长）、张通典（湘乡人，时任广东省巡警道衙门文案师爷，后在南京临时总统府任秘书）作保证人，办好进所手续。他们每人保两个人，周达夫担保我和

胡国梁，因为胡也是湘阴人；张通典担保陈方度、柳聘农，因为陈是湘乡人。

当时教练所有学员两百多人，分编两个队。我和柳聘农编在第一队，队官林某，广东人；陈方度、胡国梁编在第二队。学员每人发给步枪一支，有的是毛瑟枪，也有汉阳造，种类很杂。最初每人发子弹二十排，计一百发；自温生财刺毙李瑞事件发生后，外间风声很紧，巡警道衙门下令收缴子弹，开始缴八十发，留二十发，后来连这二十发也收去了，只有队官平日信得过的极少数人，每人留五发子弹，准备应付非常事变。

我们进了教练所，最初感到陌生，慢慢就和同学们搞熟了，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同学中间暗地进行关于反清革命的宣传工作，有时还送些同盟会的宣传革命的书报给同学们，一篇到手，竞相传阅，很能收些潜移默化之效；二是替在广州设立的秘密机关运输枪支弹药。当时为起义而临时设立的秘密机关有三十多处，我们身穿巡警制服，手夹包袱，包袱内藏着手枪和子弹，送到指定的秘密机关。农历三月间的广州，气候已很暖和，我们夹着沉重的包袱，提心吊胆地穿街过巷，送到目的地常常是满身大汗了。虽然大家都是初到广州，语言难懂，路途不熟，因有本地人作向导，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

这次广州起义，最初计划分十路进攻，临时改为四路，其中第三路是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就是考虑到有我们在，可以内应外合，配合行动。

#### (四)三月二十九之役

辛亥三月初十，统筹部在香港跑马地召开重要会议，会议认为，人力物力大致准备就绪，起义时机已经成熟，预定十五日在

广州发难，推举赵声与先君为发难的正、付总指挥。后因美洲及荷属南洋募款未到齐，温生财刺毙孚琦后广州清军戒备森严，想等他们防备稍松，加之后来苏运枪弹出了问题，等等原因，不能如期发难，决定展期到二十九。二十五日，先君从香港动身到广州，临走前，给南洋华侨同志邓泽如和李源水等分别写了绝笔书。致邓泽如书云，“事冗，未获时通音问，罪甚罪甚。本日亲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致李源水等四人书云，“事冗，无暇通候，罪过罪过。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两书落款处盖的两颗印章是“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之使者”和“灭此朝食”。到广州后，设秘密机关部于越华街小东营五号，将原定的十路进攻计划改为四路，以适应新的情况。规定我们在教练所内组织力量，策应陈炯明的进攻。先君向陈方度作了交代，并每人发给手枪一支，以便举事。

二十九这天上午，陈方度去机关部有所接洽；午后两点，我们一起去见所长夏寿华（号思痛，益阳人），陈方度对他讲了几句客套，就大谈反清革命的道理，并把手枪显出来说：“我们就是革命党，今天下午五点半钟就要发难了”。夏寿华闻变不惊，态度从容，他对我们说了一番同情革命的话，并吩咐当差的去弄几碟下酒的菜，硬要留我们喝一杯酒。这时候，陈方度对我使个眼色，叫我跟着当差的到厨房里去，我马上领会到他的意思：出厨房后门不远就是巡警道衙门，如果当差的出去告密，那就性命难保了。等到下酒的菜肴准备好了，送到夏寿华的签押房，我们有克制地喝了一点酒，就赶往机关部听取最后指示，以便相机行动。我们一进机关部，就看到挤满了人，先君正在发布号令，人人整装待发，他没有和我们多讲什么话，只交代要赶快回到所里去，准备响应起义。于是，我们二话没说，又匆忙跑回教练所，等待陈炯

明带人从外面进攻，我们作内应，一举占领之。我们在五点过后回到教练所，许久不见动静。大家心里干着急，但是势单力薄，又不敢随便轻举妄动，怕因小失大，影响全局。看看天色已晚，外面仍无动静，大家非常失望，感到怀疑、震惊。后来才知道，陈炯明对这次大举起义缺乏信心，认为攻打教练所必然失败，即全局也难成功。他不想如期行动，主张改期发难。当天下午，他告诉谭人凤，只集合了七八十人，并说先君掌握的人数也不满百，胡毅生、姚雨平都没准备好，绝不可贸然发动。他极力怂恿谭去小东营劝阻先君，谭人凤到小东营机关部，见劝阻不成，整装向先君要枪，先君给枪一支，他误触枪机走了火，先君连声说：“先生不行，先生不行！”随即派人护送谭回陈炯明的住处。谭人凤回到陈的住处，只见有人拿着锁准备锁门，原来陈炯明在临起义时背信弃义，作了可耻的逃兵。熊克武后来回忆说，他在这天下午进南门时，遇见陈炯明匆匆地出城，还以为陈是负有特别任务出去的呢。

这次广州起义，临时由原定的十路改为四路进攻，结果姚雨平在枪支短缺的情况下故意要枪五百支，存心刁难先君，起义发动后又藏着不敢出来，陈炯明担任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负责守大南门，他们都于起义前逃出了广州城。先君当时不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带了几十个人直攻督署，孤军冒险前进，最后招致失败，牺牲惨重，丛葬于黄花岗的革命先烈，有姓名可考的就有七十二人（据近人考证，已有八十余人）。

起义的当天晚上，城门被清兵及巡警关闭，任何人不准出城，路上行人绝迹，军警挨户搜查革命党人，见到形迹可疑的人就揪住盘问，特别对没有辫子的和操外省口音的，盘查得更严。外间谣言，张鸣岐悬赏捉拿没辫子的革命党，每个赏洋五百元。但恁

辛、熊克武等几个四川同志，跟俞云纪一道，从后门进攻总督衙门，失败后逃到城墙边芦苇丛中，第二天天亮时被巡逻清兵逮住了。但懋辛没有辫子，断定他是革命党，被关下狱，押解回籍，直到武昌起义后方释放出来。熊克武因还留有辫子，在老百姓的掩护下脱险了。

我在这次起义失败后的混乱中，只身跑到西关的周达夫家里躲起来。其时街上有巡逻队，在西关还驻扎有商团，他们是站在军警一边的。我头上没有辫子，又不能讲广东话，实在危险得很。因此，过了三四天戒严稍松时，便跑到香港去了。到香港后，住在湾仔日本医生三崎家里。这时向同志中打听，才知道先君已经先到两三天，并已动了手术，正在养伤。我找到了先君，父子相逢，死里逃生，真有隔世之感。先君当时的情绪很消沉，很少说话，也不愿见客，对这次起义损失惨重感到非常痛心。

关于广州三二九之役，有许多人写过回忆录，我看过的不多。最近从解放后出版的一本辛亥革命资料上，看到了胡国梁过去所写的《辛亥广州起义别纪》一文，觉得他有些叙述，跟事实大有出入。如谈到进巡警教练所当学员的，只有他和我以及柳聘农，竟没有提到一起进去的陈方度。陈是起骨干作用的局中人，而在胡国梁笔下却变成了向我们通风报信的局外人了。当天下午预定发难的关键时刻，我们四个人都在巡警教练所，一起去见夏寿华，一起去小东营机关部，又一起跑回来等待陈炯明的进攻，而在这篇文章中，胡国梁却说，“黄克强带领了我和林时爽等这些同志一直向制台衙门冲入”。举这两个例子，可概其余。胡国梁还说起义失败后张鸣岐曾悬赏一万元捉拿他，我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从他当时的地位和起义中的表现看，张鸣岐不会出这么高的赏格，这是可以情理推测的。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在起义中牺牲的烈士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他们的鲜血是没有白流的。这次起义，震撼了清朝的统治基础，随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爆发了武昌起义，各省先后反正，从而结束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封建统治。辛亥秋，先君填了《蝶恋花》词一首，表达他对黄花岗诸烈士的深切怀念。

六十七年前的黄花岗起义，事败垂成，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皇帝，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才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 回忆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

周武彝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年农历八月十九）爆发的武昌起义，是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中国同盟会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中最后的一次，是以新军为主力发动起义，一举成功的。这次起义爆发，隔黄花岗起义不到半年，是辛亥革命全面爆发的火炬，写下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今年是武昌起义六十七周年。作为当年参与起义的一名战士，我愿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写述出来。

## 一、武昌起义前陆军中学的动态

一九〇七年，清廷陆军部通令各省设立陆军小学堂，湖北陆军小学堂的校址在武昌阅马厂紫阳湖边。按照清廷陆军部规定，陆军小学每期招收学生一百二十人，学习时间三年，毕业后升入陆军中学。最初与湖北陆军小学同时存在的，还有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这所陆小是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从驻湖北新军中挑选优秀士兵入学的。除步科外，并附设测绘、军医等班。湖北原打算从这所陆小的毕业生中择优选进陆军中学。后因陆军部批驳不准，只好另办一所陆军小学堂，招收普通文学堂学生入学。而将原有的这所陆小加上“特别”二字，称为湖北特别陆军小学堂，与新办的湖北陆军小学堂同时并存（不久停办）。陆军特别小学的

学生一般年龄较大，有的过去中过秀才。平均年龄二十四五岁，大的有三十来岁。当时社会上流行这么一句话：“学堂特别小，学生特别老”，即指他们而言。

我的老家在湖北广济。青年时考取黄州府中学堂，因开学太迟没有去，跑到省会武昌，进了昙华林一所工业中学堂。在这里读了半年，暑期中，湖北陆军小学堂招生，我又考进了陆小，改行学习军事。

清廷在通令各省设立陆军小学的同时，规定在全国开办四所陆军中学堂。在开办陆军中学堂之前，清廷陆军部就在北京创办陆军师范学堂，为陆军中学培训师资。随后在北京（清河）、武昌、南京分设陆军第一、第三、第四中学堂。陆军第二中学堂原定设在西安，因经费未领到，校舍未盖起，迟迟不能开办。

陆军第三中学堂设在武昌中和门外的南湖，于一九〇九年开办。原规定只收录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五个省陆军小学堂的毕业生，后因西安陆军第二中学堂未开办，又将陕西、甘肃两省陆军小学的毕业生拨来，加上荆州驻防的旗籍子弟四十多人，总共七百多人。学生年龄最大的二十五六岁，陕甘人居多，最小的二十岁左右。我出生于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一九一〇年元月，在湖北陆军小学堂还未毕业，适逢陆军第三中学堂招生，又提前进了陆军中学，当时还未满二十二岁。

那时，陆军第三中学刚开办不久，总办李钟岳，广东人。教员多系北京陆军师范毕业生，一般学识优良，循循善诱。但也有例外，如后来当过安徽督军的陈调元，那时就是由陆师毕业来教兵要地理的，他夸夸其谈，爱吹牛皮，给学生的印象极坏。全部学生分编四个队，我编在第四队。队长相当于连长，以下分排，每队四个排。四队队长是个北方人，姓名记不起来了。同队同学

能记起来的有：雷洪，湖南桂阳州人。他很会说话，日里夜里讲个不停。耿丹，湖北老同盟会员耿伯钊之弟。他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刘佐龙部政治部主任，被刘杀害了。刘文岛，湖北武穴人，他和耿丹过去都与我在湖北陆小同学，后来因善于逢迎蒋介石，当过国民党驻意大利大使。席正铭，贵州同学中的领袖人物，当时年已二十五六岁，很有办事能力。武昌起义前夕，代表陆中同学跟各方面取联系、传消息的，多半是他和雷洪两人。同学中后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居要职的，还有贵州邓汉祥，广西李品仙，湖南龚浩、戴岳，湖北晏勋甫等人。其中和我交往密切的是龚浩，号孟希，益阳人。他于解放前夕逃往海外，据说现尚健在，我希望他能够争取回到大陆，过好晚年。

武昌起义之前，陆中各省同学，有些地域观念，各自成立一些小团体，总的倾向是进步的。如湖南同学戴岳、黄维汉、杨南村、江鹏等，组成撼怀诗社，他们名为研究古典文学，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借吟诗填词联系同学，暗中进行反清宣传。戴、黄等人后来加入了文学社，对外仍然保存这个小团体名义，以掩人耳目，便于活动。也有打破省界观念的，如席正铭、耿丹、雷洪、刘文岛等组成的竞存社等团体。当时陆中学生会中加入文学社的不少，也有参加共进会的。从表面看还算平静，实际上平静中有不平静。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同盟会出版的《民报》，湖北留日学生办的《汉声》等，这类革命理论书刊，大家暗中传递，争相阅读，革命情绪十分激昂。记得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学堂后，大家悲忿填膺，奔走相告。某天晚上自习时，有人一声吆喝，喊要剪辫子。首先是雷洪剪掉了，喜形于色。接着你替我剪，我剪你的，除少部分荆州来的旗籍学生外，大家都把盘在头顶的辫子解开剪掉了，动作非常之快。第二天，

总办李钟岳集合全体学生在操场训斥，命令剪了辮子的学生所蓄起来。以后有些人留了一点点，扎个象羊尾巴的小辮子，有的头发蓄得寸把长，怒发冲冠；不管怎样，反正戴了军帽看不见，容易敷衍过去。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但也当然看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就在这个时候，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四川、湖北、湖南等省人民群起反对，而以四川闹得最凶，一发不可收拾。九月二十四日以后，熊正铭、雷洪均加入了文学社，其连合的同学即宣传组织关的起义计划和日期；这些听者传达的又各自向本省同学宣传关的若暗中联络，扩大力量，准备响应起义。连日来，消息纷传，众口不一。十月九日晚上，小铁棍机关部被破坏，二三人被捕，其中一人因伤势被捕，翌日上午被军械残酷杀害，并割下其头颅，悬挂在城上示众。我们当时不知道，事后看到照片，满座同学都带情绪。

## 二、参加起义经过

十月十一日上午七点多钟，我们正在自习室温习功课，隐约听到城内有炮声，大家不以为意，以为是伙队夜间举行夜间演习。排长的哨声，已解释时，大家信以为真，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下午一点，四里官寮就寝，炮灯号一吹，大家睡了下来，没有什么动静。这时，仍常听到城内稀稀落落的炮声，但并不知道是新军发炮进攻了。

二十一漏城协的炮队营房，就在我们文学社后面，相隔只有里把路。这天半夜三更，忽然听到一声炮响，炮口从炮队那边打过来，是一发山炮弹，不是野炮弹，在空中划，同刷作响。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决不是夜间演习，而是发生了意外事

作。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把衣服穿好了，三三两两在一起议论。随即听到紧急集合号，总值日官以及队上官长一起出动，叫喊下集合。于是，把我们带到学堂外面的打靶场。大家在地上蹲了几个钟头，鸦雀无声，坐以待旦。到天亮之后，才回去吃早饭。早饭过后不久，大约八点钟，忽然而城内跑来一个老兵，他刚刚换季，穿的呢子军衣，进大门时，手里举着黎元洪的大红名片，高声地呼喊：“我们起义了，黎都督请先生们一起进城革命。”黎元洪是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平日颇得军心，为人有谨慎之称。过去在湖北陆军小学时，他要我们看秋操，饭后亲自来送酒，大家素来对他有好印象，表示拥护他。老兵一宣布起义消息，同学们马上踊跃起来，向他了解情况，同舍聚而不休，人人兴高采烈。有的自动集合到操场，在院子里等待集合，有些人三五成群，议论开来。这时，原哨长才出现在阳台上，大声叫道：“同学们快出来集合，一拥而上，跟我一起去。”但是他只开喊喊而已，并未走下操场。

当时每队有一两个助教，他们都是从老兵中挑选出来的，人人都带指挥刀，象个官长样子，平素跟学生比较接近。次晨集合时，助教刘国祥、易正柏、孙国标、黄友等都出来了，加入我们的队伍。同学中的积极分子雷洪、耿丹、席正信、汪秉乾、任培英等来回奔跑，通知大家赶快带枪集合。平日威风凛凛的队长，连长，这时候一个也不见了。虽然只有几个助教和学生中的几个积极分子在场，没有队长、排长带队，可是队伍很快就集合好了，大家充满同仇敌忾的情绪。荆州来的几十个旗籍同学，也站到队伍里来了。

我们的队伍刚走出校门不远，四队排长李温珩（号韵冰，湖南宁乡人。后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从后面匆忙地赶上来，要求参加队伍一起进城。他平日跟我们的关系处得不错，是队上官长中唯一参加起义队伍的，其余官长都开小差或逃，无影无踪了。大家对李很

珩的加入表示欢迎，并推他担任临时带队官。他讲了几句客套话之后欣然同意了，手握指挥刀，率领队伍前进。在行进中，没有一个掉队的，虽然有枪无子弹，可是兵以义动，有恃而无恐。沿途碰到好几个骑马传令的老兵，老百姓照常挑东西进城，并无惊慌表现。队伍由中和门进城时，守卫在城楼上的新军士兵，吹号欢迎，热烈鼓掌。进城后看到街道两旁好些地方倒有死尸，原来这一带住的多是旗人，可能是在混乱中被激于民族义忿的起义军战士杀死的。我们首先赶到军械库领子弹，沿路看到的店铺住户，十之八九关门闭户，街边上随地发现尸体，路上行人稀少，和在城外所见迥然不同。在楚望台军械库领了子弹，守卫在军械库的一位军官通知我们：“制台衙门里的清军还在顽抗，攻不下来，你们赶快前往协助进攻。”李勰珩、雷洪等二话没说，就率领荷枪实弹的这支大队伍，向制台衙门挺进。正当战事相持不下、人心浮动的时候，我们穿街而过，声势为之一振。还没有赶到制台衙门，半路上就有人骑马飞奔前来传令说，制台衙门已经攻下了，大家赶快开往蛇山接防。于是我们又往蛇山接防，固守阵地，保卫咨议局。在蛇山阵地上守了一天，敌军没有大举进攻，我军居高临下，认真守卫。夜间曾有小部敌军向我阵地袭击，经过一番战斗，就把他们打退了。

军政府成立后，黎元洪被举为都督。都督以下，最初由蔡济民、邓玉麟、张廷辅、王宪章等组织谋略处，处理一切军政事宜。后将谋略处改为参谋部，以杨开甲为部长，王宪章、吴兆麟付之。孙武为军务部长，蔡绍忠付之。孙因起、前夕炸伤，未能任事，推张振武为付部长代行部务。张是湖北竹山县人，教员出身，曾加入共进会。他在担任军务部付部长期间，湖北新军扩充几倍，曾亲携库银几万两往上海采购军械弹药，供护军用。我当时在军

务部任军事检查员，被派押运库银工作。这批银子分装在几辆辆重车上，由武昌下新河渡江，送到汉口俄租界道胜银行划拨汇单。张曾要我同往上海去采购军火，我因另有任务待完成，没有答应。他为人刚愎自用，首义后骤居高位，有些忘乎所以，气焰相当嚣张，开口就骂：“妈的！我枪毙你！”连黎元洪都很怕他，感到是个威胁。他在沪采购军火时，挥霍浪费，还专门请个印度巡捕守门，同志间对他都不满意。张振武在个人作风和生活方面虽有某些缺点，但他在武昌起义中是有贡献的，因此招黎元洪之忌，必欲去之而后快。方维当时任湖北将校团少将团长，实际上是带了几十个老兵，替张振武作侍卫长。一九一二年八月，黎元洪假手于袁世凯，将张振武、方维两人杀害于北京。袁、黎合谋，擅杀起义有功人员，国民党通电严词谴责，黄兴因此推迟去京与袁会晤。袁世凯只好似惺惺地在北京为张、方举行追悼会，其时我已进了保定军官学校，因事正在北京，也去参加了。这是后话。

湖北陆军第三中学的学生，在武昌起义以后，一部分调到军务部、参谋部工作，大部分继续担任都督府的警卫事宜，并负责保护官钱局、造币厂、藩库等财政金融机关。同时成立宣传小分队，进行街头宣传，揭露清廷专制统治的罪恶，呼吁群众拥护共和，剪掉辫子，顺应潮流。这种街头宣传，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有些同学则调到新成立的部队中去任职，如在学生军三营当管带的余式谷（号子祥，武昌县人），就是陆中學生，学生军的连长，清一色是陆中學生。排长一般都是陆小学生。此外，过去湖北特别陆军小学堂毕业生，因为年岁较大，经验较多，起义后参加实际工作的很多，他们大多数在新成立的部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这是因为在武昌起义以后，军政府成立编练处，黎元洪以都督名义出告示，大肆招募军队。据胡祖舜一九四七年著《武昌开国实

录》一书中载，起义不到一星期，就编成步队八协，每协两标，共十六标；炮队三营；马队、工程队、辎重队各两营。此外，还有宪兵队、水师等等。骤然扩军，到处需人，稍具军事阅历的，都调去充任下级军官了。

军队的番号虽有这么多，但都是招兵买马临时凑合起来的，战斗力不强，纪律也很废弛。因此，战局一再失利。十月二十八日，正当前线紧急之际，黄兴由上海乘轮船到达武汉，旋即赴都督府与黎元洪会晤。黎闻黄兴到后，即下令做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马在武昌城内和汉口没有被清军攻陷的地方跑一圈。前线将士听到黄兴来了，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黎元洪挑选各机关部队的老练官兵及学生之告奋勇者千余人，归黄兴率领即晚渡江，设总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与清军鏖战。耿丹这时候调到黄的总司令部任参谋，另外一些同学则调任总司令部的督战官。大家的职务虽有不同，待遇并无区别，一律月支生活费二十元，类似供给制，谁也没有怨言。

黄兴到达武汉的第三天，即十月三十日晚上，在都督府前面的广场上，对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和由南京来的陆军第四中学（蒋光鼐、陈果夫、李章达等数十人）学生发表演说。两学堂听讲学生共约四百人（许多人在前线或有工作未参加，故只到此数），黄兴身材魁梧，态度安详，讲话时慷慨激昂，声如洪钟，确是大将风度。他首先赞许我们参加起义，著有功绩，并针对有人表示参加起义是为了当官的思想倾向，语重心长地告诫说：“你们将来都是国家的干城之选，前途不可限量。现在革命事业迫切需要人材，我保证决不把你们当一兵一卒之用。”黄兴在讲话完毕举手回礼时，右手仅有三个手指，大家感到很奇怪。因为那时候并不知道

他在黄花冈起义战斗中打伤两指，后在香港动手术截掉了。

十一月三日，黎元洪在阅马厂筑一将台，隆重举行“登台拜将”仪式。是日秋高气爽，将台中央树大旗一面，上绣“战时总司令黄”六个大字。各机关团体部队官兵都列队肃立。首先黎元洪登台讲话，极力称赞黄兴献身革命，屡经战阵，指挥若定，卓著功勋，特举为战时总司令。凡我将士，均应听其指挥调遣。语毕，请黄兴登台，黎亲将印信、委任状、令箭等授与黄兴亲收，全场高呼万岁，欢声雷动。黄兴当众演说，略谓：“兄弟有三点意见与我同胞共勉：第一须努力，请兵拼死与我对敌，我若稍存畏缩，敌即攻入我心腹。临战时必须努力，后退者斩首示众。第二须服从军纪。纪律非绝对服从不可，倘不服从，命令何能贯彻执行。今后无论如何危险，皆须服从军纪，不得借故规避。第三须协同。若各存意见，互相磨擦，无论条件如何好，都不能成大事。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前车之鉴。”黄兴面色黧黑，神态威武，演说时声音洪亮，情绪慨慷激昂。讲毕下台后，乘马巡视全场一周，士兵举枪致敬，他在马上频频举手答礼。最后，由黎元洪陪同返回都督府。

在这次武昌起义中，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汉阳战事十分危急时，黄兴下令组织敢死队，由他亲自率领渡江作战。这支敢死队主要是以我们陆军中学学生为骨干组成的，我也参加了。每个队员身上斜披一条红布带，就象旧军队中的值星带一样，上写“敢死队”三个字。我们到达汉阳以后，虽未能扭转战局，对于安定人心、鼓舞士气，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武昌起义，风云变幻，可记者多。我自起义到翌年春进保定军校前，都在武汉服役，见闻也不少。事隔六十七年，年老记忆力差，这里写出来的，只是一些片断。

# 回忆孙中山先生

肖仲祁

我于前清光绪癸卯乡举后，经湘抚赵尔巽派赴日本学习法政，翌年甲辰到东京<sup>①</sup>，当时思想陈腐，言行循谨。适见日人战胜帝俄，骄器自大，侮辱吾国人士，愤气满胸。越年乙巳孙中山先生到日京，阳历八月十三日，留日学生在麹町区富士见楼开欢迎大会，我亦参加，躬逢其盛。会后旬日，有长沙陶梦蛟寓九段中坂，延中山先生到其寓楼，约我与四川周先登、长沙何维道、平江李积芳（皆法政同学）在小房内席地坐。中山先生长跪拱手，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会纲。我们集体加盟，宣誓遵守。我用肖锡龄名号，尔时心理幼稚，意尚怀疑。旋有皖南程家桢，肄业农科大学，锐志革命，约我与贵州复同和、湘乡胡子清等（亦法政同学）到两国桥酒家，与宫崎寅藏等会谈，中山先生也在坐，词意慷慨，合座感动。中山先生以大胆进步勉吾辈云：“我倡议革命多年，曾偶有挫失，地方官吏士绅，不但不敢捕拿，并不愿举报，以报捕不获，反受斥责，故相率掩饰。诸君要看清形势，除掉恐怖心，乃有进步的希望。”可惜

---

<sup>①</sup>据湘潭朱师晦的《癸卯日记》卷首载：“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为日本之行，……同行者为……湘乡二人：陈玉林（尔锡）、肖遵衡（仲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一点钟抵横滨，晚至东京”。作者回忆则为“翌年甲辰到东京”。

——编者注

吾辈因循，陶梦蛟等四人亦少能力，先后回国遁去；我则自首无成，愧怍至今。

一九〇五年冬，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要求，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条文激切，学界愤怒反对，回国者二百余人，陈天华愤而蹈海自杀。秋瑾、宋教仁、田桐等发起在清风亭开会抵抗多次，我亦参加。又与杜昆五、张溥泉等在锦辉馆反对梁启超（卓如）演讲君主立宪，大加棒责，梁启超逃跑。此皆中山先生革命学说感动致然。

日俄战后，日人竭力经营满洲，清廷任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我与先兄鸿钧（号诗荪，壬寅科举人）奉调赴东，佐助新政，未能随中山先生同谋革命。直到一九一七年随谭延闿（组安）到广州，寓广泰楼，始与中山先生再会。我因谭组安急回永州驱逐张敬尧，谋湘省治安，只能与先生匆匆晤语。是时，先生正与陆荣廷、莫荣新失和，意欲组安调停其间。我与张子武<sup>①</sup>力赞之。组安尔时怀疑先生，有“孙大炮”三个字横梗在心，不愿参加。失此机会，故返湘亦再致蹉跎。我追悼组安诗有句云：“书生开国寻常事，大业蹉跎广泰楼。”惜其不早与先生携手也。

中山先生平生生活清俭。在京时，常常步行，至陶梦蛟寓楼久坐，虽设小点，并未染指，两国桥酒家谈宴时，酒不沾唇。广州总统府本系土墩土旧厂，门径敝坏，不加修葺。宁乡陈家熊告我云：“总理安于卑陋。生怕劳费，其上海香山路七号两层楼的洋房，亦朴素不华。府中客厅设座多处，每处仅白开水一壶，不设烟具茗具。所着衣服，与客居东京时差不多，仅保持整洁两字。”

中山先生自少嗜学，终日手不释卷。铅槌不离左右。早作晏

---

①张其哲，号子武。

罢，亦无惜容，写字点画不苟。谭组安能书，却赞叹先生字法，有唐人写经的楷则。我曾见其讲演手稿，皆端谨无一率笔。文卷信电，每日必校阅整理而后休息，其勤如此。先生生平豁达大度，于人无所不容。虽以政见与桂系失好，却愿协谋统一。谭组安于一九二一年后乃尊重之，谓真有总理风度。先生左右人材，百流并进，皆推诚见之。又不念旧恶。陈炯明倒行逆施，先生莅上海时，犹说：“我没有什么关系，这是竟存<sup>①</sup>自掘坟墓。”毫无愤怒词色。最后北行养病，意在谋国内统一，并不以南北政见分歧限之。不久先生在北京病逝，大功未集。然其泰山河海之量，包含万有，楷模古今。所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皆是先生在上海香山路故居与苏俄代表越飞晤商后手订发表者。缅怀先生盛德大业，百世不能忘者，非斯人吾谁与归。

一九六一年八月

（原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史研究馆供稿）

---

<sup>①</sup>陈炯明，号竟存。

# 清末留东回忆

郭之奇

## (一)

前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千九百〇五年，我方十八岁，肄业长沙经正学堂。承李莲舫先生识拔，由学堂保送，公费出洋，留学日本。

此次由各学堂选拔者，似是二十九人，从长沙乘日本轮船赴汉口，正待长江轮船之际，湖广总督张之洞闻湖南学生道经汉口，欲召见吾辈，设筵祖饯。惟相见时例须磕头，学生闻之，一时为之大哗，不愿往见，而总督既说要见，亦不能拂之径去，相持不决，将近一旬。后经胡子靖先生由湖南专程来汉，为吾辈申说，始群往赴宴，惟宁调元（太一）独持头可断不可磕之说，与其他二三人未往督署。太一与我在经正学堂同班，赴日之后，即锐意革命，且力学博览。后竟为袁世凯杀害于汉口，极可哀悼。

## (二)

是年春夏之交，我方到达日本东京，馆舍粗定，即有同乡前辈迎访。杨怀中、柳午亭两先生联袂见临。怀中先生海人不倦，我之粗识吾国学问之指归，皆先生之力也。

吾国数千年来学者之当务，除读书尚友古人外，以立志、择

友为大事。初到东京，即有人介绍朱渔父（教仁）之勤苦力学，有扫除天下之志，我当年亦颇自负，好作大言，因与渔父有所交往，倾心折服。其时渔父生活甚穷困，所居之屋仅三席，其他可以类推。

阳历七月九日上午，至帝国教育会。湖南同乡会在此欢迎我等新来之二十余人，渔父亦到，互道寒暄。晚饭后，渔父复到我与胡经武（瑛）寄居之卧龙馆，邀往和强乐堂看电影（日语为活动写真）。经武系桃源人，昔与我在长沙黄泥段师范馆附属小学堂同学，我之识渔父，即经武所介绍。我等购票将入，忽闻室内人声鼎沸，入场观之，则将中国小脚妇人作表演之具。留口同学先到者见此丑态，引以为耻，群起而攻之，哄堂散出，渔父心壮志得，本是豪杰之士，邀我一同站立门口。凡遇中国人来观，均说明原因，戒其莫入。正准备写一长条贴在门口，使尽人皆知，而乐堂管事人不许贴，因此发生一场辩论。渔父慷慨陈词，滔滔不绝，虽馆主出面殷勤招待，亦不以为意，卒使对方理屈词穷，无以为计，终听余等贴出此一字条，扬长而去。此后各自分飞，我入商船学校习海军，渔父则献身革命，尚能潜心学问。一九〇七年著《间岛问题》一书，正清廷外交棘手之时，得渔父此书，事乃大解，清廷欲任以部曹，渔父薄而不为也。

### （三）

我到东京不久，尚未能操日语。一日到牛込区若宫町二十七番地柳大任寓所，时黄克强先生亦住其处，此外尚有大任之侄某君。我方与大任侄闲谈之际，有一长发和服日人偕一西装革履人士叩门入室，云要会黄克强先生。是时克强不在，我辈款之，方知日人乃宫崎寅藏，所谓白浪滔天者是也，其他一人即中山先生。

中山与宫崎用英语对话，柳君留日已久，日语较熟，与宫崎对答，自能通彼此之情；我则既昧英语，又初到日本，端坐茫然而已。宫崎与中山先生必欲见克强先生，坐候甚久，傍晚克强先生始归。三人寒暄逾时，我亦不知其所云云。然时已晚，自宜款以酒食，而克强先生囊中一无所有，由我醴金五元为鱼酒之会，他们边饮边谈。章行严（士钊）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湖南《文史资料》第一辑）一文中所记孙黄会面事①，与我所言颇觉参差。据我所记，行老住若宫町，原为柳大任之宅。所言或在后一时也未可知，或孙黄尔后在行老处，方议天下大事，设方略，谋部署。或行老一时微小忽略，亦偶有之事。要之，孙黄见面虽有两说，地同时异。一有宫崎寓藏，一无宫崎寓藏，初见寒暄，一会商大计，皆为初始，各异发端。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史研究馆供稿）

---

①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吾抵东京，寓牛込区若宫町二十七番地。未几，克强移来同居，适中山孙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翌日，吾若宫町宅，有先生足迹见临。克强与吾，皆初见先生。”

# 辛亥革命杂忆

黄一欧

一九六一年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应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之约，写过一篇《回忆先君克强先生》<sup>①</sup>，谈到先君在辛亥前后的革命活动。当时匆匆交卷，现在回想起来，还可以就自己耳闻目见和亲身经历的活动，提供若干材料，作为前文的补充和订正。

## 一、谭人凤非华兴会员

一九〇三年夏，先君由日本归国，从上海回到长沙。农历九月十六，他三十初度，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保甲局巷彭湘恂（希明）家里办了两桌酒席，到者二十多人。这次聚会，实际上是华兴会第一次会议。我在一九六一年写的回忆录中，周震鳞写的《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一文中，都谈到谭人凤参加了这次聚会。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也提到先君一九〇三年邀集同志创立华兴会时，参加者有谭人凤。现在查明，都与事实不符。谭人凤自撰的《石叟牌词叙录》，叙述辛亥前后史事颇详，等于是他的自传。据其自述，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间，

---

<sup>①</sup>载政协湖南省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一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他在新化县城文场内办小学堂，对一九〇四年华兴会谋于省城举义有所闻，是由日本归来的戴石屏告诉他的，他并没有到长沙参与华兴会的活动。

一九〇五年冬，我就到了东京，那时谭人凤还没有去日本。第二年冬天，他才到达东京，并加入了同盟会。谭人凤后来说：“到东（京）时，适届同盟党员开周年纪念会，入场观察，祝词颂语，多涉夸张，莅会者不下千余人，实极一时之盛。……后唐镜三三次相挽，始与克强晤，畅叙至二小时，情颇洽，遂亦加入焉。余之从事于同盟会自此始。”①所谓“同盟党员开周年纪念会”，即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同盟会本部在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的《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这次到会的有几千，不是千余人。“唐镜三三次相挽，始与克强晤”，可见从这时起他才和先君订交；在这以前，彼此并不相识。

章士钊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一文中说：“华兴会开第一次会议于长沙，地点在彭渊恂宅，到会者共十二人。……时癸卯七、八月间。”他把时间也记错了。华兴会在彭渊恂家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确在农历九月十六先君进三十岁生日这天，是以做生日酒的名义集会的。我虽没有参加，但那时在先君身边，知道这回事。在东京有段时间，跟彭渊恂住在一起，听他在闲谈中提过，印象深刻，历久难忘。上引周震麟的回忆录，一开头就说：“‘华兴会’是一九〇三年夏历九月十六日在长沙创建的，地点在保甲局巷彭渊恂住宅”，这一材料，可资印证。

## 二、爱国协会与华兴会

章士钊在华兴会创立后不久就离开长沙回上海，办《国民日报》

---

①《石叟牌词叙录》

报》，从事宣传工作，担任长江一带的联络。并于一九〇四年春，与杨笃生发起组织爱国协会，地点在余庆里。爱国协会跟同仇会、黄汉会一样，都是华兴会的外围组织。不同之处是，同仇会、黄汉会分别做会党、新军的工作，爱国协会则主要吸收中上层知识分子。

一九六一年十月，我应邀到北京参加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时，曾去东四头条胡同看程章先生。寒暄过后，旧事重提，扯到爱国协会，他说，爱国协会计划成立时，本推先君任会长，先君因长沙新败，怕露锋芒，坚决不答应。于是才由杨笃生与他分任正、付会长。随后，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收到了章先生的特约稿《与黄克强相交始末》，其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湘中增设同仇会，联络红帮弟兄；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志士。如蔡子民、陈独秀、蔡松坡辈，咸在上述秘密计事处，由杨笃生监督加盟。盖克强志切实行，恐其名重勿谥，坚不肯任会长，于是众推笃生主持，而吾付焉也。”

甲辰起义失败，先君逃往上海，不久又发生万福华刺王之春案，余庆里机关遭搜查，先君与章士钊等都被捕入狱。他们出狱后，于一九〇四年初冬先后到了东京。杨笃生改名为守仁，到北京当译学馆教员去了。到这时候，爱国协会也无形解散了。后来，龚宝铨、蔡子民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原先爱国协会的成员，也有加入光复会的，但是，这两个团体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 三、甲辰起义事败已焉

华兴会创建后，积极开展活动。一九〇四年，先君通过刘揆一、刘道一兄弟的联系，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策划，准备于西太

后万寿节（农历十月初十）在长沙发难，结果事泄失败，先君出走。这次掩护先君出走的有龙英溪、曹亚伯、黄吉亭、张溥泉，知情者有周震鳞、周震勋兄弟。

关于这次事败的日期，我在《回忆先君克强先生》一文中作九月十六，即先君三十周岁那天，而龙英溪在《武溪杂忆录》中作九月二十四，在《黄克强先生癸卯华兴公司革命避难西园事略》中作九月二十五，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中说是“距皇会之前十日”，即是年九月二十九日。周震鳞、章士钊在一九六一年写的回忆录中，均依龙英溪后一说，作九月二十五。好几个说法中，究竟哪一个可靠的呢？这次起义失败，先君险被逮捕，确是农历九月十六，即公元一九〇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那天是先君满三十岁的生日，他永自在厨房下面（先君平生最爱吃寒菌面），款待三位进城祝寿的姑妈。我当时满了十二岁，在明德学堂小学部读书，住宿在家里，看到差役来捉拿他，便飞跑到明德学堂去报信。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第一章《黄克强长沙革命之失败》中说：“黄克强之居宅被军警包围矣，黄克强之子黄一欧尚幼，出门报信于明德学堂。”这是实在的。今天事隔七十四年了，因是关系先君一生成败的切身大事，脑子里还有较深的印象。先君在世时，每逢生日欢聚，长辈们茶余酒后闲谈中，也常提起甲辰年出走的事。特别是细姑妈最喜欢翻古，讲得最多，印象更深了。

最近，有位朋友告诉我，朱教仁一九〇四年农历九月间从桃源来长沙途中写的日记一则：

“二十八日。辰，发靖港，未正抵省城，泊朝宗门外。余登岸至东牌楼，寻崇正书屋，比至，侧门已封闭，寂然无人迹。余以为已迁往他处，乃至浏阳门街，寻东文讲习所，往来数次，皆不得，全怀疑之。复至黄庆午家

寻问彼等，则闻者答以庆午已出门十余日未归，不知何往，云云。余遂茫然不知所为，以为必有变故起于日内。信步将出城，比至福兴街，突遇曹亚伯于道。亚伯若甚惊余之何时来省也者，而要余至圣公会堂。既至，入其密室，乃密语余，问于何时来者，今日省中已杀二人，一游得胜，一肖桂生也，云皆为华兴会放票之事。现抚台密派兵四处严拿黄庆午、刘霖生等甚急。闻游得胜已供出常德有一宋姓者，子宜速避云云。”

宋教仁九月二十八日到我家寻问，“闻者答以庆午已出门十余日未归”，路遇曹亚伯，得知事泄失败情况。依我说，九月十六事败，则宋到我家时，先君是“十余日未归”了。这一当时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可作有力的旁证。

#### 四、马福益的“飞毛腿”

邹鲁编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编《黄兴传》中，谈到一九〇四年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经过，说：“驻湘潭之哥老会行堂有号飞毛腿者，知事已泄，乃走报马福益。马即令飞毛腿驰赴益城告黄、刘（揆一）迅速戒备。”其他有关先君的传记资料中，也提到过飞毛腿报信的事。这个飞毛腿就是永兴人刘重。

刘重，号铁石，湖南永兴县江霞冲人，一八八二年生。他身材瘦长，最会走路、跳高，据同族人说，他年青时一天能行二三百里，其速度几乎难以令人置信。祖父去世时，他在长沙接到电报，回籍奔丧，相隔六百里，仅两昼夜就赶到家里。因此，朋友们送他“飞毛腿”、“神行太保”的诨名。

刘重在二十一岁那年中秀才，到长沙进游学馆备科，得识刘揆一。刘揆一介绍他加入华兴会，又奉先君命加入马福益为首的

哥老会，担任联络工作。一九〇四年，我家住长沙北门紫东园。当时刘重每于拂晓前从湘潭动身，早饭过后不久就赶到了我们家里。这是我所亲见的，一点没有夸张。

辛亥农历九月，刘重在永兴起义，被推举为县知事，不久去职。后当选众议院候补议员，护国运动期间，在湘南一带从事反袁驱汤活动，仍与哥老会保持密切联系。赵恒惕统治湖南时期，刘被聘为省长公署顾问，我担任长沙市政公所总理，他常到我家来，虽然年届四十，步履还象年青人一样矫健敏捷。这时，他赴广州出席非常国会，与在广东的程潜来往密切，拥护中山先生的北伐政策，因而招赵恒惕之忌。一九二五年一月，刘重在返粤途中于湘粤交界处被捕，为湘军第四师旅长李品仙所杀害，得年四十三岁。

### 五、事败后的家庭遭遇

先继祖母易氏，祖通文字，精明干练，处事有条不紊。先祖父去世后，家务全赖她辛勤操持。前清癸卯年间，龙英溪、俞经诒等在长沙局关祠创办湖南第一女学堂，曾聘先继祖母担任舍监，很受学生欢迎。

甲辰起义失败后，先君遭清吏悬赏缉拿，在国内无容身之地，亡命日本。我虽只有十二岁，也受到连累，随时有被抓的危险。在此情况下，不能继续读书了，只好中途退学出来。最初躲在长沙南门晏家塘陈树藩家里，继而转移到南阳街张斗枢办的书店楼上，一连好几天不敢下楼。后来风声越紧，长沙城里不能立足了，藏身于善化县廖家河外祖母家，又在东乡崩勘二姑妈家呆过一段时间。一九〇五年秋末冬初，与同湘潭黄积成一起去日本。记得胡元倬是在九江上船的，我们一起搭船到上海，同住在四马路

的龙升旅馆。他是去上海为明德学堂采办仪器的，我想到自己有书不能读，禁不住当着老师哭起来了，他耐心地安慰我一番，勉励我此去要认真读书。

这时，我虽逃出了罗网，家乡的风声仍然很紧，先继祖母带领一家人四处逃匿，可说历尽艰辛。她娘家有个侄儿是传教士，逃难时得到他的照顾不少。陈嘉会过去与先君在西湖书院同学，其母亲任老太太，对先继祖母的处境十分同情，经常暗中予以接济，这是我至今仍很感激的。一九二九年农历五月，继祖母在长沙病故，陈嘉会所撰挽联，还提到继祖母当年亡命受苦的事。

## 六、李燮和是华兴会员

一九七七年冬，有位史学界的同志问我：李燮和是不是华兴会会员？我告诉他，李燮和是参加了华兴会的，并且是华兴会的骨干分子。

李燮和，字柱中，湖南安化县兰田人。早年入县学为诸生，又在长沙求实书院读书。冯自由在所撰《革命逸史》第二集中说：“燮和为黄克强所设长沙明德学堂学生”，误。他并没有进过明德学堂，而在安化驻省师范学堂和宝庆府中学堂担任过教师。在安化驻省师范学堂任教期间，结识先君与刘揆一，加入了华兴会。冯自由所写《光复军司令李燮和》及湖南省志传记资料中的《李燮和先生传》，都提到他是华兴会会员。甲辰长沙起义失败后，李燮和也逃到了上海，在上海加入了光复会。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未久，他游学日本，到了东京，由先君介绍加入同盟会。两年以后，经冯自由介绍，在荷属南洋文岛滨港中华学堂及双溪烈斯丹智学堂教书，与当地华侨相处融洽，柳聘农、胡国桢、陈方度<sup>①</sup>是因他的关系去荷属南洋教书的。

一九〇八年，陶成章未经同盟会本部同意，赴南洋向华侨筹款，受到批评后，他改用光复会名义进行募捐，重新打出光复会的旗号，反对中山先生。在这个分裂活动中，李燮和是推波助澜的，和陶成章取一致行动。当他们合而复分，公开反对中山先生时，柳聘农等这些过去参加过华兴会而与光复会无关系的人，也参与其事，原因何在？我想不外两个原因：一、李燮和年岁较大，大家把他看作同乡前辈，又是因他的关系到南洋去的，遇事唯其马首是瞻，亦步亦趋；二、光复会虽在东京并入同盟会，但它与华兴会不同，在海外及内地一些地方仍保持光复会的组织，他们受光复会的宣传影响，于中山先生的实际活动不甚了解，发生误会足意料中事。在李燮和的鼓动下，他们都加入了新的光复会。他们还错误地把中山先生同中国同盟会割裂开来，认为反对中山先生不等于反对同盟会。辛亥年春我和他们一起打入广东巡警教练所，在闲谈往事时，他们是这样看的。在这之前，先君为筹备广州起义赴南洋各地筹款，曾面劝李燮和等要顾全大局，以团体利益为重，不可别树一帜。他们接受了先君的劝告，为同盟会募款三万多元，柳聘农等并到广州进了巡警教练所，以实际行动纠正了原来的错误。李燮和本人也离开南洋到香港统筹部投效，以后又到上海参与了上海光复。

关于在南洋参加光复会反对中山先生一事，陈方度、柳聘农后来都同我谈过，承认他们是受了李燮和的影响，感到愧悔莫及。

### 七、“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据章太炎说，是先君向他征询革命胜利后的方略时，他在复信中说了这么一句话。

中山先生后来说，章太炎的话是附和当时顺从革命的基官僚

的话。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对国民党党员发表演说，讲到辛亥武昌起义后，他由巴黎到达上海，本意是想及绅商学各界，甚而至于一般七官僚，都一齐来欢迎他。其中有一个官僚极为郑重地对人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当时一般官僚最怕的就是革命，故说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八个字，去抵制革命党，而革命党人不明白他们的用意，也随声附和之。中山先生在演说中没有点出这个官僚的姓名，但实际上他指的就是张謇。

张謇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有名人。时年六岁考取秀才后，多次应乡试、会试，最后在四十多岁时中了状元。一九〇九年当上了江苏咨议局的议长，本是反对革命的立宪派人物。辛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革命，眼看武昌失守已去，急忙附和革命，拥护共和，把自己擅长的东西一下子切下了。那时候，他对先君恭维备至，对中山先生则是敬重有加，说他很愿从革命做官了。实际上他并不服从革命，而是顺风使舵，见风就倒。

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中山是江苏咨议局利用张謇一家的身价，任命他担任了实业总长。但在临时政府中任职后，为了脚根，态度就不一样了。当时临时政府财政拮据，军队有十多万人，先君担任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兼大本营军需总长，发军饷、发火部要钱。因为军费没有着落，经常奔走于南京、上海间，累得吐血。想过张謇设法向上海方面借几十万应急，说一借就是个把月，急得先君走投无路。以他当时在实业界的地位，借几十万并不是那么困难的，我看他就是存心要倒，借此打击革命党人，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消灭革命党，这与他要求中山先生“都去党名”，拉拢一批同盟会员组织“统一党”是一致的，目的都是要瓦解同盟会。

章太炎早年在上海西牢出来，同盟会接他去东京办《民报》时，同中山先生是志同道合的，相处得很好，这是我所亲见到的。后来在某些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并鼓动张謇、朱教仁等，主张召开大会，罢免中山先生的总理职务，另举徐君担任。徐君当时极力反对他这种分裂活动，在私信中指出，中山先生绝顶英武，必须倾心拥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本来内定章太炎出任教育部长，因遭到多数人反对，才改推蔡元培担任。他对这件事是不愉快的。后来鼓动他为总统府撰密牒，我记得他是没有到南京的。因此，他附和革命党提出的口号，希望同盟会解体，是很自然的。这时候的章太炎，已经不是主编《民报》时的章太炎了。

#### 八、宫崎寅藏与中国革命

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总部设在东京。日本政府是清廷勾结，多方阻挠中国革命事业的，但民间人士同情、支持的却不少，其中为人所熟悉者有宫崎寅藏、头山满、荷田三、黄野长知、宋永节，和田三树等。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积极以同盟会员的身份公开活动，因此，可以看作是同盟会的高级活动会员。在这些日本朋友中，要数宫崎寅藏与先君的关系最为密切。宫崎寅藏已经去世五十多年了，我虽在暮年衰病之中，还时常想起这位偶然相识的异国长辈，他的面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好象事情过去并不太久一样。

宫崎寅藏是日本熊本县玉名郡荒尾村人。他积极赞助中国革命，与中山先生交往最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就支持兴中会的革命活动，中山先生为策划在广东起义，曾请他赴南洋筹募善款，并代购军火。一九〇〇年兴中会发动的广州起义，事虽未成，他是出过力的。宫崎寅藏写过一本《二十二年之梦》(二十二年は夢か)，

当年作有《落花之歌》，将“落花”二字添入，改为《三十三年落花梦》，署名白浪庵滔天。这本书相当详细地记载了中山先生的初期革命活动，如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作斗争，惠州起义经过，等等，书成于一九〇二年，这年宫崎虚岁三十三，所以叫《三十三年之梦》。他曾告诉过我，是从二十五岁时起自号白浪庵滔天的。

一九〇五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前夕，中山先生与先君初次会晤的介绍人，就是宫崎寅藏。中山先生欧游归来还未到东京时，他就向宋教仁表示：“孙逸仙不日将来日本，来时余当为介绍君等”，“孙逸仙之为人，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焉。”这是在《宋渔父日记》中有记载的。我后来听到宫崎寅藏谈过：当年先君住在牛込区若宫町，他陪同中山先生专程走访，在坐的还有张溥泉（继）和末永节。先君邀他们一起到风乐园进餐，举杯痛饮，尽欢而散。风乐园是开设在神乐阪附近的一家中国料理店（中式餐馆），我国留日学生一般都去过的。刘揆一写的《黄兴传记》，也说：“由日本民党宫崎寅藏之介绍，与孙公相会于东京风乐园。”

关于先君与中山先生的初次会面，宫崎寅藏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他到日本后，宋教仁、刘揆一也相继冒险来日本。在这里，他与湖南的同志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并和广东的孙逸仙一派的革命学生联合起来，在许多学生中间鼓吹革命主张。明治三十八年（一九〇五年）春，孙逸仙由欧洲回到日本后，来我家里访问。对孙询问有无杰出人物一事，我说：‘仅仅两三年间，留日学生猛增，有一个叫黄兴的，是个非常的人物。’孙说：‘那我们就去看看他。’我说：‘我到他那里去把他请来

吧！’你说：‘不要那么麻烦了。’于是，我们两人就一起到神乐阪附近黄兴的寓所访问。和我们住过的宋永节，那时和黄兴同住在一起。到达黄寓时，我要孙逸仙在门口等一等，我推开格子门喊了一声：‘黄先生！’宋永节和黄兴一起探出头来，看到孙逸仙站在外面，说：‘啊！孙先生！’黄兴想到有许多学生在屋里，立即作手势，示意孙先生不要进去；我也会意了，随即出门去等待。顷刻，黄兴、宋永节、张继三个人出来了，将我们带到中国餐馆风乐园。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来。我不太懂中国话，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但是，中国的革命豪杰在此欢聚一堂，畅所欲言，使我们感到高兴。我和宋永节互相频频干杯。约有两个小时，孙、黄两人一直商议国家大事，却酒肴少沾，直到最后，两人才举杯祝贺。”<sup>①</sup>

我是一九〇五年冬天到东京的，其时先君已去南洋。到东京后，最初在《民报》社住了几天，随即搬进牛込区若宫町二十七番地章士钊寓所（先君离开东京后，章士钊迁此）。第二年上半年，章与吴弱男结婚了，我迁到振武学校对过的彭渊恂寓所。秋间，先君从南洋回来，才跟他住在牛込区东五轩町林馆。一九〇七年开春，先君又离开东京去香港，宫崎寅藏叫我搬到他家里去住，我同他的二儿宫崎震作在附近一所高小同班读书，跟生活在自己家里一样，毫无拘束。

宫崎寅藏身材高大，平日多着和服，椎髻美髯，道貌岸然。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每当酒酣耳热时，常以先君所作的诗词用日语引吭高歌，听来韵味盎然。他擅长说唱浪曲，这是日本民

<sup>①</sup>《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282—283页。

间曲艺的一种，起源于大阪，流行于东京、横滨等地。起初艺人沿街说唱，后来进入书场演出。先君于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初访宫崎寅藏时，他正在东京神田区广市场说唱。他登台自弹自唱，擅长表现历史故事、时事和民间传说等。在东京、横滨、大阪等地都登台演唱过，卖的满座，反应很好。我也去听过的，其声调很象湖南农村之打山歌，别有风味。宫崎寅藏待人谦和，从无疾言厉色。我那时才十四五岁，他对我有时谑称“少爷”，或呼我的幼名“菊儿”，有时则直呼“一欧”，就象对待自己的亲子侄一样。

宫崎寅藏生平疏财仗义，很有些江湖侠气。他不仅跟中山先生和先君交往密切，与其他革命志士也结下不平凡的友谊。记得一九〇六年秋天，宋教仁因病住进医院，久未痊愈。他托先君致意，硬要宋搬到他的家里去，谢绝应酬，静养一个时期。宋在宫崎家里休养期间，宫崎夫人前田颯子招待十分殷勤，大概住到这年底才离开。

特别令人感念的是，宫崎寅藏多年来支持中国革命事业，都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一九〇〇年在新加坡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时，受康有为诬陷，英国殖民当局将他逮捕下狱。他经常为同盟会购买枪支弹药，在这方面出力量最多的有他的内弟前田九二四郎，在他家里做保卫的浪人龟井。一九〇八年，《民报》被日政府查封时，先君以党部名义提出申诉，他曾出面延请律师辩护，这也是要冒风险的。

一九一〇年春，日政府见满洲交涉无大进步，而清朝军队之表同情于民党者日多，深怕一旦民党得势，它既无求于清廷，又不见好于民党，两头失塌，有此隐情。宫崎寅藏乘机运动陆军大将长谷川，由长谷川将宫崎所铺张的中国民党势力介绍于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寺内密派和他有关系的儿玉有正，与宫崎一道于五

月间去香港调查，约先君由新加坡来港相会，欢聚数日。临别时，先君书赠宫崎七律一首。事后，宫崎撰有《革命党领袖黄兴——在热带地方》一文，在《万朝报》上连载（后改题为《与革命党领袖黄兴谈话》，转载于《日本及日本人》），对中国革命事业，深表赞许。

辛亥革命后，宫崎寅藏夫人到南京见过中山先生和先君，宫崎寅藏也多次来到中国，和中山先生及先君有频繁的接触，特别是在反袁运动中，相助尤多。云南起义前夕，先君从美国写信到东京，要我向宫崎寅藏探问日本外交动向，他曾多次到外务省探听，将所获情报密告先君。一九一六年先君回到上海，不久就旧病复发。他专程来沪探视，并介绍日医佐本金太郎作过细的检查诊断。先君逝世后，他又来沪参加吊唁活动。一九一七年一月，先君灵柩由上海运抵长沙，四月十五日国葬。宫崎寅藏又远道前来送葬，于二月十四日抵长沙，整整逗留了三个月。除参加先君国葬典礼外，还出席了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和明德学校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会。

宫崎寅藏有两子一女：长子宫崎龙介，比我小月份，毕业于东京帝大；次子宫崎震作，青年时喜欢宣传社会主义；女儿宫崎节子，与其堂兄宫崎世民（宫崎寅藏之兄宫崎民藏的儿子）结了婚。一九五五年，宫崎龙介由欧洲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回国途中，路过北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问过毛主席，要来看我，毛主席答应他了。于是由上海绕道长沙同我见面。我得到省委统战部的通知后，专程去株洲迎接，同他在长沙欢聚几天，并陪往岳麓山凭吊先君之墓。这次分别后，多年未通音问，时切怀想。最近收到《宫崎滔天全集》发行者、东京平凡社社长下中邦彦先生来信，才知道他已经在近年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感到

非常难过。我想宫崎龙介先生如尚健在，他看到盼望多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该会是多么愉快高兴啊！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先君生平不善绘画，更没有绘画送过人。唯一的例外是，却画过一幅梅花送给宫崎寅藏大人的姐姐前田卓子。她那时住在民报社，替报社当生活管家，跟大家相处很好。有次先君与宋教仁、何晓柳以及其他日本友人到大森池上梅园去观赏梅花，她也同去了。在观梅时，先君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幅梅花送给她，我看到了的，何晓柳还在上面题了几句话。在我的记忆中，先君是没有画过画送人的，因为他并不擅长此道。

### 九、陈天华“绝命书”跋文

曹亚伯著的《武昌革命真史》前编，叙述一九〇五年陈天华在日本投海后留下绝命书，有这样一段话：

“黄兴对于陈天华绝命书跋文曰：‘此吾友陈君星台绝命书，强斋每一思君，辄一坏通之。盖未尝不心惻惻然悲，而泪潸潸然下也。……天未明，强偕友人某氏某氏赴大森视之。大森町长乃语曰：昨日六时，当地海岸东滨距离六十间处，发见一尸，即捞获之。九时乃检查身畔，得铜货数枚与书留（寄信保险证），余无他物。今既已殁矣，则率引我辈观之，一棺凄然，倭式也，君刻在焉。’”

其实，曹亚伯记错了，这篇跋文署名“强斋”，并不是先君写的。我于陈天华投海事件发生前不久到达东京，这时先君已离开东京，经香港转往广西内地活动去了。

陈天华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八日在东京大森海岸投海自杀，当时先君不在东京，他是第二年秋天才回到东京的。从这时起，我跟他住到牛込区东五轩町林馆，此地隔中山先生的寓所不远。

据此可见，陈天华投海时，先君不可能到大森海岸去收尸，而从跋文内容看，作者强斋是前往收尸者之一。曹亚伯撰序这本书，在陈天华投海二十多年以后，又非亲历其事，记述偶有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

这篇跋文是谁写的呢？有人说是宋教仁写的。他那时候在东京，但是否去收尸了并写了跋文，我未亲见，不敢臆断。还有人说宋用“强斋”这个笔名，在《民报》上发表过文章，不知确否？方鼎英在狱时，曾对我说过他当时在东京，与陈天华住在一起，陈每天握管写作，写到伤心处独自痛哭失声。那天清早出门，大家以为他是去民报社或駿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有事，不料是投海自尽去了。方还说过，陈天华的绝命书是用日本美浓纸写的一个长卷，过去一直是由他保存的。他在抗战前居住上海时，曾影印多份分送友好以为纪念。抗战爆发后，上海寓所衣物损失殆尽，这份同盟会时期的珍贵文物，也不知散落何处了，可惜之至。

#### 十、宋教仁与间岛问题

最近，宋教仁的孙女奇璋从桃源到长沙治病，几次来看我，谈到对她祖父的生平事迹知道很少。这也难怪，宋教仁遇害那年，她父亲才十三岁，父亲死的时候，她还不满十岁呢。奇璋问及她祖父写《间岛问题》的事，说她母亲原先保存了一本，抗日战争时期逃难中遗失了，十分可惜。她这么一问，使我想起了一些旧事。

一九〇七年春节前夕，我在东京。先君由香港回到东京后，邀宋教仁等商讨今后进行革命计划，并当面拜托他为我教授国文，约好每天下午到他的寓所去上课。先君对我期望很殷切，而我则疏懒成性，并没有认真去学习。在这以后不久，先君几次邀宋教仁 and 日人宋永节、古河等，商谈运动辽东马贼（俗称马贼）归诚革

命问题。因古河是日本退伍军人，到过辽东，与马侠某头目有交情，先君极力怂恿宋教仁一道同去辽东。三月间，宋教仁偕古河、白逾桓（楚香）搭海轮先到朝鲜，然后渡鸭绿江抵达安东，沿途有信给先君告知行程。到安东后，因清探密布，不便再入内地，一面与马侠头目进行联络，示以革命宗旨，请其共举义旗，同时细考地图，详察山川形势，调查风俗人情，以作他日用兵的准备。并化名打入口人组织的长白山会，得知该会所伪造将延吉变为间岛的假证据。白逾桓则赴凤凰城一带进行调查，搜集资料。经过一番筹备，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领导起义的机关。不料事机不密，风声走漏，清兵把白逾桓捉去了，宋教仁无可如何，只好折回东京。从这时起，先君带着我跟宋一起住在东京市郊新宿大久保。他们在这里是隐居性质，知道的人很少，一般会客都约在牛込区某处见面。我则在品川大森体育学校学习，朝出暮归，亲见宋教仁赶写《间岛问题》。他有时埋头伏案，夜以继日，写个不停；有时跑帝大图书馆查找资料，几乎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这部书稿确实绞了宋教仁不少脑汁。后来，清廷据以与日政府交涉间岛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我的记忆中，宋教仁撰写这部书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书写成后，他就离开东京，不知往什么地方去了。

先君与宋教仁交谊极深，可说十年如一日。一九一三年春宋教仁到各处作竞选演说，活动组阁，去之前和回沪后，都住在先君同孚路寓所。关于他的被刺经过，近代史书文献中有详细叙述，不待我赘述。宋教仁逝世以后，先君关怀亡友，特地邀集谭人凤、陈强、程子楷和他自己共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由谭人凤牵头。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多经手宋教仁善后，照料其老母、妻子的生活，管教遗嗣宋良弼。

一九一六年夏，先君由美经日回到上海，寓居福开森路，我携眷住在新闸路，隔康有为家不远。同住的还有先君的秘书黄丁甫（长沙人，我的本家哥哥）。这时振昌在上海无所事事。先君怕他在十里洋场学坏样，要他跟我住在一起。最初一段时间，振昌表现还好，慢慢地就学坏样了。他跟浏阳人刘白等在外面乱跑，出入花街柳巷，一连好些天不回家。我规劝无效，只好把情况告诉了先君。先君在病中听了很生气，派人把振昌找来训斥，说：“你父亲如何死的你晓得吗？他是为国家死的。现在我们国家搞成这个样子，风气很坏。你要好好做人，为你父亲争气，不要学坏样，我就死也放心了。”振昌听了先君这番话很受感动，决心痛改前非，以后在生活方面检点多了。

### 十一、回忆女医师张竹君

辛亥武昌起义后，先君在香港得到消息，即偕先继母徐宗汉于九月初三赶到上海，寓朱家木桥某宅。当晚由先继母到民立报社约宋教仁来会，久别重逢，倾谈竟夕。商定由柏文蔚、范鸿仙等往南京策动新军反正，先君与宋教仁去武昌支撑全局。柏文蔚临走时，先君送他手枪一支。其时武昌虽已发难，沪宁尚未光复，沿江口岸都在清军手中，查缉极严。结果想出办法，由女医师张竹君出面组成红十字救护队，开往武汉战地服务，先君变服混在其中，先继母则扮作看護妇偕行。随行者还有宋教仁、陈果夫等。陈果夫过去与我在长沙明德学堂小学部同学，这时是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代表，来到上海接洽，先君约他们同赴武汉前线效力。李书城在《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和“

11

资料》第一辑）中说，这次同行人有日人荒  
（知后来说过，他是在汉阳归元寺总司令部

会见先君的，比先君晚到约一星期。

张竹君是广东番禺人。早年毕业美国长老会办的医科学学校，在广州开业行医时，就跟先继母很熟识，情况不同寻常。她先后筹资在广州荔枝湾建提福医院、河南柳波桥侧设南福医院，先继母给以有力的支持。后来到上海新加坡路另创基业，在社会上很有声望。她率领救护队在武汉前线做了不少工作，以后又率领这支救伤队前去南京外围，替会攻南京城的江浙联军服务，活跃于尧化门一带阵地。

关于张竹君组织救伤队赴武汉前线一事，见之于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和其他文献资料。但是，她后来率领救伤队去南京外围为江浙联军服务，这件事却未见有人提及过。作为当年江浙联军的一员，我有义务把它记录下来。

## 十二、武汉寄来八字家书

先君到武汉后，被推举为民军战时总司令，曾因张竹君回沪采购药品之便，托她带信给我，叫我赶到武汉去。我那时正在奔走联络，筹组联军会攻南京，无法抽身到武汉前线救命。农历十月上旬某天，江浙联军正在进攻南京，战斗激烈的时候，张竹君带领救伤队来了。她这次又带来先君给我的一封信，拆开一看，上面写着寥寥几个草书大字：“努力杀贼！一欣爱儿。父字。十月初一日。”落款处盖有先君常用的一颗小章：“天此朝食”。这是先君在汉阳督战时，知道我参加了联军，正在进攻南京，特地写来勉励我的。胡适早年写过一首新诗：“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字迹飞舞如大苏。……”他指的就是这“八字家书”。

辛亥革命以后，这封信经新闻记者拍照制版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九二九年刘揆一在北京自费撰印《黄兴传记》发售时，曾把它印

在首页。原信归我保管着，我还写过这样一小段跋语：

“昔先君致力于革命时，军务纷劳，家书殊鲜。加以不肖为党国效棉薄，频年卜居无定，致先君手迹遗失殆尽，唯余此书而已。犹忆在江浙联军奉读此书，辄有中宵起舞、灭敌朝食之慨。不虞自暴自弃，荏苒至今兹，有负先君期勉之训，愧悔何及。另一欧谨志。”

这封不寻常的家书，后因亲朋戚友辗转借阅，不知怎么被上海青年会所收藏。这是抗日战争以前的事，距今又是四十多年了。

### 十三、张孝准的生平事迹

一九一五年护国运动前夕，先君旅居美国，在讨袁方面跟蔡松坡保持着密切联系，居间奔走的则为张孝准。他于清光绪七年农历十二月初六出生于长沙县沙坪乡赖家屋场。年方弱冠，赴日本留学，进了士官学校第三期学工兵。在校期间，刻苦勤奋，成绩优良。毕业时，与蒋方震（百里）、蔡锷（松坡）同列前三名。这届士官毕业生，前五名都是中国人，一时传为佳话。文化大革命前，湖南师范学院教师张友建同志给我看过一张士官第三期毕业典礼的团体照片，他父亲和蒋、蔡等坐在前排中间，手持军刀（惯例士官毕业前三名由日本天皇赠送军刀），英姿焕发。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张孝准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

张孝准由日本毕业回国，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幕府供职。后来由赵保送德国留学深造，在柏林进了陆军大学，学习四年，极为勤奋。毕业后，除精通日语外，还懂德语、英语，当时精通三国语言的中国留学生并不很多呢。

辛亥革命前夕，张由德国回国，在北京工作。当时吴禄贞驻石家庄，策划组织燕晋联军进攻北京，电约张孝准前往参与起义

活动。他正准备行装动身，即得到吴被袁世凯派人刺死的消息，才停止前往。一九一二年四月，中山先生辞临时大总统职，先君留守南京，张孝准任留守府军务厅长。当时裁减南方军队，都由他经办，各方应付，煞费苦心。南京留守府结束后，先君推荐他回湖南任军事厅长，襄助谭延闿整顿军队，因遭到湖南旧派军人的反对，只干了几个月。一九一三年七月，又随先君去南京参加讨袁运动。讨袁事败，与程潜、陈强等同被北京政府宣布为叛军拿。这时，他携眷东渡日本，在东京来往密切的为章士钊、程潜、陈强、彭允彝诸人。先君去美国后，部分军界同志在东京组成欧事研究会，张孝准是这个团体的负责人之一。一九一五年下半年，蔡松坡在北京秘密策划讨袁，九月底，专人送密信给先君，商讨在西南发难计划。先君认为讨袁时机已经成熟，特地叫我立即动身回日本。十月初间，我由费城乘火车经纽约到西雅图，再搭日本邮船直航横滨。到东京后，我将先君的一封信交给张孝准，他随即就动身回国，在天津与蔡松坡秘密会见，商定出走计划。经过张孝准多方设计掩护，蔡松坡终于逃出了袁世凯的罗网，到云南树起反袁义帜（详见我以前写的《护国运动见闻杂忆》，载《湖南文史资料》第八辑，不赘述）。翌年五月，滇、黔、桂、粤四省护国军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张孝准任军务院驻日委员，经办与日本朝野的各项交涉事宜。后来回湖南当湘岸樵运局长。一九二四年湖南发生大水灾，赵恒惕请他担任水灾筹赈会坐办，这年底由长沙因公去北京。一九二五年三月，在北京因赴章士钊的宴会，酒后脑溢血，送进医院不久即去世，终年四十四岁。张孝准与先君的关系极深，他为人耿直，不苟言笑，最不喜欢逢迎谄媚，而交游甚广，乐于资助有困难的朋友。记得先君曾书赠一联云：“唯有真才能血性，须从本色见

英雄。”

#### 十四、南京城的混乱情况

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当时驻扎南京的军队，名目繁多，我现记得起的就有李燮和的光复军、洪承点的沪军先锋队、朱瑞的浙军、柏文蔚的安徽军、姚雨平的广东北伐军、王芝祥的广西军、刘某的江西军，等等。军队人数众多，成份又很复杂，不肖匪徒而假冒军人的也有。因此，南京城厢内外，抢窃案件时常发生，社会秩序十分混乱。陆军部虽然任命徐绍楨为南京卫戍总督，并颁布了临时军律，规定任意掳掠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焚杀良民者枪毙。但是，奸淫掳掠事件仍时有发生，甚至大白天在街上也有放冷枪的。

这种混乱情况，在临时政府结束，南京留守府成立后，更加有所发展了。因为军队既多，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又卡着不给军饷，许多部队连伙食也无法维持，军心动摇，秩序更乱。某夜，先君因事去上海未回，江西军一部突然哗变，在城里抢劫财物。留守府总参议李书城商请广西军王芝祥军长派兵弹压，方平息下去。有一天，先君到会客室见客去了，值日副官陈东生伏在办公桌旁边，和另一随从副官徐向忠谈话。他忽然“哎哟”一声，走几步就倒在地上，气绝殒命。当场发现子弹是从窗外射进来的，正打在陈东生的胸口，并在房内检到了一颗步枪子弹。这件事发生后，曾经调查过，但是没有结果。当晚我问先君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泰然地说：“没有查清原因”。

#### 十五、南京贫儿教养院

先继母徐宗汉自一九一二年起，创办南京贫儿教养院，历时

二十多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从南京仓惶撤退，贫儿教养院才无形解散。

南京贫儿教养院是这样办起来的：一九一二年元月上旬，姚雨平的广东北伐军沿津浦线北进，与清军张勋、倪嗣冲部交锋，三战三捷，一举占领徐州。二月间，南北和议告成，先君下令北伐军改为讨虏军，从徐州班师回南京。姚雨平部从徐州前线回来时，带回幼童两百多人，他们多数是在战火激烈中跟父母失散的，有的是军官们准备退伍回家，出点钱买来作养子的。先君得知真相后，通知姚雨平把全部幼童交给陆军部，由陆军部副官处觅定民房临时收容，随后又要先继母负责组织教养，使他们幼有所长。因此，成立了南京贫儿教养院。

贫儿院成立后，先继母把它当作一番事业办理。二次革命失败后，她虽跟先君流亡在外，对教养院的几百个难童总是念念不忘。先君去世后，她更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这方面。后来，教养院在南京四象桥扩建了房屋，江苏省政府月拨经费三千元，并在安徽设置了一处农场。儿童们在院里以学文化为主，兼学编织、园艺等项。小学毕业后，或资送中学继续读书，或到农场参加生产劳动。

抗日战争发生后，南京一片混乱，江苏省的经费补助也停发了，教养院不能继续维持，只好解散。先继母避难到重庆，仍然很关心战时儿童保育事业，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表示不满。一九四三年春，先继母病逝于重庆，遗体是按佛教仪式火化的。

## 十六、旅美期间经济来源

先君以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日由日本搭轮赴美国，一九一六

年夏初回国。在先君尚未抵美之前，中山先生已派冯自由、谢英伯等赴美筹饷，准备发动第三次革命。先君在美两年，未向侨胞捐募分文，与他们无任何经济上的来往。一九一四年冬，汤梦铭撤销湖南留美学生官费，经济上来源断绝，先君就要我和长妹振华辍学回东京。第二年他自己也难以维持了，打电报到东京，要我陪送先继母徐宗汉去美，并将存放东京家中的古玩字画带去。这批古玩字画，有的是在上海、南京时别人送的，大部分是一九一二年秋到北京时收的赠礼。记得在东京动身时，连同行李分装八九口箱子。不料船到旧金山，当地海关关员上来检查，因我没有回头护照，又带了这么多箱古玩字画，便全部予以扣留。事情发生后，我立即打电报告诉先君，他收到电报就致电日本著名法学家渡边博士（旧金山海关监督的妹夫），请予疏通。渡边夫人的电报一到，海关就把扣留的箱子发还，准许我们过境了。这次在旧金山耽搁了两个星期。后来，先君将这些古玩字画在纽约变卖，共得价款美金两万多元。除供我们一家在美国一年的开支外，还用于自行编印反袁宣传资料，分送美国有关方面以及留美学生和侨胞。当时先君对反袁宣传不遗余力，而于他自己与中山先生在组党问题上的意见不合，则绝口不谈。还经常告诫我要尊重中山先生，他深怕我乱发议论，影响彼此间的团结。（先君于离日赴美前夕，在寓所宴请中山先生叙别，田梓琴等应邀作陪。）

### 十七、忌日恰逢独夫生辰

蒋介石统治期间，定每年五月十八日为陈其美逝世纪念日，而先君无之。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选举林森连任国府主席，通过张群、覃振的临时动议，定每年十月三十一日为先君逝世纪念日。（虽然通过了，不过是一纸具文，

并未付诸实施。我想原因不外两个：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山先生与先君在组党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从中煽风点火的就陈其美，而蒋介石则是投靠陈其美起家的；二、先君的忌日，凑巧就是独夫民贼蒋介石的生日。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先继母主持的南京贫儿教养院，照例举行纪念仪式，并下半旗志哀，算是追念逝者的唯一表示。有一年，贫儿院里举行纪念会，张继等人都到了，大门口停了小汽车多辆。这时，当地警察分局一巡官带一大批警士，气势汹汹地进来质问，说是蒋委员长的寿诞，不许下半旗，要升满旗。我出面同他们解释，好话讲了一大堆，仍然无效。张继也怒不可遏地跑出来了。我看到情势不对，便叫陈方度代我打个电话给首都警察厅长王固磐（一九二八年我任天津市第一特别区区长，王是三区区长），请他到场处理。这帮人看到我同王固磐有关系，便不敢再胡闹，灰溜溜地走开了。

#### 十八、“遗囑”问题内幕真象

有位朋友前不久同我谈起一批旧事：一九一六年十月，先君病情转剧后，黎元洪曾派何成浚到上海视疾。先君病故后，何向黎元洪发去两个电报，第二个电报中有一段文字是：黄兴“自知不起，即呼浚至床头，示以国基飘摇，外交紧急，……李书城、陈嘉会、张孝准、徐少秋、耿觐文从余尽力为国，颇著勋劳，亦望量予任用，俾各展所长，务乞转陈斯意，等语，无一语及家事。言毕，即溘然长逝。”这个电报当时在报上公布后，旅居上海的一部分军界同志，写信向我质问“遗囑”中保荐几个人的问题，措词很严厉。他们说：“尊翁一生伟业，昭昭在人耳目，奔走国事，入死出生近二十载矣。其间共患难者不可胜数，岂止三湖北、一广东、二湖南之寄生虫耶？”对于这个质问，我当时有难言之隐，

不好答复，现在时过境迁，可以畅所欲言了。先君弥留之际，无任何遗言，所谓遗囑荐人，纯属虚构，并非事实。记得最后病重的那几天，我和大妹振华时刻守护在床边。何成浚到沪后，住在跑马厅一品香旅社，他和李书城等经常在我家照料。先君从十月三十日下午二时起，转入昏迷状态。三十一日凌晨，继续处于昏迷中，待到我离开床头，到隔壁房间吃完稀饭后转来时，发现先君更加不行了。我立即打电话给在跑马厅附近开宝隆医院的德国医生克礼，等他赶来诊断时，先君已经停止了呼吸，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至于“遗囑”的疑案是如何产生的呢？始作俑者是徐少秋。当时我并不知道有这回事，何成浚后来向我表示，徐少秋告诉他发了电报，但未讲杂入保荐人的事。徐少秋是先祖母徐宗汉的胞弟，当过陆军部一等副官，经常在先君身边办事。何成浚曾任陆军部副官长，他深知何之为人，所以有恃而无恐。就李、陈、张、耿而言，他们都是老同盟会会员，资历较深，政治上自有出路，用不着去投靠黎元洪。只有徐少秋资历较浅，先君死后，靠山丧失，前途渺茫，为个人利益打算，他想出了这个主意。

六十多年前的一件疑案，真相如此。

## 辛亥时期的片断回忆

李 谷

我是一八八八年在桂阳州东乡夏山阿村出生的。虽过九十之年，自信身强体健，百岁可期。几年前作《百岁歌》，有句云：“念年之时学师范，存心想做人之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指的是辛亥革命前在湖南南路师范读书事。南路师范学堂一九〇五年创办于衡阳，与中路、西路师范同时成立。监督曾熙，号桐沅。教务长成凤韶，斋务长向乐谷。教员中聘有日本人大庭敬治郎教理化及数学，原田爱之助教博物，中村邓次郎教英文，对学生授课，态度认真。当时对日本教育事业之发达，心向往之。

辛亥革命后，谭延闿继焦达峰任湖南都督。黄克强先生曾致函于谭，以民困初建，人才缺乏，急宜选择宏毅之士，资送东西各国留学，储为国用。克强先生高瞻远瞩，一面留心培养人才，同时注意发展矿业。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先生回到长沙后，曾接见工商部派遣查办汉冶萍公司委员余焕东，告以湖南实业之兴办，开矿为第一要着。就现在已出之矿而论，如永口山之黑砂，平江之金及各处之锑，应于现时计划清楚，图若干之资，努力进行；于江华之锡矿，尤所注意。克强先生坐言起行，从十一月十四日起，偕陈嘉会、陈家鼎、杨廷溥、金华祝等，前往萍乡、安源、湘潭等地调查矿务，计划作大规模的发展。

湖南从一九一二年起陆续遣送东西洋留学生，到一九一三年

截止，留日学生达四百七十名；西洋留学生共一百一十一名，计美国六十五名，英国二十九名，德国十名，法国四名，比利时三名。我是一九一二年被选派赴日留学的。一九一四年，汤寿潜把持教育，悍然取消所有留学生的官费待遇。我考进大阪商工工业学校，习采矿冶金，由留日学生监事处继续发给官费。大阪为日本第二大城市，有人口一百四十万。我当时住在市郊大仁二八三番地，读通学。初去时每月官费三十元，后来调升为三十六元，尚可维持个人生活。

大阪商工当时在日本是较有名气的高等学府，主要课程有：采矿业、矿政法规、测量学、普通冶金学、电气冶金学、水银冶金学、金属组织学、火药学、合金学等。除课堂教学外，并造矿山测量，到工厂参观试验。教师无论在课堂讲授或赴野外指导实习，都很认真。最近偶然翻出一本一九一七年写的日记：三月十日有什业武后，后藤科长介绍我等三人赴矿山实习，“并带余等，卒業归国立于社会，日当与欧美留学生竞争，倘不假就胜，不仅吾等之羞，亦日本与本校之耻也。君等务必尽力实修，专心研究学术，以求必胜。”（以下引文均摘自旧日记）

回忆在大阪商工求学期间，日本当局对中国留学生防范极严。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六日，“因森田宪忠兵衛工场参观，余以外籍人员，不能入场。当此留日之时，恐余等仇知其秘密也”。三月二日，“同族日人赴陆军炮兵工厂，余以外人见斥。”我在早稻田要求带进测量图，以作异日之参考。后藤科长已答应，西兴泽教授“有心不欲与之心，及既与之后，则曰：‘此国无发还之理；以和为交，实不得已也。’”这类事实在很多，不赘述。

一九一六年冬，我随第三十期留日学生回国后先到矿山考察，充实所学。因此，以留日学生同学会名义，很请农商部补助旅费。

翌年元月中旬，得到农商部第九十八号批复，略称：“该生等拟于毕业后考察国内矿业情况，实属有志向学。可资援例补助之处，事关教育，业经咨请教育部查核办理。”农商部批给教育部，教育部照应不批，我们的理想落空了。得不到政府的补助，个人有什么力量去考察呢。

一九一七年三月底在大阪高工毕业，采矿三人，我居其首。四月初，由矿业事务所接洽，至金泽游历考察。“归国游学矿业，不致全无经验，望泽兴叹。”五月初忽接家书，惊悉母亲在家乡去世，决定归国奔丧。五月十一日乘小轮从横滨开，十四日早抵上海。二十日抵长沙，与矿务总局接洽。是时新任官矿督办为湘乡黄仲祁（代表中路），部员陈九能（南路）、龙阳余焕宗（西路）付之。矿局挽留我在湖南工作，我以长沙时已受汉冶萍公司之聘，不愿违逆继任。回家奔丧后，决定往汉冶萍公司任职。记得去鄂乡看矿时，需几十元请到餐序几顿，也坐四个几合的轿呢轿子。在汉冶萍炼厂工作，月薪光洋二百元，而工人终日勤劳，难得温饱，劳保福利设施更谈不上。与技术人员相比，实为霄壤之别。

关于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的兴衰变迁情况，我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于一九六四年写过两篇文史资料上交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并附有几份保存多年的原始资料，可供参阅。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部）

## 辛亥革命往事拾零

刘 嵩

我生于清光绪七年辛巳四月初七（公元一八八一年五月四日），岁月不居，屈指行年九十有八。宋陆游诗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附号明村。我家世居浏阳县之永安市，距三汊水河。十岁时，始从江都就学，光绪庚子年，入县学为生员，不久易科生，兴学校。甲辰以前，长沙学堂之少，屈指可数，甲辰以后，风气初开，公私学堂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我以家无资，无力为县学堂继续课读，遂在永安市设塾馆授徒。后又游徙他乡，借笔耕糊口度日。

辛亥年，我在江苏淮安府城后街路任书局，安司管丞阮瑞，俗称文信师爷。知府刘名普待我不薄，每月薪水光洋二十四元，年终另有馈赠。这年春夏之交，我由淮安回到长沙，寄寓黄言东街黄氏试馆。记得离省垣不久，湘江水势骤涨，暴雨成灾，沿河小洲、田一带尽成泽国，街头挨门乞讨的触目可见，周见青黄不粒的孑，新谷尚未登场，遍地哀鸿，其惨万状。

九月初一，长沙新军反乱。这天上午，我正由又一村团台衙门商路经过，忽见无数新军士兵押着一个穿旧军服的人往外跑，边拖边殴打，甚至有用刺刀在他背上戳的，有人高声叫喊：“黄忠浩跑了！”始知被押走的是三湘总巡抚黄忠浩。事后听说，起义新军将他带到小西门，把他的头砍下来，抛在城楼上示

众，观看的人很多，没有同情他的。

反正以后，民间头一件大事就是剪辫子。人心思议，谁也不想再拖着辫子做清朝的顺民了。我的辫子是在反正这天就剪了的。剪辫以后，还同几个热心朋友一起，当街拦住过路人，一刀剪掉他们的辫子。随着政治态度之不同，有的兴高采烈，扬长而去；有的不好意思用帽子遮盖住，啼笑皆非，但又不敢公开反抗。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高兴的是绝大多数。

辛亥光复初，湖南自办的报纸，仅有《长沙日报》，日出一大张，销数不到一千份。长沙光复后，老友杨宗实（长沙县人，同盟会员）乃我与李任民、游大霖、饶某、陈某一起创办报纸，起名《大汉民报》，当年“大汉”之含义，犹如今日之“解放”。报纸从阴九月初一创刊，实际上是初二才在市面上发售。每日出一大张，是光复后首创的宣传共和、抨击专制的报纸，在社会上较《长沙日报》更受欢迎。而立宪派旧势力能不高兴，因我们只愿为反清革命造舆论，不去逢迎吹捧他们。

《大汉民报》的社址，设在曾子庙，创刊号没有《发刊词》，开头第一篇文章我写的《上焦、陈二督书》，陈述反正后当务之急，应出兵直攻武汉，北取幽燕，东出赣省，囊括江右。类似的议论，《大汉民报》记载甚详，省图书馆所藏旧报纸中可检索到，片纸只字，极可珍贵。还记得民报出刊未久，因报道消息得罪了独立第一协协统王隆中，他竟日空一切，派兵捣毁报社设备，逮捕工作人员。我因事先走避，得脱虎口，一张壮大革命声势的进步报纸，仅仅办了三、四个月就停刊了，我也从此脱离了新闻界，怕惹祸上身。

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野心勃勃，阴谋称帝。他知道湖南是西南门户，兵家必争之地，非派心腹爪牙坐镇

不可。于是，令汤梦铭为查办使，入湘威慑。汤下车伊始，为树其淫威起见，辟房一声，捕拿财政司长杨德邻、内务司长曾仲祁、教育司长唐联璧、审计处长易宗羲、警察局长文经纬等下狱，旋将杨、唐、易、文四人枪毙了，以残忍手段，博袁世凯心。曾仲祁本在处死之列（刑场予置两木棺多具，凡被杀害，事先各书姓名。自亦有姓名在棺上，传闻如前），后以北京有力者来电营救，得免于难。解放后，他任省人委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一九六七年一月病故，享年九十五岁），我时谈及五十年前往事，劫后余生，不独有隔世之感。

汤梦铭“查办”有功，取代谭延闿任湖南都督。都督府设有军法课，课设课长，外设调查组，名为调查“乱党”（诬国民党人为“乱党”，实乃诱惑志士，罗织成狱，这功袁戮。其法：先叫其结党集会，甚至供给经费，刊刻印章，制好旗帜，约定时日举事，一切布置就绪。于是，军法课的调查组长李某，要某即向其上级“告发”，领队捕人，如临大敌，人员罪证，无一脱网。军法课长华世燊（人不知其名，皆称“华霸王”、“活阎王”），在伪证罗列下，用尽非刑拷问，甚至制造供词，叫令“某某”等志士，于受诬刑辱后，勒打招供，引颈就戮。湖南全省，一片地无天昏，陷入悲惨世界。

长沙岳麓山上山古道，原经爱晚亭攀青枫峡，上至岳麓寺，有人视为险途。一九一七年春，黄克强先生灵柩自上海回湘葬麓山，始筑马路绕出峡外，是役我亦曾从事。解放后造路加修，更为平坦。一九七二年我九十二岁初度，偕老伴拄杖游山，写过小诗纪事：“麓山马路恣纵横，我亦当年创建人。回忆袁公背斧日，灵犀执辔路初平。”光阴如白驹过隙，转眼又六易寒暑了。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史研究馆供稿）

## 记《血泪书》案与《俚语日报》被封

马文义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冬，正华兴会成立的时候，黄兴、周震麟、邹价人等，为了鼓吹反清革命，曾发行了一种宣传品，名叫《血泪书》，由周道映（震麟）、邹价人直接负责。其形式和书信相类似，内容是从一连串的外侮说起，抨击清廷之懦弱无能和屈膝媚外的种种丑态，末有“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血泪陈词，亡望速起”等语。书系在日本印成小册子，携回湖南后分三路散发，各由专人担任联络：周斌任南路郴州一带，陈宗海任中路宝庆一带，刘运鸿（后改名运锋，又名孟固，慈利人）任长沙、常德、澧州、辰州一带。刘以其父景坤在湘西任武职，不敢前往。乃回长沙在贡院西街《俚语日报》经管银钱账目，乘机散发宣传品。《俚语日报》是用俗语编成的小报，其宗旨与《血泪书》小异，但不很激烈。社长为宋海阔。未几，巡抚端方派卫队将刘捕去，说他是革命党首领。经端方和学务处张小浦审讯（时刘在高等学堂读书），刘矢口不认。端随取去眼镜注视刘一番，对张说，“这是一个小孩子呢？怎会在《血泪书》上签名呢？如此年轻的稿子怎能做得这样的文章出来？”便令刘写字一张核对笔迹，亦不符。随将刘收押抚署一月后，发交长沙府，又经知府刘若愚审讯数次，终不得结果。刘卒被囚禁三年，方获释放，《俚语日报》亦因此案被查封。

解放后，刘运锋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病故，终年七十九岁。以上所述，是他生前在闲谈往事时亲口对我说的，返家后濡笔记之。

一九六一年六月

(原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史研究馆供稿)

## 辛亥革命前的女子教育

许绍康

距今七十五年前创办的湖南公立第一女学，是辛亥革命前长沙城里的第一所女学堂。我是这个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对当年学堂的情况，旧事依稀，还记得一些。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见闻，可以看出辛亥以前湖南女子教育的轮廓。

湖南公立第一女学是由我夫家的叔父龙翼溪（綏瑞）和留日归国学生俞经纶（蕡同）、胡子靖（元慎）、许直（玉屏）等发起创办的。许直是我的父亲，时在北京留英学务处工作。他们事先拟出“省垣湖南女学堂章程”，报经湖南巡抚赵尔巽批准开办。这个章程规定开办女学堂的宗旨是：“务使学者心明如镜，胆达如情，主张推广教育之范围，实导家庭教育之先。”

女学堂地点最初设在长沙城内北门外又记一条巷子内。因房屋狭窄，不久就迁到南正街唐宅（皮鹿门住宅隔壁），是一栋三进五开间的旧式房屋。大门口挂有“湖南公立第一女学”的牌子，还挂了巡抚赵尔巽的一块虎头牌，上面写着：“学堂重地，闲人免入”。

学堂的名誉监督是龙洪森（龙翼溪的父亲，在吏部侍郎）的夫人雷氏，她有次开学就来带领学生向孔夫子的牌位行礼，平时也来学堂看看，但不管事。实际负责的是监督许直。他是我父亲的叔祖母，因排行第九，大家叫她“许九姨太太”。付一（台演

是黄克强先生的继母易氏，大家叫她“黄老师”。黄老师文化程度不高，只认识大字，学生执执她教认字，有的字写不出，就去找她在墙上贴的百家姓和《千字文》，看清了再写到字上。许九妹和黄老师，都把学生看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从教育到生活，无一件事不关心。那时候学堂的前进做教室、自修室，二进是许九妹带学生住，三进是黄老师带学生住，有几位老师也住在三进。学塾里请的文王工妈和张妈，则住在杂房里。

龙溪溪等所拟的学堂章程上，规定的课程有修身、国文、算学、历史、地理、美术、人身生理、裁缝、理科、外国语、体操、教育学等。实际上有的课程如人身生理、理科、外国语、教育学等科都未开办。开办的课程中，教国文和修身的是吴老师、江老师，教算学的是郑老师，教理科的是江老师，她们都是女性。唯一的男老师是教体操的黄珍老师，即黄克强先生。

学堂章程规定修业期限为寻常科二年，高等科一年，共计三年。实际上在龙溪溪初开办时只有甲班一班，学生十余入。学教是许、龙两家的女儿。后来迁到府宅，才添招一班叫乙班，合计三十多人。我记得得起姓名的有：许毅、肖儒、肖璧、许思道、许佩琼、龙珏、龙希韶、李兴亚、蒋保仁、罗正珏、罗正莹、吴仪、吴双、吴钊庆、余浣华、杨忠、唐汉芬、陈凤仪、左加、潘平秋、俞子暄、胡懿珏、陈德祖、曾为华、郑克恒等。其中年龄最大的如蒋保仁、俞子暄、曾为华都已二十多岁；最小的是我和龙珏，我进学堂时不到十二岁，龙珏比我还小一岁。杨忠是杨度妹妹，郑克恒是郑老师的女儿。

一九〇三年七月十日（光绪二十九年农历五月十五），第一女学正式开学，只上两节课，学堂迟两个半月。黄珍老师是第二年上半年才来的。

操课的实际只有我们十几个没有包过脚的太脚姑娘。黄老师不到学堂里来，而由我们自己整队到东茅街许宅过厅去上操。他常穿着一件蓝色的纺绸长褂，教我们翻杠子，做柔软操，玩哑铃。没有双杠设备，就要我们把床铺架子搬出来代替，叫我和龙玉表演给大家看。柔软操是日本式，黄老师从日本学来的。黄老师教学生很耐烦，从无疾言厉色。乙班同学李兴亚，是黄一欧的未婚妻，她上操时立正姿势不对，黄老师亲自去纠正，顽皮的同学就细声打趣说：“家爷老子替媳妇搬脚！”

在女学堂里，学生和外间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有一次，戊戌政变中被害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夫人到学堂来参观。她带来谭嗣同的遗像，并对我们讲了谭嗣同的牺牲经过。大家看了谭烈士的遗像，又听了谭夫人的介绍，都很感动，有的人还流了眼泪。激发了对清朝专制统治的痛恨。

赵尔巽也到学堂来参观过，记得是由龙英溪、胡子靖、俞经诒等陪同来的。他对学生讲了话，讲些什么我记不起了。参观以后，奖给每个学生一根竹压尺，还奖了一部《逃津宝筏》。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在七十多年前的社会里，却不是一样，男女授受不亲，界限分得很严。下面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学堂有个管收支银钱帐目的会计欧阳先生，他是男的，厨房工友也是男的，他们都在墙外，不准入内。墙上开了一个洞，开饭时，把饭菜茶水从厨房里用转盘转出来。二、章程上规定是住院生、走读生各半，实际上学生都住宿在学堂里，没有走读生。每逢星期六下午，家长打发轿夫抬着轿子，拿了竹制的半边牌子（另半边存在学堂里，就象中药铺检药的牌子一样）到学堂去接人，星期日下午又用轿子把学生送同学堂，取回半边牌子，以备下星期再接。这两件事，今天听起来是

笑话，在那时候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并不感到奇怪。

前清癸卯、甲辰年间，科举未废除，学堂刚兴起，封建顽固势力对新兴的学堂看不顺眼，尤其是对女学堂看作眼中钉。他们一有机会就想兴风作浪。尽管女学堂的男女界限分得这么严明，可是他们还要反对，必欲去之而后快。一九〇四年夏，赵尔巽去职，陆元鼎署理湖南巡抚，他是一个顽固派。御史杜乔生上本奏参，说什么湖南开办女学堂，“男女混杂，流弊滋多”，一般封建老顽固，也到处造谣中伤。陆元鼎奉旨饬令停办，学堂于一九〇四年秋遵令停办，实际只办了一年多时间。

第一女学停办后，许黄萱佑于第二年考取官费留日，进了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师范班，与秋瑾女侠同班同学。这时她已四十四岁了，是同学中第二个年龄大的（最大的湘阴人聂某，四十九岁）。她毕业回国后，在长沙东乡创办隐惜女学（杨开慧烈士在此读过书），一九五三年病故，终年九十二岁。一九〇五年与许黄萱佑一道考取留日的，还有许骥（范旭东之妻）、许骥（仇亮之妻）、许璧（章勤济之妻）、吴双（胡适之妻），师生五人同班共学，一时传为佳话。

以上所述，是众所周知的国立第一女学的情况。国立第一女学设立以后，一九〇四年春，又有曾广镛（李夫人）在长沙设立淑慎女学，刚设立不久，也与国立第一女学同样遭致夭折，不过是昙花一现。

国立第一女学和淑慎女学夭折之后，一九〇五年五月，留日归国学生周自齐又以泰安里周家花园为校址，创办周氏女塾，因避清廷禁办女学堂之忌，故用此名称。到一九一〇年七月，始取《诗经》首篇《国风》之义，改称“周南女子师范学堂”。周氏女塾初创时，只有周姓家属十余人。以后逐年增收外姓，学生名额倍增。

周南第一班师范毕业生，大部分都从事女子教育事业，如王毓在长沙创办培德女校，李崇莲在湘潭创办育德女校，其他则在长沙各女校担任教师。周家纯就是朱剑凡，原名英琪，官氏的后裔子孙，清朝入关后，因怕遭受歧视，官字加耳改作周了。辛亥革命光复后，周家纯登报声明恢复朱姓，改名剑凡。

关于辛亥革命前湖南的女子教育，就我所知，提供上面点滴材料。我今年八十六岁了，经历清朝、旧民国和新中国三个不同的时代，目睹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繁复万千。我深刻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妇女才能彻底翻身得解放。

（龙永宁记）

## 宣章辛亥起义国忆

14

宜章县是湘粤交界的一座山地，粤汉铁路未通车前，交通极不方便，文化经济也非常落后，但人民斗争性强，民间枪技也很多。清廷为镇压人民，在其南之白沙、迳湾、梁田三处设三县，专司镇压之责。由于清廷压力太大，群众反清情绪激昂，辛亥革命前，本县就有不少知识分子奔走呼号，响应反清革命，其中最杰出者为彭邦族。彭邦族，号长春。宜章黄沙坪塘石村人，一九〇四年留学日本，进了政法大学。翌年，孙中山和黄兴等在北京组织同盟会，彭邦族加入了同盟会。一九〇六年，黄兴命彭邦族、刘重田回邵阳，受他组织在湖南临武、宜章、永兴、嘉禾等县门会和会党（三点会），随时准备起义。彭在嘉禾县与王直注、临武县陈松年兄弟及彭马彪等开设造纸厂，名为造纸，实则作为准备起义的机关部。当时邵阳一带的反清革命空气非常浓厚，会党群众声势浩大。

辛亥九月间，武昌革命军攻占紫阳宫，即派郑人庭、刘金声、李、王、陈、徐，取道湖南起义。先是，在湖南各县的革命军都推举李、王、陈、徐为同盟军来做了几个月的警察局长，有点关系，所以武昌革命军没有发觉。辛亥八月下旬，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李、王、陈、徐即由湖南乘火车到武昌，到武昌后，即由李、王、陈、徐分头到各机关作（县立高等小学教员），到武昌后，即由李、王、陈、徐分头到各机关作

埭石村交彭邦栋亲收，我当时是县立高等小学的学生，年已十八岁。他们遇有机密的事件，都是派我传达的，从此，我就边读书边参加革命工作了。彭邦栋得到这个消息后，即召集全县革命人士，如张清源、张志德、周文斌（正群）、吴燮、蔡子英等在埭石村开会，商讨组织队伍起义。会上，决定分途进行：张清源、周文斌、陈森等负责组织芭篱一带地区的农民；吴燮、曹献存等负责组织近城区一带的农民；蔡子英、彭汉兴等负责组织黄沙一带地区的农民；彭遂良、彭昭等负责率领在湘粤交界之潭源洞练的民军，所有以上各路队伍，统限第三天下午七时以前集中火烧坪待命。彭邦栋部署宜章起义军事后，随即飞函嘉禾李国柱，促其迅速组织临武、蓝山、嘉禾等县农民进攻桂阳、常宁，与郴宜民军在衡阳会师。到第三天，宜章各地区农民及民军，果然集中到离城三里的南门外火烧坪，共有一千多人。因为原来有些基础，所以容易组织起来。彭邦栋亲自向大家讲了话，说明反清革命的道理，再三叮嘱要勇敢作战，要遵守纪律，不要骚扰百姓。并写了一篇讨伐清廷的檄文和一封敦促知县吴道晋投降书（这两篇文告，在宜章曾传诵一时，解放前，宜章纂修县志，邓中夏烈士的父亲邓典谟曾向我要去，供修县志参考），派员送交吴道晋。他胆子很小，收到檄文和促降书后，吓得魂不附体，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想携眷逃走，未果。彭邦栋在撰写文告的同时，又具体布置了进城受降的仪式，规定前头高举两面军旗，上写“大汉”二字；两列卫队，两列大刀队，最后是大队伍紧随前进，从火烧坪出发，进城后将司令部设在考棚内，队伍分驻城厢内外。于是，马上通知吴道晋，准备明天在县衙门向民军投降。这时，全城沉浸在一片欢乐中，都知道民军快进城了。我们学校已停课一天，彭邦栋到埭石去看情况，看到民军都用白布写着饭碗一

的“大汉”两个字，缝在前襟上，背上都揸着马刀，有的手上拿着来福枪和鸟铳，有的拿着梭标或木棍，头上用青布扎着包头，气势非常雄壮。我在城外跑了很久，没有看到彭邦栋等人，只遇着我村有名的大汉彭耳贵（彭邦栋的保镖），他说，吴道晋已经投降了，明天就要跟彭邦栋进城受降。

第二天，我到县衙前面去看，街上大一点的铺子已关上了门，没有做生意了；小点的铺子还照常开门营业，来来往往的人却特别多，听说是有不少民军已混进城来了，整个上午没有动静，下午却听说彭邦栋带了几十个人进县衙门去了。黄昏时候，突然人声鼎沸，听说彭遂良、彭昭两兄弟在县衙门被哨官周德升的兵打死了，我们学校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引起了混乱，通夜没有睡好，胆小的同学捆好被盖，准备天亮就回乡里去。从学堂窗户往外看，不时看见城内有几处起了火，断断续续地有枪声和叫喊声。天亮后，街上已贴了湘南革命实行团主任彭邦栋的安民布告，要市民各安生业，并说吴道晋、周德升都已逃跑，宜章已被民军占领。民军占领宜章后，彭邦栋等人随即整理部队，准备率部北上，攻占郴州，不料只隔两天，郴州也被本县的民军占领了；随后不久，整个湖南省都光复了。

彭遂良、彭昭两兄弟是怎样牺牲的呢？原来彭邦栋进县衙门与吴道晋谈判受降条件，是由彭遂良兄弟带领民军数十人护卫去的。到达县衙门时，吴道晋只准彭邦栋带两名保镖入内，说人进去多了，恐怕发生冲突。遂良兄弟和几十个民军，均被阻在大门外。彭邦栋与吴道晋谈判投降条件，整整谈了半天，吴道晋只承认移交文卷及库存钱粮，要随身带走武器和印信。彭邦栋则坚决反对，一定要收缴武器和印信。为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谈来谈

心彭邦栋为吴昭害，遂令所带的几十名民军冲进衙署大门。洋良兄弟各持手枪，身先士卒，向前猛冲，他俩都早已剪去辮子，目标显著。埋伏在县衙门两边厢房的清兵，由哨官周德升指挥顽抗，扫射民军，彭遂良、彭昭两兄弟因此牺牲了。同时牺牲的还有一排长，左腿被击中一弹后，还高呼口号，直到腹部又中弹才英勇殉难。此人系广东籍，可惜我已忘记他的姓名了。彭遂良、彭昭两兄弟殉难的消息传到城外，在外待命的革命党人张清源、张志德、周文斌、曹献春等，即率部爬墙冲入县衙署内，吴道晋、周德信见来势不妙，乃偕十余人枪越墙逃跑了。

宜章是一个偏僻小县，这次反清起义的革命行动，并无外力支援，完全是本地人组织发动，自己干起来的。这是可注意的第一点。民军纪律严明，在一千多人围攻县城的情况下，商民住户均未遭到损失。县衙署所存之现银粮食亦未被清吏盗走，点滴归公了。这是可注意的第二点。这次起义的领导者，虽然多是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却是正派人物。如彭邦栋在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残杀共产党人时，他曾多次掩护营救过共产党员，他一生除在都督府当高等顾问及当选国会议员外，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都没有做过官。直到寿终正寝，还是两袖清风。这是可注意的第三点。

湖南全省光复后，谭延闿继焦达峰为都督，认为宜章辛亥起义影响很大，对参加这次起义的人士，都有所安置。彭邦栋被聘为都督府高等顾问，并当选为国会议员；郑人康为众议院议员；周文斌为省议员；彭陶为新田县知事；吴燮为嘉禾县知事。彭遂良、彭昭两兄弟，由彭邦栋呈请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总长黄兴转报孙大总统批准，彭遂良照大军校阵亡例予恤，彭昭照左军校例予恤，并咨行湖南都督查明遗族分别给予抚恤金（见南京《临

时政府公报》第五十三号)，遗体迁葬于长沙岳麓山。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得势时，组织共和党和国民党竞争。宜章以李森为头目，拉拢一些土豪劣绅组织共和党支部，与国民党为敌，互相厮杀，纠缠不休。过去参与起义的张清源、蔡子英等都死于党派斗争中。李森等曾在宜章共和党支部头门贴出一副对联：“三轩会稽雪旧耻，一匡天下新诸侯。”可见宜章的党派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这种党派斗争，不仅宜章如此，湘南各县皆然。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李国柱。李是嘉禾人，号石泉，青年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我家住在宜章黄沙堡垮石村，小时候亲见他多次来到垮石找彭邦徐、彭彪韶等进行革命活动。他同彭遂良、彭昭也很要好，湘南各县都是他的活动地区，一呼百应，很有号召力，孙中山在书札中称赞李国柱是湖南最革命的同志，他从未背叛过孙中山。他本是嘉禾县的大地主，毁家纾难，赞助反清革命，把田产都卖光了。李很有骨气，蒋介石窃国时，他从不到蒋手下讨官做。抗战前住在上海法租界，生活来源主要是靠李云杰按月接济，一送几百元。抗战期间住在桂阳县城郊，生活艰苦。我和他见面时，他对蒋介石的祸国殃民，极为愤慨，对共产党在陕北根据地的作为，备致赞扬。听说他对在桂阳以办学作掩护的共产党员李木庵等，说过一些好话，对进步青年是很爱护的。这是他从几十年的经历中得到的事实的教育。解放后不久，李国柱在原籍病故。

本文所叙述的一些关于辛亥宜章起义的经过，都是我身经目见的事实。惟以年深月久，错漏在所难免，亟盼得到指正。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史研究馆供稿）

## 辛亥衡阳光复经过

屈子健

辛亥农历八月十九，武昌城里一声炮响，全国各省先后响应，湖南省会长沙于农历九月初一起义，全省各州县包括衡阳在内，都震动起来了。

在谈衡阳光复经过之前，先述一下衡阳当时的情况：衡阳在清末为衡州府城，是衡永郴桂道的首府。各级文武官署，有衡永郴桂兵备道、衡州府知府、衡阳县知县、清泉县知县，武官有协台、游击衙门。自一九〇五年起，废科举、兴学堂后，江东岸有湖南提学使司主办的南路师范学堂（监督曾熙），知府主办的衡州府中学堂（监督向乐谷），小西门外莲湖书院改办衡阳县高等小学堂，大西门岳屏书院改办清泉县高等小学堂，西湖书院开办衡清两县合设的中学。胡道台新办南路实业学堂于考棚，派杨寿伯为监督。此外私立中学有周凤吾创办的成章中学，万运鸿创办的道南中学，均系租借祠堂庙宇，设备简陋。以上公私立学校，学生均少，最多四班，少到一班，一般校规都很严，学生非请假不许出校门一步。府城内外居民不过五、六万人，除商业、手工业各行会为少数人把持外，没有人民团体组织，没有报纸，只学宫街有派报社一家，专派销上海《申报》和长沙报纸，因交通不便，长沙报纸也需隔三、四天才能看到。

长沙起义，衡州府城震动，知府禄显（蒙古人）弃官潜逃，

道台和知县均匪不知所在。谣言蜂起，全城惊慌，警察日夜站岗，维持秩序，但商店仍开市，交易如常。

辛亥五月，我由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理化专科毕业，得南路师范学堂庶务长黄秋实介绍，到南路实业学堂活动理化教员未成，闲居家中。武昌起义几天后，同几个同学到江南会馆听到刘嵩衡演说一次，初次见面，很佩服其富有新思想。以后就没有见他露面了。长沙起义后，府城尚无人发动响应，报载焦达峰委刘嵩衡为南路招抚使，大家都很盼望，可是他迟未回衡，不知何故。

九月初九上午，府城居民忽然轰动起来了，大家传说有刘恩普其人，在北门外草桥、筷子洲集合数百人发动起义。我在家里听到这个消息，急忙跑到优师同学廖调阳家，邀他同往观看。刘恩普是我在衡阳高等小学第一班同学，年龄比我大，当时我十六岁，系同班中年岁最小者。学生全部公费，除供给食宿书籍笔墨课本等外，并发给衣服鞋帽。因此，同学们大都努力学习，成绩优良，可是刘恩普对学习不重视，行动诡秘，经常请假，不知在外面干些什么。我知道他住筷子洲，没有往来过，高小第一班毕业时，全部升入衡清中学，刘恩普没有升学，不知何往。后来才知道他早已加入同盟会，曾在广州参加革命活动，潜返衡阳，秘密联络群众，宣传反清革命。武昌起义，长沙响应，他见衡城毫无动静，为革命热情所驱使，乃于初九清晨，迫不及待地发动平日所联系的同志和草桥附近一带劳动人民及青年学生，每人手执白旗，在筷子洲空坪集合，共计三百多人。他自己骑着马，高举白旗，率领参加起义的群众，从北门入城，一齐向南门前进，沿途齐声喊“打倒满奴”、“光复汉庭”等口号，号召全城商店一律悬挂白旗。一时观者如堵，走至西门，这支起义队伍达到雁峰寺广场时，南师、府中、衡清中学、实业学堂学生亦陆续赶到，刘恩

普登上戏台，宣布开会。他作演说，大意说，清朝统治两百六十多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仁人志士多次起义都失败了，现在孙中山、黄克强领导革命成功了，推翻了专制，要建立共和，大家赞成不赞成？群众热烈鼓掌赞成，顿时欢声雷动。随即宣布衡州府反正，决定电省报告，并请原任衡阳、清泉两县知县临时出面负责，维持现状，静候省方命令。当推南师学生谢晓东负发电之责，并请该校庶务长黄秋英垫付电费。刘恩普宣布散会后，仍骑马率群众队伍几百人沿河街游行喊口号，回至北门外散去。我参加了雁峰寺坪的群众大会后，缓步回家，见全城悬白旗，喜气洋洋，男女老少，无不面带笑容，内心感到非常高兴。在家吃了午饭，即到剃头店剪了辫子，去掉了讨厌的豚尾。听说府正街钟鼓楼已贴出中国革命同盟会招牌，我赶到钟鼓楼，正见刘恩普和几个人在该处布置一切，其中有我认识的谭子中，是同盟会会员。我见他们也都已剪了辫子，建议即组织几个小队，到街道上劝人们剪去辫子。刘恩普答应照办，并说见到衡阳知县喻卓吾，喻同意今天衡城的反正大事，已经出来负责维持秩序了。我说：“衡城反正，人心大安，这是你们的功劳啊！”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史研究馆供稿）

# 郴州辛亥革命始末

李大梁

郴州僻处岭峤，风气闭塞，诸事落后。惟于辛亥年响应武昌起义，尚能奋起直追。溯其原因，由于郴民素称强悍，清政不纲，人心思汉，率多参加哥老会，到处开山立堂，密谋活动。太平军兴，先后经过郴州三次，民之附和者，不下数千。清末，政愈紊乱，后起青年，受康梁的维新策动，孙中山的革命号召，势如潮涌，而郴州因向多会党组织，尤易感受新的思潮。况复有衡山郑人康、宜章彭邦栋、嘉禾李国柱等革命同志，以因郴居上游，南通广东，地当冲要，岩壑深邃，便于进战退守，特向郴中会党联络策动，进行更速。嗣得州人李维国等，将《洞庭波》、《警世钟》、《黄帝魂》、《扬州十日记》等宣传品，寄郴散发，互相传阅。有志之士，受此宣传影响，义愤填膺，更趋激烈，常于稠人广众中，痛陈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前途危险。因此，人无智愚老少，如大梦初醒，知当口朝政腐败，强邻相逼，非推陈革新，不能图存。迨辛亥武昌起义，湖南首先响应。风传至郴，有州庠生谢凤池，系同盟会员，单身往弼州牧陈仰山，陈述利害，促其响应，仰山初尚犹豫，即夕奉到湖南都督府传檄，遂命谢向各机关学校团体，先陈其意，以观向背。州人对于革新运动，事前早有酝酿，今得此机会，莫不欢忻鼓舞，一致赞成，遂于九月十五日集会州署，宣布独立，以响应之。

一九六一年八月

（原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史研究馆供稿）

## 回忆辛亥革命前后的醴陵

李味农

清末，醴陵因有株萍铁路横贯东北境，交通便利，风气初开，新式教育逐渐萌芽。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在长沙时务学堂开办的影响下，先有清安铺刘氏兰谊小学堂的创设，接着有王仙小学堂、县城朱子祠小学堂、县立女学堂、磁业学堂等相继开设。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渌江书院改为渌江学堂（后改渌江中学堂），聘刘揆一为监督。辛亥革命前一两年，我在渌江中学堂读书。那时学堂的监督是李越圃，史地教师左铭三，阳徙园，体操教师李赞卿等，他们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热心宣传革命，发扬民族精神，对鼓舞学生参加辛亥革命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当时，县中著名的同盟会员有潘昉、宁调元、宋随裘、杨卓林、文斐、张桓、谢逸如、肖翼鲲等。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张桓自日本归国，奉黄兴之命联络内地会党。他与龚谷台及各派领袖集议，以醴陵为根据地，策动萍、浏、醴大起义，三路直捣长沙，一俟械弹运到，立即发动。后因岳州水警破获革命党人所运军火，各部被迫提前发动。结果事败，县人被捕遭杀害的，有宋随裘、李经其等三十六人。

在此同时，宁调元也奉黄兴之命自日本回国，策动萍、浏、醴起义，到起义军已失败，宁返抵岳州时被捕入狱。

同盟会当时在醴陵朱子祠设立秘密通讯机关，以潘昉为主任，

他公开的身份是朱子祠小学监督。焦达峰曾来县联络会党，寓丁祠、何祠，来来去去有两年之久。辛亥年初，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湖南人民群起反对。醴陵教育、工商各界，也曾在城隍庙举行大会，表示响应。

武昌起义后不久，湖南宣告反正。时江西常备军统领齐宝善率管带胡廉等，分驻老关、上栗市，陈兵威胁醴陵，市民纷纷迁徙，谣言蜂起，一夕数惊。湖南都督府派潘昉为江西宣抚使，赵春霖为新军第二镇统制，率兵入赣。不久，江西独立电到，人心始定，知县裴炳耀照常视事，随即改知县为县知事，设醴陵县行政厅专管行政。各学堂也一律改称为学校，监督改称校长，到处一片新气象。

辛亥反正以后，社会风气大变。男子普遍剪了辫子，妇女放了足。我的辫子是在反正前夕剪去的。多数人在反正时自动剪了辫子，也有不愿剪，被人拦路剪的，个别顽固分子害怕没有辫子见不得皇帝，就把它盘在头顶上，用帽子遮起来，借以逃过这一关。衣着方面，过去男子穿长袍红马褂，戴碗帽红顶子，这时候在街上顿时绝迹了，而是青色和黑色的短衣、短制服盛行一时。总之，一切都走向革新，连喝酒猜拳时的“全福寿”酒令，也改用革命口号来代替，即：一独立，二对抗，三维新，四百兆（指四亿同胞），五大洲，六君子，七战士，杀八旗，九十九（指明刘伯温《烧饼歌》中所说的“手执干戈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十排满。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醴陵各界在县城举行庆祝大会，到各界群众和学校师生近万人，会后举行游行，全城悬灯结采，燃放鞭炮，庆祝民国诞生。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供稿）

## 湘潭辛亥革命二三事

马文仁

### (一)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八月中旬)，我因新婚之故，由长沙高等实业学堂请假回家，未及一月，即听到长沙反正消息。当时交通阻滞，我家离中路铺驿路仅二里许，因驿路上有来往送公文的人，乡人去该市买东西，比较容易得到新消息。当时乡村中虽知道省城有了反正的事，然而平静如常，居处安定，毫无波动。约一个月后，中路铺街上贴出了谭延闿署名的告示，当时，一般乡民听之任之，视若无事。而地主豪绅，也无惊慌状态，认为光复之事，未必即能成功，他们表面上保持安静，观看风色。这是由于清朝的长期专制统治，用残酷镇压，造成广大人民内心恐惧，对反清革命，大快人心的大事，亦不敢即露声色，再则是民气闭塞，一般人多不问国家大事。当时虽有兴办学校之举，但学校设立极少，入学读书的学生亦少，如我的家乡，只有小学一所，学生仅四、五十人。教师多为冬烘秀才，不但对新知识茫然无知，且对旧知识也极不够，更不要希望他们作反清革命、光复汉族的宣传了。

### (二)

辛亥革命前，湘潭知县吕某(忘其名)，是一个年龄不到二十

五岁的青年，凭着一个有势力的后台，得到此知县缺的。当时湘潭老百姓都讪笑着说，这人如此年轻，如何能作父母官？但他用了一个老奸巨猾的师爷，靠着这个师爷的撑腰，处理政务，居然也干了大约一年时间。长沙反正后，吕某见大势已去，恋栈不行，携带妻室逃跑了，不知去向。

湘潭前任知县余价藩，任职有两三年之久，因其处事灵活圆滑，城乡人民，对他还有些好感。余价藩卸任后，仍家居湘潭城内，反正时，吕某逃匿，县政无人负责。各界人士只好找他出来，暂署县政，维持一切；后不久，奉命真除，在任期间，并无什么建树。

### (三)

一九一二年，湘潭成立县议会，举办选举，先父与龙（号东霞），被选充县议员。当时县衙门送给先父当选通知时，说明先父是由十九票当选的。我们当时深为惊异，是十九个什么人投的票呢？后经一位参与了那次选举的乡邻人相告：投票选举是在离我们居地约十余里的黄茅驿（我们住在南区十都八甲，而黄茅驿则在东区九都）举行的。他怀着好奇心到了黄茅驿，那里聚集了一二十人，大家看完了选举办法后，都要投票，如是当场集议，看举一个什么人为好。大家认为，只有举先父为合格，故每人各投一票，共十九票，云云。至此，我们的惊异心思，才得到了解释。

先父是清朝的秀才，后补贡生。他对地理考究工作有素养，曾写成《后汉郡国志》，刊入《后汉书集解》；又著有《晋书地理志》，自费印成单行本。

先父在反正时之所以被乡人选为县议员，据我猜想，可能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先祖在世时，以救济贫苦乡人为怀，曾倡议创

办义仓积谷，每年五月发借，秋收后归还，以度荒年欠岁。先父对此项义仓谷竭力维护，曾反对本甲少数豪绅挪义仓谷去办团防，故当时义仓谷得以继续保存，反正时，乡民感念前情，故推选为县议员。他当选县议员后，在议会内，凡是认为应兴办的事，多推先父拟稿，再开会讨论、修改，送交县政府执行，在当时来说，也起了一些推行新政、改革积弊的作用。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史研究馆供稿)

## 辛亥岳州光复见闻

廖莘耕

岳州西濒洞庭，北枕长江，东抱金鸡（山名，原名金鹗山），南拥邕湖（俗称大桥湖），为水陆交通枢纽，湘北门户，形势险要，历代视为重镇。辛亥武昌起义，湖南首先响应，岳州即随长沙后易帜反正，耕市不惊。兹就我的亲身经历和见闻，略述经过如下。

岳州反正前夕，有同盟会员李琦（纯菴）、童杰（健吾）、彭承彦（寅叔）、葛仰乔等在教育界和绅商各界中进行革命活动，揭露清朝政治腐败，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号召群众组织力量，从事反清革命。因此，自武昌首义后，革命风浪，遍满洞庭，爱国志士，跃跃欲试。当时，驻岳州的清朝官吏有镇台鲁某，岳常澧道道台卓孝复（福建人），岳州知府魏景熊（湖北人），巴陵知县梁鸿藻（广东人），前路巡防营统领吴耀金，岳沅水师统带柳若乔，等等。长沙光复的消息传到岳州后，清吏恐慌万状，表面故作镇静，一般居民群众和商店铺户则欢欣鼓舞，准备迎接反正。

十月二十四日（农历九月初三），湘鄂义军总司令阎鸿飞（长沙人）率湖北新军李树芝部<sup>①</sup>，分乘四条小火轮，由武汉驶抵岳州，驻岳文武官员眼见兵临城下，大势已去，决定降服，由鲁镇台，

---

<sup>①</sup>据胡祖舜著《武昌开国实录》载：李树芝当时是步队第十六标统带。

卓道台率领徒步出城，到堤上迎接义军，全城家家户户遍插白旗，鞭炮声不绝于耳，人人喜形于色。投降清吏见过阎鸿飞以后，穿着便衣在主要街道上行走一周，表示已经投降归诚。可是，就在阎鸿飞离开岳州去长沙的当天晚上，他们都潜逃无踪了。

清朝官吏逃走后，谣言蜂起，人心浮动，同盟会同志邀集各界代表在巴陵自治公所开会，商讨善后办法。一致认为，清吏已降且逃，岳州和平光复，当此新旧交替之时，应设过渡机构，维持地方秩序，使群众各安生业。决定成立巴陵临时事务所，在原县衙署内办公，推刘光谦（次贞）、邓振声（瑾珊）为正、副所长。下设民政、财政、教育、警务四科，由方朝桓、龚绍分任民政、警务科长，刘光谦、邓振声分兼财政、教育科长，虽然有了自治机构，地方秩序并不安定。光复后一星期，吴耀金挑迭巡防营强悍士兵，行凶杀人，夜半率部窜至离城五里许之枫桥湖，大肆抢劫，在湖边掳船窜新堤后溃散。

岳阳光复时，我在离城六十里的新墙镇敬修高等小学堂教课。农历九月中旬，李铸派专人送信给我，说：“有要事相商，望火速进城一叙。”我接信后，即进城见李。寒暄过后，他要我乘木帆船押送从广东运来的枪枝弹药，去武汉接济革命军。我以有病在身推辞，他亦未再勉强。是时，县立高等小学堂学生闹风潮，赶走两个校长，一时无人继任，调我以监学名义代行校长职务（翌年，县教育界另举李吉荪为校长，我仍任监学，兼教算学，连续在校任教职员，为时五年半）。

光复后，岳州社会风气一新，首先是大家忙着把辫子剪掉了。不愿意剪辫子，偷偷地盘在头上用帽子盖着的，只是极个别的顽固派。其次是雷厉风行地禁吸鸦片。县里成立禁烟局，委派葛仰乔（巴陵人，同盟会员）为禁烟局长。葛出布告痛言鸦片烟毒害

之大，劝告吸者戒绝，同时派人查禁烟馆，搜集烟土、烟具，集中焚毁，并将凶恶顽抗的烟馆老板江老五（俗称“江老虎”）、刘某（俗称“刘王爷”）予以枪毙，以儆效尤。乡村小市镇的烟馆同样严行查禁，勒令改营他业。经过这次严厉禁烟之后，岳州城乡烟馆，暂时敛迹。

焦达峰、陈作新被杀害后，谭延闿接任湖南都督，委派何陶（醴陵人）为县知事，莫同仁（慈利人）为地方法院审判官。何到职后，改事务所为行政厅，仍设民政、财政、教育、警务四科。何、莫两人在岳州毫无政绩，有人撰联讽刺：“何知事，知何事，何必知事；莫审判，审莫判，莫能审判。”横披是：“莫可如何。”我最近问过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对这付对联，都能顺口成诵，可见印象之深。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时年九十二岁

编者按：原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任伊平先生（已故），于一九六四年写了《辛亥岳州光复经过》。我们参照任伊平遗稿，对本文作了补充。当时曾将任稿寄请国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阎幼甫先生（即阎鸿飞，已故）校阅。他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写了回信，摘要如下：

承寄任伊平先生所写《辛亥岳州光复经过》一文，已经拜读。作者为岳州人，目击的事，别人无法插嘴，时隔五十多年，有些或许是记错了。现就我所知道的，指出数点：

一、道台卓孝复，不是肖复；福建人，不是湖南人，他的儿子卓宏谋，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现已八十多岁。卓宏谋老先生在八年前托人找我作诗，我被纠缠不清，曾做了一首长歌给他，这首歌起首说：“四十五年前事，当时景物依稀。先德英明果决，欣然迎我长堤。”所谓“先德英明果决，欣然迎我长堤”，即指辛亥年九月初三，卓孝复等出城到堤上，向湘鄂义军降服的事。又，

当时我曾以湘鄂义军总司令名义，用一丈二尺白布，写有微岳州文，略称：“尔驻岳文武官员，同是汉人，自应同申敌忾，只要易帜易心，即是同袍同泽，共襄此时之义举，以待他日之策助。”由李树芝率领执事官送进城内，敦促清吏投降。

二、岳州光复时，无四十九标部队，所谓新军，就是李树芝所部。李在岳州有旧部，任文误为四十九标的部队。

三、岳州光复时，无五色国旗，武汉首义后，用的都是红地九黑芒十八黄星的革命军旗（后来在民国初年即用作陆军旗）。

四、岳州光复之日，我进城后，曾和卓道台、鲁镇台等官员相见，并谈了话。镇台，我前在《辛亥湖南光复的片断回忆》（载湖南《文史资料》第一辑）一文中记为姓吴，而任文说姓鲁，似乎我记错了，他们都是在我离岳后那夜逃走的，并不是逃走后岳州才光复，任文所记有误。

五、同盟会员任震，是谭延闿接充都督后委派的“镇岳司令官”，不是军政府岳州分府司令官。

六、任文提到的李铸，字纯荪，一九一二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李曾任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员，现年八十二岁，任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 辛亥革命后的湘西

戴季韬

辛亥革命后，曾设湘西军政分府于凤凰。公推原镇竿镇镇台周瑞龙为军政长兼管屯政，一九一三年，周瑞龙以老病辞职，后改设镇、道，分掌湘西军事、民政。当时省方原拟委派王隆中为镇台，后以熊希龄（秉三）的关系，改委田应诏（凤升）充任。田为凤凰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与熊系亲娅，其父田兴恕，清末作过提督、巡抚等职，在湘西的潜势力极大。他本人对湘西情形，亦甚为熟悉。田原任某部营长，因攻打南京雨花台有功，擢升旅长，旋以军队缩编，解职回湘，复因熊希龄的推荐而出任湘西镇台（道台为陈强）。

湘西旧有的绿营，辛亥革命后，尚未撤除。为了整理清朝遗留下来这些腐朽军队，高级官长多改由曾在新军四十九标，五十标作过军官的人充任，如花垣镇台为周瑞龙之子周钻、茶洞协台为宋祚永（海涛）、乾城协台为高回俊等。为了彻底改造绿营，镇、道各办有军官队和军士队，由各部保送优秀青年军官和士兵入队训练，并招考部分青年学生为学员，施以新式军事教育，作为建立新军的骨干。当时我在田应诏办的军官速成班当学员，毕业后即在田所属部队任职。

当湖南通电宣布独立时，湘西一隅的主政者，仍持模棱两可态度。田应诏曾由辰南特电北京，表示拥护中央，袁世凯委他

为湘西镇守使，在凤凰成立湘西镇守使署，以蒋隆基（湘乡人）为上校参谋长，陈渠珍为中校副参谋长，戴鸿勋为少校参谋。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袁世凯称帝之后，复策封田为一等轻车都尉，以示笼络。

一九一六年二月，蔡锷指挥的护国黔军前敌总司令王文华（电轮）所辖袁祖铭部到达湘西边境，一度占领晃县，袁世凯令北洋军第六师马继增部驰往堵击，该师卢金山旅在芷江、麻阳、桃江一带，与护国军发生激战，王文华和卢金山都以与田应诏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关系，各派代表来凤凰，希望田能出兵援助。当时田举足轻重，对上湘西战局的胜负，可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对此重大问题，田的内部意见颇不一致。蒋隆基主张参加护国军，倒袁独立，宁为玉碎，不作瓦全；陈渠珍则以绿营未经整训，战斗力不强，且官兵家小俱住凤凰、乾城、永绥等县，一旦战败，北军追击，则玉石俱焚，地方糜烂，不如暂守中立，坐观成败，待大局稍定，再表明态度。陈的意见以保全地方为先，比较持重，颇为当时多数人所赞同。田因采用了陈渠珍的策略，旋护国黔军败退黔境，北洋军后占领芷江、麻阳、黔阳、晃县等地。

北洋军军纪败坏，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马继增驻扎于沅陵时，其司令部设于沅陵中学内，该校系当时全国改革新学制的十个重点学校之一，设备甚好，经其驻扎之后，所有仪器校具，全被破坏，损失极大，使毕业生延期一年毕业。又其征派军粮时，要面粉不要大米，否则打人抓人，群众恨之入骨，敢怒而不敢言。后以北洋军作恶多端，怨声载道，群众忍无可忍，遂奋起组织自卫军，配合护国黔军，与北洋军激战于麻阳、芷江、晃县一带。当时，军民同仇敌忾，妇女亦多自动参加战斗，群众往往在地势险要处，设伏阻击，以几把砍柴用的弯刀或几根梭镖，截击北洋军队伍，有时甚至缴获整排整连的枪枝。护国黔军由于得到人民

的支持，声威大振，而北洋军则时时受到袭击，寸步难行，马继增的第六师败退辰溪、沅陵一带，袁世凯迭电斥责马师作战不力，马畏罪自杀于辰溪，北洋军派唐天喜部进攻护国黔军，又激战于芷江、麻阳、晃县等地。

护国黔军进入湘西后，袁世凯派熊希龄为湘西宣抚使，因熊与云南蔡锷有师生关系，想借此收拾人心，维系残局。熊设湘西宣抚使署于常德青阳街李雨田家，并派张学济（芷江人）、杨玉山（晃县人）等赴上湘西一带活动。当时南方各省纷纷响应独立，北洋军在湖南、四川均告失利，熊以大势所趋，遂暗示田应诏、张学济在湘西宣布独立。张学济由芷江匆匆忙忙赶到凤凰，手扶一把雨伞，身穿兰布长衫，好像一个游学先生，他与田应诏在镇守使署开了一昼夜的会，结果商定，田应诏派人随同张学济去乾城，并借用屯务军一个连（连长杨再格），张遂在乾城宣布独立。田随后以湘西镇守使名义宣布独立。田之迟迟不宣布独立，一般人多归咎于陈渠珍，陈被迫出走四川，不久仍回湘西。

张学济在乾城宣布独立之后，召集地方一些实力派，如姚晋侯、肖朝廉等组织护国军湘西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率杨再格部进驻沅陵。道尹吴耀金出走，张自兼道尹，文武两管，撤换县长，更动人员，设卡收税，增加田赋，广收队伍，并向田应诏所办之军官学校借用学生五十名为干部。此时湘西群雄并起，出现各种各样护国军的旗帜，田应诏仍以湘西镇守使名义，统治湘西有屯田的乾城（今吉首）、永绥（今花垣）、凤凰、保靖、泸溪、麻阳、古丈等七县。

以上所述，主要是辛亥湘西光复后五年中的军政情况，侧重在军事方面的变迁。

一九六一年九月

（原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 美国佛罗里达州

## 佛罗里达州

自一九一四年起至一九一九年止，约四十年，佛罗里达州  
在美国联邦政府管辖下，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管理。佛罗里达州  
政府管辖下，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管理。佛罗里达州政府管辖下，  
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管理。

### (一)

佛罗里达州位于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小村落，位于佛罗里达州，  
佛罗里达州政府管辖下，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管理。佛罗里达州  
政府管辖下，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管理。佛罗里达州政府管辖下，  
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管理。佛罗里达州政府管辖下，由佛罗里达州  
政府管理。佛罗里达州政府管辖下，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管理。

佛罗里达州位于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小村落，位于佛罗里达州，  
佛罗里达州政府管辖下，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管理。佛罗里达州  
政府管辖下，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管理。佛罗里达州政府管辖下，  
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管理。佛罗里达州政府管辖下，由佛罗里达州  
政府管理。佛罗里达州政府管辖下，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管理。

佛罗里达州位于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小村落，位于佛罗里达州，  
佛罗里达州政府管辖下，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管理。佛罗里达州  
政府管辖下，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管理。佛罗里达州政府管辖下，  
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管理。佛罗里达州政府管辖下，由佛罗里达州  
政府管理。佛罗里达州政府管辖下，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管理。

尤其是良辰“康乐富春”与“智珠琥珀”的差距。说：“时至今日，偶然太迟了！暴政，横死中之海寇，引起我们回到中国，回到北地中，以至十九世纪后半叶，为美国开发西部地区的劳力及土地，张其化生呼吸不已，但‘旧社会的残照’正犹在，而新社会，则始终未尝实现过任何希望。”（《论“新文学运动”》）

二、国内局势的展开。适得其时或可以自行瓦解，但相信与革命党，即与国家和公理的大敌无补的商人资本家，同美国，有某种形式，予以援助。中国革命党的国际地位，所以不能存亡的希望。克强先生，在派别中提倡革命，曾，徐世昌等沙皇世界和在美国有经济关系，所以为革命党之一变。徐世昌等不知如何，其用意是在使革命军能关于天津政府要地皆由自己，在斯时也必然各起战端，打破自移。同时，我们指出一点，有些使用日本进行涉俄，而日本也有可能利用这个非常形势，是珍在危急时，贵乎，克强先生对于外国革命的实质，辛亥革命的失败，各国官僚的顽固，致莫能进而提出出路和以得因国家，为一时之下已。

( 2 )

据我们相知的同志所述，病友先生为了接近群众，掌握时势，特去美国入东，抱病体养。美国曾考察政治和学术，归国后，就皈依健则次焉耳。因此，一年之后，病势并未减轻，相反，更为严重了。在党，一九一四年夏秋之间，老同盟会成员范兆（即方准）和范峰甫（学常副团长兼总长）及林杰（当时同盟会负责人，即部直隶人）前后曾给袁城来信，都劝我们和范先生少谈政治军事，只可多谈文化教育，以免阻碍病人的思想和身体。范先生虽然来信，却不来，只引起范的误会和范的自杀。范先生，

祖国和世界形势紧张，谁能置之度外？

### (三)

当时费城及其邻近，有华侨五六百人，留学生四五十人，纽约有华侨四五百人，留学生一百余人，华盛顿有华侨二三百人，留学生不及十人。美东国民党总支部设在纽约，是时由钟荣光领导。他主持《民气报》，不断与宪政(保皇)党的《维新报》对抗，两报的“笔战”明显地代表了华侨中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斗争。《维新报》制造谣言，抨击孙(中山)、黄(克强)，误言耻之。钟荣光代表克强先生以事实和真理驳斥之，因而《民气报》的销路愈多、愈远。

林森到了纽约之后，拟将国民党总支部改为中华革命党支部之一。钟荣光商得克强先生同意，没有推动改组的计划。

来自广东的南(海)、番(禺)、顺(德)、香(山)、鹤(山)等县，尤其是恩(平)、开(平)、新(宁)、新(会)所谓“四邑”的华侨，绝大部分是在美西，而来自各省的留学生，绝大部分则在美东。绝大部分的留学生，为追求新知识而专心致意留学，不谈祖国政治和政府的实情，更不问国民的革命变动如何。华侨工商两界的动态：不少商人与闻宪政党的宣传，多数工人和少数商人则参加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当时的宪政党恃富骗人，国民党守“穷”爱国；至于团结对敌，国民党人则不如宪政党人。同时，国民党内部于无形中发生了激进和观望两派：激进派积极拥孙反袁，而观望派则保持孙黄和袁氏合作的幻想。在美东各城乡，两派一致要求择地定时正式开会欢迎克强先生。为了保健问题，钟荣光不欲克强先生勉强应邀，而克强先生亦不欲出席讲话。因此，这个酝酿已久的华侨欢迎黄兴大会就没有开了。

有些华侨和留学生，通过钟荣光的介绍，又有些留学生从前

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等地认识了同盟会领导者，都自动访问克强先生。例如留学生陈嘉勋（湖南人）、卢维溥（广东人，同盟会员）、蔡增基（檀香山华侨子弟，同盟会员）、蔡慕真（广东人，曾在东京留学）、黄宝琛（广东人）、杨伯兰（其父西岩，久住香港，和克强先生交往多年）和夫人张氏，陈耀棠（耀棠的堂弟）和夫人谭氏，都不时走访。陈耀棠（广东人，专攻政治学）和我则几乎每月于一两周末拜访，并蒙留住共进晚餐。克强先生招待来宾，有所区别，茶饭分设，问答不同，但据我所见，招待或繁或简，一律无任何记录。

#### （四）

约在一九〇四年，中国留美学生初步组织了同学会，分而为二：其一称为美西中国学生会；其二称为美东中国学生会。在美中的留学生无所组织，有时分别参加美东的或者美西的同学会。几年之后，两者合称为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然而年会仍是分别召集之。美东中国学生会于一九一五年暑假期中召开年会，邀请克强先生出席演说。先生没有应允，但派了唐秘书到会代表祝贺。

当时在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公使和留学生监督，以及在美东的驻纽约正副领事，都是袁系的走卒，而在美东各城市的所谓会馆主席，大都是接近宪政党的人物，克强先生一概拒而不见。如有所需，非向某地唐人街采购不可时，则由徐秘书或者厨师办理。克强先生视察了一些唐人街，但没有停留于任何一家、一店或一馆。克强先生每到纽约、华盛顿或费城等地，都有当地报馆记者临门造访，先生着唐秘书代见，称病谢客。

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之间，美东留学生的校外活动空前活跃起来，各种社团组织相继成立，有如雨后春笋。蔡增基和

黎照寰发起组织了带政治性的“仁社”，有社员四十余人；杨铨和胡适组织了“文社”，钻研新文学，集合社员十余人，都承承克强先生赞许，并评论得失。后因学业转变和意见分歧，由涣散而解体，到一九一六年春，两社的形影都不见了。克强先生对此深为惋惜。一九一四年夏，另外一些同学发起和创立了“中国科学社”，并印行《科学》杂志。主要的倡议和组织者是任鸿隽（号叔永，四川人，同盟会员）、秉志（号农山，河南人），均在干尔尼路大学肄业，杨铨（号杏佛，浙江人，同盟会员），哈佛大学学生，以及赵元任、胡先骕、陈衡哲、李璠身、黎照寰等。任君和我走访克强先生，并为“科学社”发动的各种问题坦率请教，得到宝贵的指示和实际的援助。当筹备《科学》出版之时，任君曾请求撰写发刊词，克强先生以在养病时期不发表任何言论而婉却之。

克强先生不仅勉励别人，更加勉励自己。他不时有所感触，即写下一些诗词，分赠我们青年学生，作为同志式的精神联谊。可惜从美国回乡后，奔走各方，没能安居静处，生活又无保障，这些诗词墨迹，很难慎重保存，早已散失净尽了。

#### （五）

一九一五年上半年，一些华侨和留学生激于民族义愤，积极响应了孙中山、黄克强的号召，在国民党美东总支部的指导下，发起爱国抗日运动；在同年下半年，又掀起反袁救国运动。秉志、湛立（号湛溪，家住贵州，前清举人）和我如约停学一年，直接参与和鼓吹这些运动。因欧战展开了，英法无力顾及在远东的侵略进程，并且要求日本对德加强协战。日本乘此时机独霸远东，企图奴役我国人民，兼并我国领土，就要袁世凯签订所谓二十一条。袁氏急于帝制自为，继五月九日向日本投降的可耻行为，拥袁称

帝的窃国迹象，至此，袁氏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激起了海外爱国同胞的极大愤慨。抗日讨袁救国之声，四方传播，我们同志在纽约印行和主编了《战报》，向华侨宣扬正义，鼓励斗争。《民气报》增发副刊，呼吁全国同胞“努力再图革命”。我自己又写了一本题为《今日之问题》的单行小册子敦促留学生和青侨“向前冲”，为中华共和作干城。我们三个人早些时候往强先生请示机宜，幸承批评指教。并说明谁要回国服务，可于某某方面切实接洽。

一九一六年春，国际形势更加恶化，而袁氏帝制自为黎民，使爱国前进者振臂怒吼。克强先生更是愤激难过，体养无病情加剧。同时，长江、东洋和南洋一带的老同志对于克强的思念，形之于所陈讯息的字里行间。克强先生伤时感事，不遵医嘱，在四月下旬，乘纽约大中铁路公司特别快车，命程回国，随行者有夫人徐宗汉、长女振华、四子一美，秘书池、徐申伯。我们一些华侨和留学生，在费城西站候驾迎送，依惜别，言怀不尽。

一九六五年八月，于上海

## 蔡 鐸 軼 事

杨 恩 义

蔡鐸，字松坡。原名良寅，东游日本后始改名鐸。湖南省邵阳县东乡人。其父业裁缝，以生计窘迫，游艺于武冈、洞口之间，因家焉。松坡生而慧敏，以家贫不能供读，邑之名士樊锥（号春渠）见而爱之，收为免费弟子，从此学业大进，十二岁即入津。一八九七年，樊锥同梁启超主讲湖南时务学堂，提倡新学，三湘爱国之士，争相就学，松坡亦负笈相从。唯樊与松坡特富民族思想，主张种族革命，其宗旨不同于保皇党。戊戌政变，康梁出走，樊锥亦被株连，率松坡逃亡日本。师徒皆寒士，其用度曾仰给于梁启超。自松坡补官费入振武学校（后升入士官学校第三期）后，即与梁党少往返，所与游者皆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为其最契者。

一九〇三年秋，黄兴在长沙组织华兴会，谋反清起义，松坡时在湖南武备学堂任教习，亦预其谋。适赣抚夏时召其赴南昌，任随营学堂及材官学堂总队长，图扩展华兴会势力于赣，以为黄助，遂往焉。翌年秋，华兴会起义事败，黄兴出走，省内外机关多被破获，江西随营学堂及材官学堂亦牵涉遭解散。松坡愤而回宝庆，与谭人凤、谭心休、邹代藩、邹永成、谢介儒等，于郡城河上立益美祥号，设机关，谋劫武冈转运局之枪械起义，以响应黄兴之再举。旋桂抚李经羲来电召其赴广西练新军，松坡为争取

兵权、扩大革命势力计，认为机不可失，乃留谢介儒、谭心休等于那城继续活动，自率学生雷颢、何鹏祥、岳森、杨穆等赴桂林。抵桂后，先后开办随营学堂、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及学兵营等，训练新军骨干，数以千计。一九〇五年秋冬间，谭人凤、黄兴先后至桂林，与之商进行。黄以在桂林成立同盟会分会相告，征其同意。松坡允之，并择学生中之意志坚定者介之加入。当时松坡认为中山先生理想过高，不切实际，易于败事；独于黄兴之诚笃果毅，则倾心悦服，订为生死交，终身无间言。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为袁世凯所暗杀，国民党欲为报仇，计划兴师讨袁。黄兴派谭心休至滇，约蔡松坡共起兵。松坡答曰：“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松坡冷笑曰：“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追问此是何说？松坡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此约，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闻其言，拂袖返沪，而报黄兴，并以此遍告同志。是时我亦在沪，曾亲闻其语。当日谓其不可靠，不料尔后竟有昆明护国之师也。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 蔡松坡在日本

陈新宪

蔡松坡曾一生五次赴日本。

第一次是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应梁启超之招，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日文。随后又改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加入唐才常等所组织的自立会。次年，随唐才常等十九人回国<sup>①</sup>，谋于武汉起事，未果。

第二次是唐才常等在汉口举事失败后，他改名赴日，又应梁启超之招，入《新民丛报》馆任编辑，笔名奋翮生，又名古樵生，以写作、翻译维持生活。《军国民篇》就是这时期写的。一九〇一年入东京成城学校，次年与黄兴、兰天蔚等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易名军国民教育会），名为拒俄，实则进行反清革命。随后考入日本士官学校，以士官候补生入高桥骑兵联队实习，实习期满后，入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学习。一九〇四年毕业回国，任江西材官学校监督。

第三次赴日是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二月即回国，返湖南邵阳省亲。

---

①据唐才常撰《唐才常年谱》（未刊稿）一八九九年条下称：“明年，公在武汉起义，此十一人中，除范源澄愿从事教育事业，蔡良寅（松坡）年龄较轻，决入士官学校学习陆军外，余均陆续回国，参与其事。”与作者所说异。

——编者注

第四次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蔡松坡为反对袁世凯称帝，易服更名，离开北京潜赴日本，这次由门司易船密赴横滨，嘱石陶钧携其行李赴别府，伪作就医模样。并间日写一书信给袁世凯的亲信，用以迷惑袁的注意力。实则早已取道香港赴云南，袁贼得知后谋在途中阻击，亦未遂。

第五次是一九一六年率护国军讨袁胜利，因积劳成疾，于九月间偕潘夫人及石陶钧等赴日就医。十一月初，在福冈医院得知黄兴在上海逝世，于病榻亲撰挽联云：“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此乃蔡松坡绝笔，可谓英雄哭英雄。十一月八日，蔡亦相继病逝于福冈医院。翌年四月，国葬于长沙岳麓山，荣哀极一时之盛。孙中山先生亲撰挽联云：“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回忆三十年代，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常至高田马场附近月印精舍与湘籍友人相叙。月印精舍的主人，是一对因反封建而自由结合的老夫妇。他俩常向我谈起过去的遭遇：男的宁愿抛弃贵族家庭巨额财产继承权，冲破封建藩篱，与一个青年下女结婚。婚后生活困难，因结识湖南留日学生黄兴、蔡松坡等人，在他们的支援下另营新居，成立一个小家庭于高桥马场至早稻田之间，据说是樊雄为之命名“月印精舍”的。此后，主人便将多余的房间专租给湖南留日学生住宿，以所得收入维持生活。他俩喜欢对我们湖南留日学生讲黄、蔡两公留东轶事，还珍藏有两公的照片和书札，以作纪念。

## 记 宋 教 仁

陈 巖 涛

宋教仁，字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县香冲人。他父亲早死，由母亲抚养成人。家里很穷，以自耕农维持生活。

教仁少年时代在桃源县漳江书院读书，山长是长沙人黄舛寿（字仲良，兼县学教谕）。黄山长精于宋学，待人律己都很严格，而且坚持民族大义，富于反清革命思想。他口不多言，而常表现于文字间，如在窗前贴一副对联云：“莫使其心堕尘雾，要将热血洗乾坤。”清朝末年，国事日非，割地赔款，层见不穷。黄山长又在县学大堂上悬挂一首对联：“堂堂华夏愤羶腥，要大家励精致气，以满国耻；纳纳乾坤运枢纽，看此日从新化故，拯育群生。”教仁在这种春风化雨中，接受熏陶，革命思想慢慢滋长起来了。他天资颖悟，读书快，接受能力强。黄山长一次从长沙运一船书往桃源，途中触礁船破，书都搞湿了。好容易抢救到桃源，请几位学生替他晒检，教仁也是一个。他边晒边看，又不耽误，工作一完，就把书中疑义提出来和山长研谈。山长从这里看出他的资性和抱负与众不同，很器重他。因为清益质疑的次数多，师生之间的感情日益亲切，他便成为黄山长升堂入室的得意门生了。

教仁在漳江书院读了几年之后，于一九〇三年升入武昌文普通学堂。文普通学堂在清末是两湖读书人较高一级的升学场所，教仁到这里以后，见识和思想进一步提高。翌年秋，他回桃源省

亲，一到县里，就去拜望黄山长。寒暄过后，差役送一封公文进来，黄山长一看，是湖北来电到湖南抚台，缉拿乱党桃源宋“敏”仁，挨次行文，经常德府到桃源县（当时电报还只能到常德，桃源的电线还没修通）。黄山长晓得是宋教仁闯了祸，把两吊钱给他，要他赶急走，千万不可下乡回家；另一方面，又在公文上批着“查无此人”，来进行搪塞，以缓和这一紧急事件（后来他被罚俸三月）。教仁从县学后门走出来，过河走沅水南岸，经常德、益阳、宁乡到长沙岳麓山，住在他同学李醒狮家里。甲辰年秋，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教仁取道武汉、上海，到了日本，在东京学法政，并与黄克强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革命。同盟会成立时，他加入了同盟会，交出《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由黄克强代表同盟会接收，改名《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我曾在南京听到老同盟会员杨熙绩（字少炯，常德人。早年留学日本，与教仁同时。后为国民党候补监委、国民政府文书局长。抗战复员后在桂林病死）说：“孙先生会宣传，会动员，不管谁听了他一席话、一次演说，谁就甘愿跟着他走，赴死不辞；黄克强是个实行家，不声不响，就干起来了；宋钝初深沉稳健，又通达计谋，是我们党的智慧。”他这几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三十多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

一九一三年春，教仁回湖南，先到长沙，有近万人在轮船码头欢迎他，他却极力避免这种场面，先从现在的裕湘纱厂前面，雇了一只小驳船，下了轮船，走潮宗门起坡，迳到黄山长家里去了。黄山长第一句问他：“钝初，革命何如？”教仁说：“不彻底！”这真是局中人一针见血之谈。

袁世凯作大总统时代，教仁在内阁作农林总长时，曾创立农政讲习所，准备训练一班农业人才，振兴农林事业。不料袁世凯

大权独揽，诸事与革命党人为敌，教仁很多计划不能贯彻执行，而且独夫的行动和革命的目的愈去愈远。教仁以为这是一个政体问题：国家大政是总统负责，还是政党负责？他是主张后一说的。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不久，孙中山委派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他是一个坐言起行的人，立即辞去农林总长南下到上海，和各政党广泛交换意见，提出自己对国是的主张和看法。认为国家政治应由政党负责，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织内阁，主持大政，在野党从旁监督；如内阁失当，在野党可以揭露它的错误和缺点，使它在下届选举时，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由在野党代替上届内阁掌握政权。他以为这种政党对立与政权交替的政治体制，可以促使国家进步，消灭独夫大权独揽。这种主张，在贪权重利、阴险狠毒的袁世凯看来，简直是解除他的全付武装，直接和他为敌。袁曾送宋支票十万元，宋在职时原封不动退还了，袁对人说过：“革命党人唯孙中山，宋钝初不易与。”恨宋心切，溢于言表。

教仁离京南下，对袁的阴狠毒辣未存戒心，只看到在上海的政治活动极顺利，有四个政党（国民共进会、统一共和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愿与国民党联合，时称五党联合，估计在参议院可以取得多数党的地位，并谣传教仁将任内阁总理。为了使这个基础更巩固，他在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晚上动身往南京转车北上，他和黄克强、于右任等一排同走，刚要上车时，克强忽然一喊：“怎么有手枪的声音？”教仁很镇静地说：“打着我的腰了。”他还继续走了十几步，腿就软了，黄克强扶着他，雇了一辆车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又不在家，等了好久才回来，打麻醉针、动手术。子弹从右腰射入，停留在距左腰表皮一寸多的肌肉里。医生尽最大的努力，把子弹取出来了。到二十二日早晨，他的创痛加

刷了，辗转反侧不可忍，他自知没好的希望了，对黄克甄、陈英士说：“我死后，我们党人不要暴动。请不要告诉我母亲。我的藏书悉数捐给公家图书馆。”说完，他就死了！年三十二岁。

这个案子很快就破获了，刺杀宋教仁的是武士英。这是上海刺杀破案最迅速的一次。原来上海火车北站附近一小旅馆住一客人，常好久不付钱，老板娘一催，他总说：“我的钱快到了，到时一次付清。”宋案发生后，这人把老板娘请到房里结了账。当时，巡警规定要各旅馆中报行踪可疑的人。老板娘就告密：“我馆一客，好久不付房食钱，昨天忽然有很多的钱，结账之外，还有不少。这人可疑。”巡警捉住他，找出电报信件，一审，果然他就是刺杀宋教仁的武士英。人证、物证俱全，真相大白。原来在北京指挥这一刺杀案的是袁世凯的一位洪姨太太的老弟，内阁总理赵秉钧的机要秘书洪述祖，接受洪述祖的命令和活动经费，在上海指挥武士英的是应夔丞。谁命令洪述祖呢？袁世凯！

武士英在押一晚，就死了，一说服毒自杀，一说应夔丞灭口。验尸的人先说有毒，后又说没毒。没好久，应夔丞在北京车站也被暗杀了，一说国民党人为宋报仇，一说袁世凯灭口。一般人都相信后说。

事情又冷却几年了，好象是一九一七或一九一八年吧，宋教仁的儿子振昌在上海逛马路，迎面来了一个人，振昌跑上前去，一把把他揪住。两人正扭作一团时，巡捕来了，同时捉将官里去。一讯，振昌指着那人的脸：“他就是刺杀我父亲宋教仁的洪述祖，缉拿多年没有归案，请收押起来依法办理！”第二天消息传开了，替宋教仁报仇的国民党人和他的一些亲友们，一致请求引渡，巡捕房将全案移归中国法院办理。法院判决洪述祖无期徒刑；洪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大理院判处绞刑。

这里又有一个插曲：绞死洪述祖的刑具是从德国进口的新器

械，让洪述祖作第一次试验，用刑的法卒还无经验，不料一绞，却把洪述祖的头给绞断了（本来，绞就不应断头）。

回忆辛亥革命以后，宋教仁回乡，路经常德，教育界曾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我当时才进小学，欢迎会是在中学堂开的，我也列队前往。因为自己人小，坐在前面，亲见教仁丰采，听他讲过一番话。他蓄西式头，留八字须，眼球微突出，广颧，两颊微凹。时间过去快五十年了，他那种雍容、深稳、有大政治家风度的形象，却依稀呈现在眼前。

教仁生活俭朴，对人热情和蔼，对事冷静认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他在上海，穿兰竹布衫子，穷秀才的打扮。不久，显要起来了，门前“车如流水马如龙”，他不改本色，依然穿兰竹布衫子。只有带仪节性质的场合，他才换一套西服（当时的礼服）。我在省博物馆见过他写给人家的信，一种帮助人、关切人的气氛，扑人眉宇；又曾见过他替人写的对联，有书卷气。他在常德欢迎会后，步行至鸡鹅巷一家小饭馆，访问一个在饭馆里作厨工的故人，班荆道故，毫无官气，一时传为美谈。

最后谈点关于宋振吕的事。我认识振吕，但交往不多。他先在上海复旦中学读书，后又转学武昌高师附中。一九二四年游学日本，入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一九二七年归国，于右任时任审计院院长，委他为协审。一九三五年他随同司法院长覃振赴欧美考察司法与计政。一九三六年夏正准备发表他作陕西审计处长，而不料忽然患急性心脏病死了，年仅三十六岁。他亲提洪述祖，为父报仇，颇为时人称许。于右任给他的谥词：“赤手探仇，是真孝子。毋日不寿，足光青史！”这几句话很可算得是对他的画龙点睛的概括。

一九六一年九月

（原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 关于祖父宋教仁的几件事

宋奇璋

我的祖父宋教仁，字钝初，号渔父。他有兄弟四人：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少时家中穷困，几岁死去了父亲，没钱读书，就刻苦自学，以后进了漳江书院读书。家里由曾祖母当家，靠种点祖业田过生活，收获很少，难以维持。据一位堂伯伯说：“有一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曾祖母只好去卖青苗，卖得的钱拿来买米，以维持一家的生活。”我祖父离开书院后，往武昌进了文普通学堂，随后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去了，很少回家。

有一次，祖父回来，被清政府知道了，派人来抓他。乡里人得到消息，马上告诉我祖父。他连夜抄小路出走，走到水流急湍的沅江边，没路走了，江边又没有船，后面的灯火看看就靠近了。正在这危急时刻，突然出现一只小渔船，渔船上仅一个老人，他打量了祖父一下，问明来由，就说：“快上船吧！”当时祖父在危急时刻，走投无路，来不及考虑船上的人是好是坏，匆忙地上了船，老渔翁就把祖父送走了。等敌人赶到江边时，小船已去远了。后来我祖父为了纪念这位老渔翁，就取名渔父，并给我爸爸取名稚渔，我爸爸又叫我幼渔，意思是世代代不要忘记这位老渔翁是救命恩人。

我的祖母方氏，是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她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我的父亲宋振昌。祖父被杀害，曾祖母还在世，她和祖母抱

哭痛哭，愤不欲生。当时家中具有曾祖母和祖母，以及伯祖母李氏（伯祖父因我祖父外出革命，被抓入狱而死）。祖父死后，父亲立志报仇，就由桃源跑到上海去。我的祖母见他年幼无人照料，也跟随去了，她于第二年病死在上海，安葬在宋园内（宋园在上海闸北，祖父的墓地，一般称宋园或宋公园）。

覃振和我祖父是小同乡，又同在日本留学，先后加入同盟会，关系很密切。抗日战争期间，我跟妈妈逃难到重庆，住在覃振家里。他常对我们谈起祖父的事情，有些事现在还是记忆犹新的。覃振说：“你祖父在北京做农林总长，仍然到处演说，鼓吹中国要立责任内阁，实行政党政治。袁世凯惧怕你祖父，又不敢明害。一天，他派一亲信送给你祖父一本存折，存折上的数目很大，你祖父再三推辞，那人不肯拿去，放了就走。第二天，你祖父派人在存折上拿了几块钱，然后把存折仍送还给袁世凯。他看见钱不能收买你祖父，又想出一个办法，他曾听说你祖母相貌不好，一天，就对你祖父说：‘我有一个亲属长得又好，又识字，能帮助你，我把她介绍给你好吗？’你祖父很严肃地回答说：‘我的妻子相貌虽不好，但我俩感情好，我不能这样做，谢谢你的好意。’说罢就走了，袁贼看到软的不行，就决心来硬的。后来这些事给我们知道了，就要你祖父注意安全，要带人走。你祖父说：‘我又不想当皇帝，怕什么！’以后就在上海车站被暗杀了，袁贼终于下了毒手。”

覃振还说：“当时你祖父死后，有一笔恤金掌握在你父亲手中，他拿着这些钱，同一些人出入花街柳巷，随便乱花。一天，他们在上海街头闲逛，看见一辆汽车从旁边驶过，认出车里面坐的是刺死你祖父的洪述祖。当时你父亲和那伙同伴把车子拦住，把洪述祖当场抓住，扭送法院，以后判了绞刑，为你祖父报了仇。”

关于我父亲为祖父报仇的情况，我还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当

祖父被暗杀事件发生后，洪述祖就逃到青岛去了，那时青岛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他可以逍遥法外。一九一八年，洪述祖又跑回上海租界上，恰好我父亲也在上海，寄住在法租界霞飞路同乡家里。有一天，他同我祖父的朋友刘白在马路上散步，与洪述祖狭路相逢。刘白过去跟我祖父在北京工作过，认得洪述祖，示意我父亲，他马上跑上前去扭住洪述祖，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洪是暗杀我祖父的要犯。结果，法院判处了洪的死刑。

父亲朱振昌，字乐六，号稚渔。一九〇〇年农历五月初五生于姚沅县香冲老屋，即现在的八字路公社回龙大队香冲生产队。父亲出生后三、四岁，祖父就出去搞革命去了，没有人教育他，就送到他舅舅家去上学。有时请舅祖父到家里来教，同屋场的伯伯叔叔也一起学习。

父亲在青年时代，得到覃振的帮助，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就在南京政府审计部工作。一九三四年跟随覃振到欧美考察司法（当时覃任司法院长），覃振没几个月就回国了，我爸爸留在国外学习。一九三五年回国，仍在审计部工作。翌年农历六月初三，病死于南京，时年三十六岁。当时湖南宋家有很多人来悼丧，借口我妈妈没生男孩，要把本族一个男孩过继给我妈妈做儿子。我妈妈坚决不肯，就去找覃振。覃振出面说：“女孩也可以接代。”这样，一场风波就压下去了。父亲死后，葬在南京汤山永安公墓。

# 我所知道的谭人凤

邹协勋

谭人凤是同盟会的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人物。我幼年时在新化永固乡罗洪三村两等小学读书，这所学校是族叔祖邹价人牵头创办的。那时，价人已经风瘫了，常在学校里对我们谈今说古，一谈总要扯到谭人凤。邹永成是我的族叔，接触时多，也是言必称人凤。他们在辛亥革命时都是跟谭人凤在一起搞的。我过去在黄埔军校工作时，认识谭人凤的孙子谭路生，最近又在长沙访问了谭人凤的女儿德宜、孙子谭本，了解到一些比较可靠的材料。现就见闻所及，写我所知道的谭人凤。

## 家庭出身

谭人凤，字有府，号石屏，晚年又自号雪屏。湖南新化人。一八六〇年（清咸丰十年庚申）农历八月初六出生于新化八都石鼓塘湾老屋（今属隆回县鸭田公社南塘大队）。

谭人凤有兄弟六人，他最幼。家庭世代务农，父亲谭忠宅及其六子一家，只有少许田土，力耕自食，勉可糊口。他因有兄弟的帮助，得以入学读书，并考取了秀才。他先娶新化水车毛田罗氏，生有子女四人，即长子德甲（一鸿），次子德金（二武），三子三星，早夭折，四女四贵。后娶扬州卞氏，又生子女四人，即五子德揖（五武），六女德顺（六娃），七女德宜（七娥），八子八

骏，幼夭折。

### 秀才办学

三十六岁以前的谭人凤，以老秀才的身份，在自己的家乡创办一所福田小学，请了谢介楷等人担任教员，潜心文史，未究时事。一八九五年偶遇同乡邹价人经过，与谈古今中外事，皆闻所未闻，思想大有启发，因之一变而投身反清革命。我早年听乡里长辈讲过，谭人凤在家乡教书时，即以好骂出名，当地几个土豪劣绅，几乎被他骂遍了。他在朋友同志间也以好骂称，然而一骂之后，毫无成见，仍和好如初。他在地方上很有威信，乡里人每有争议，必请他去排难解纷。在家庭里也很有威信，每早必持早烟袋杆子敲侄辈的房门，喊他们起来出早工，常说：“三早当一工。”侄辈们跟他年纪差不多，都很敬畏他，乐于听命。

四十岁以后，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四年两年间，谭人凤在新化县城文场内办小学堂，仍操粉笔生涯，但接触面比较广些。

### 联络会党

据邹永成过去对我说，谭人凤在办福田小学的同时，即注意联络会党，曾召集一些江湖上的朋友在那里开山堂，取名卧龙山，他自己作山主。后来又在宝庆府城分设一个山堂，先后吸收李燮和、唐镜三、李渭天等多人加入。照谭人凤自己的话说，他当初搞帮会活动，是“抱部落主义以自雄”，尚未觉悟到献身关系民族前途的反清革命运动。

一九〇四年暑假期间，有个朋友由日本归来，在县城里找到谭人凤，秘密告诉他：黄克强、宋教仁等将联络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在省城发难。从这年冬季起，他加紧在会党中进行活动，发展

组织。他与周叔川由隆回赴桃源，转往辰沅，再下常德，到处奔走联络，席不暇暖。第二年夏天，应他的老朋友、广西警察学堂总办曾叔武和随营学堂总办蔡松坡的电邀，带领三个学生去广西。到广西后，在警察学堂挂个文案名义，实际上是作食客。后听说李燮和、唐镜三在宝庆起义，他喜不自胜，特地带学生岳森回来相助。半路上遇见唐镜三，才知道事情已经失败了。这时传闻宝庆官方将派兵勇到乡里来围捕，经过亲友殷勤相劝，才于一九〇六年春离开县境，经宝庆到长沙，在草潮门新化中学堂任监督。

陈浴新一九六一年写的《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中，谈到谭人凤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暑假期间，常到长沙黎家坡退龄庵来，呼他为“小友”。又谈到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重阳节，谭人凤召集湖南各地会党代表在岳麓山举行游山会，游山会后几天——九月十六，借庆祝黄兴三十岁生日，与黄兴、刘揆一等组织华兴会，进一步联络会党。此说可疑。因为谭人凤在《石叟脾词叙录》中说：“癸卯、甲辰（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四年）二年间、余于邑城（新化）文场内办小学堂”，并没有提到他曾到过长沙，也未提到他举行游山会、组织华兴会的事。且一九〇四年农历九月十六，是华兴会长沙起义事泄失败日期，而不是发起成立的日期，它是先年九月十六黄兴进三十岁那天成立的。陈浴新所谓谭人凤一九〇四年在岳麓山举行游山会，事关湖南近代史实，有待考证。

## 反 清 革 命

一九〇六年八月，谭人凤离开长沙去南京，由南京而上海。老秀才初出洞庭湖，沿途揽胜，触目惊心。十二月到东京时，适逢同盟会举行《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他也去参加了。会后，

经先到东京的唐镜三恳切介绍，与黄兴相晤，畅谈两小时，决定加入同盟会。不久，萍、浏、醴大起义爆发，黄兴派他与周震麟、洪存岩、何弼虞、宁调元、胡瑛等同国谋响应。到长沙后，得知起义已失败，无计可施，又重返东京，入政法学校，插入王期班，时在一九〇七年春。

同年十二月，镇南关之役爆发，孙中山偕黄兴、胡汉民等亲临阵地参战。谭人凤得到民军占领镇南关的消息，估计大有可为，立即把儿子一鸿的官费折抵借百金，偕同志前往参战，以遂平生之志。他们到达时，战事已结束，民军早已撤走，满脸希望，顿化烟云。黄兴此时正苦于子弹缺乏，因谭与广东钦廉道道台郭入漳有旧，黄过去在广西也运动过郭，便托他往郭处求接济。谭人凤赶到郭入漳处，郭认为革命军事败，态度忽变，最后并悬赏捉拿他。他脱离虎口，跑到广州，转回香港。在港看到报载王和顺、关仁甫起兵于河口，清军望风而溃，便情不自禁地割须改装再往，至则又是烟消云散了，空跑一趟，败兴而归。

一九一〇年一月，同盟会南方支部运动广东新军起义已届成熟，黄兴从日本到香港，与赵声、倪映典筹画一切。黄兴走后，谭人凤接踵前往。结果新军起义以失败告终，他又一次怅然回到东京。

### 奔 走 两 湖

一九一一年二月四日，谭人凤应黄兴、赵声之邀，由东京抵香港，当天晚上和黄、赵商谈广州起义计划。他认为两湖地当冲要，非先示机宜不可。征得黄、赵同意后，第二天即带两千元往上海，再到汉口，与居正、杨玉如等聚商于某旅社。谭说：“余奉黄克强同志命，察看长江流域革命近况，并报告紧要消息。因黄同志与胡展堂（汉民）、赵伯先（伯先）兄均在香港，各省同志毕集，

决定今春在广州起事。南京、九江已有联络，两湖尤关重要，希望急起响应。旋交居正六百元，又与孙武二百元，告知广州起义计划，希望相机策应。二月间，谭偕刘承烈到长沙后，在路边井某日本旅馆召集同志开会，到会的有文斐、曾杰、肖翼鲲、龙铁元、吴超征、洪荣圻、何陶等十余人。谭在会上报告，黄兴鉴于往者以会党、新军或防营谋举事，往往坐失机宜。乃改由吾党同志自行发难，而以防营、新军为应援。决定于三月间在广东起事，湖南当急谋响应。当时议定，刘文锦在马队任排长，运动军界由文锦担任；绅学界由文斐、曾杰进行运动；会党方面，由焦达峰担任；经费接济，由龙英溪、龙铁元负责。焦达峰不在省垣，谭等了几天仍未见回，就回上海转香港去了。

三月二十九黄花岗起义前夕，黄兴由香港秘密进入广州，在小东营机关部进行部署。谭人凤也由香港赶来参加。当讨论进攻计划时，他认为十路进攻，应有一人居中指挥调度责任，不应同时都告奋勇。最好先炸毙李准，合攻督署，再由赵声从城外以新军进攻，内应外合，较易得手。这个建议，因时机迫切，未被采纳。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从广州脱险抵香港，在港稍事逗留，折返上海。五月初到汉口，与孙武、蒋翊武等多次会商，建议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通力合作，相辅相成。在谭人凤的策动下，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组成机关部，作为筹划武汉地区起义事宜的领导机关。一九一二年，黄兴在南京黄花岗周年纪念会演说中赞扬他说：“……至于内地之布置，长江一带，谭人凤先生任之。谭先生身体多病，此时亦冒险力疾至鄂。”

### 汉 上 先 着

一九一一年秋黄兴和谭人凤诗中有句云：“能争汉上为先着，

此复神州第一功。”谭与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早有联系，武昌首义他是出了力的。

武昌起义前夕，十月八日，谭人凤由沪到南京，约集同志，商讨响应湖北发难问题。事后，他同居正一起去武汉，船过九江时，即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十月十四日渡江入武昌，与黎元洪相晤。黎向他倾诉了一大堆困难，他赍以大义，促速下令进击清军。第二天早上，民军步炮各队大批过江进攻，清军不支，狼狽败退。商民欢声雷动，满街燃放鞭炮庆祝。经此一战后，士气愈旺，形势大变。

十月二十二日夜，长沙新军反正消息传到武汉，谭人凤立即向都督府请领快枪两千支，派任震运送回湘。两天后，他自己乘轮回湘，到长沙后，发现焦达峰的都督府一片混乱，立宪派组织了一个参议院总揽全权，焦达峰遇事受挟制。谭人凤看到了这个不正常情况，以外援事急，只好隐忍，而着重于敦促出兵援鄂。他在新军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当场写了一首军歌激励士气，歌词是这样的：“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不料王隆中刚率新军一部到湖北去，三天后，就发生了焦达峰、陈作新被害事件，立宪派篡夺了湖南的政权，谭延闿作了都督。这时，光复各省电促派代表往湖北开会，他与邹价人、廖笏堂、刘揆一被举为代表，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武汉。到武汉后，他与邹价人等赴王隆中军中演说，勉励大家奋勇杀敌。不久，黄兴离开武汉东下，准备进攻南京。黄兴走后，黎元洪打算退往葛店，武昌情况危急。革命党人推举谭人凤以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支撑危局，秩序稍为安定，不久，黎元洪也回来了。

十一月三十日，各省代表在武昌开会，会上，推举新到会的

谭人凤为临时议长。经过讨论，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随后，黎元洪遣人送到公文及旅费，委派谭人凤为议和代表，促赴上海、南京与会。他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南京，参加各省代表会。这时，会议已在南京进行半个月了，正准备选举临时大总统。谭人凤曾在各省代表会上倡议举黎元洪为总统，但开票结果，孙中山在十七票中以十六票当选，黄兴得一票，无有及黎者。他一面参与各省代表的集会，一面仍以北面招讨使名义，在上海组织机关，准备北伐。但是，所谓招讨使署，是个空架子，唯一的兵力就是他的儿子二式从湖南带去的两营人。

### 谭 宋 交 谊

谭人凤到东京不久，就结识了宋教仁。章太炎撰《前长江巡阅使谭君墓志铭》，说他“与孙、黄好尚异，独重桃源宋教仁，以为异才。”这是事实。

一九一〇年春，广东新军起义失败，宋教仁深为叹息，经常找谭人凤商量整顿办法，谭这时与新从国内来的邹价人、邹永成等同住在东京神田区。经过磋商后，他们向同盟会建议三策：一、在北方举事为上策；二、在长江流域举事为中策；三、在边疆举事为下策。后又决定以中策为上策，组织长江机关付诸实施。邹永成后来对我说过，他们在东京时，计划把新化县的锑矿专卖权卖给日本商人，以所得手续费充作长江机关的活动经费。他说这个办法是邹价人想出来的，当时推宋教仁向日本交涉，他和张斗枢回新化与矿商接洽。他们回国后，还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组织一家广惠矿务公司，以便办理此事。

辛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医院疗伤，日唯以“报吾良友之仇”为念。五月十八日，赵声忧愤致死，黄受刺激更

深，时刻想到要去暗杀李准等清朝悍吏，“以酬死事诸君，庶于心稍安”。谭人凤这时在香港，极力劝阻；事后又邮电力阻，黄均不为稍动。宋教仁也是参与策划黄花岗起义的，对此次事败悲愤满怀，无限伤感。他和谭人凤以及其他同志，鉴于这次失败的沉痛教训，即时把掘川、鄂、湘各省反对铁路国有风潮的有利时机，决定组织力量，重振旗鼓。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宋教仁、谭人凤、陈英士等二十九人，在上海湖州会馆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会，谭人凤起草成立宣言，指出：“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在这次成立会上，谭人凤被推为总务会议长，兼负交通部之责。他随即往湖北组织分会，对文学社、共进会成员多方开导，晓以大义，因而出现了尔后团结对敌的合作局面。

一九一三年春，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抨击时政，大招袁世凯之忌。谭人凤在武汉相晤时劝他注意戒备，免遭暗算。宋不以为意。三月下旬，袁世凯果然派人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两天后伤重殒命。谭人凤万分悲痛，亲撰挽联：“破坏建设一身兼，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谓之政治大家曾何愧；瘦狗毒蛇全国布，无人心，无天理，无国法，成此暗杀世界岂能堪？”宋教仁死后，谭人凤办理丧葬事宜，照料遗族生活，计划周详，煞费苦心，极其尊重牺牲的亡友。

## 辛 亥 以 后

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大总统。谭人凤在临时政府中未居任何职位，而以北面招讨使名义驻节上海，无兵无饷，有时发发通电，表明政治态度。二月十五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大总统，谭人凤通电反对。孙中山复

电给他，认为“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吾党不必身揽政权”。优待清帝条件第一条规定逊位之后，尊号仍存，他列举理由，通电反对，认为“貌袭文明，实伏乱源”。有人倡议取消南北起义各都督，他又通电反对，“非大局救平，断无解兵之理。……有敢动摇之者，义师共击之。”同年夏天，北京政府任谭为粤汉铁路督办，无所建树。十一月二十七日，袁世凯任谭为长江巡阅使。翌年三月十日，补上将衔。

## 二 次 革 命

宋案发生后，谭人凤离开北京到上海，其时刺杀凶手武士英已被捕获在押，赵秉钧、洪述祖与应夔丞的往返函电，也在应家搜获，可说铁证如山。他向孙中山、黄兴询问主张，孙说，若有两师兵，我当亲率问罪。黄说，此案证据已获，当可由法律解决。他反驳说，“孙先生之说空谈也，两师兵从何而来？黄先生之说迂谈也，法律安有此效力？”谭人凤当时主张遣使促湘、粤、滇三省独立，再檄各省同兴问罪之师。后来事实证明，他这个主张也是行不通的。在这以后，他往北京见袁世凯，往武昌见黎元洪，想进行调停，结果又是枉费心机。

一九一三年七月七日，谭人凤奉黄兴之命自上海返湘，与谭延闿面商，告以南京将宣布反袁独立，届时湖南应迅速响应。七月十五日，南京宣布独立，黄兴被举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章士钊任秘书长，通电各省，希望同张义帜。经过谭人凤一番策动，多数下层党人奔走呼号，谭延闿见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得不于十七日召开全体会议，用省议会名义发出通电，宣布湖南独立。但到各省讨袁军事相继失利时，他见风使舵，于八月十三日宣布取消独立。九月十五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

柏文蔚、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谭人凤、熊克武等。北京陆军部的通缉名单上，把谭人凤列为“湘省之乱”的“首魁”。在袁世凯的罗网下，国内已无容身之地，他被迫出走，亡命日本。抵日后，卜居于福冈县筑紫郡中之太宰府町，改姓名为林泉逸，以避袁深和日本新闻记者的耳目。直到袁世凯毙命后，才由日本回到上海，与孙中山、黄兴过从密切，共同商讨袁贼死后的斗争形势问题。翌年四月，黄兴国葬于长沙岳麓山，谭人凤专程返湘，参加国葬仪式。

一九二〇年四月六日（农历三月初六），谭人凤病逝于上海，终年六十岁。长子一鸿扶柩返里，葬于新化毛田（现属新化县文田公社）。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 禹之谟革命事迹补述

宁纯宦

禹之谟，号稽亭，世居湘乡县青树坪侧石桥（今双峰县）貽则堂。家庭务农，本人织匠出身。幼入私塾，饱读经史，文学甚有根柢，书法尤见特长。惟家寒，无力上造，未届弱冠，即弃学从商。曾在邵阳、武冈等县帮人经营纸业，虽日劳于持筹握算，夜仍不废读书写字。所临魏碑，深得古人笔意。造墨无多，已成珍品。既而获读新出书报，思想顿变，好谈救国保种大计，不复留意经商求利小事。性豪侠，喜打抱不平，常往来于山门、滩头一带，反对地主兼纸槽老板压迫客商，被人目为狂徒，在此不能立足。于是远游南北各省，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旋东渡日本，学习纺织。未几，卒业回国，首设湘利乾织布厂于长沙北门忠信园，组织工人，兼设惟一学校（广益中学前身）于新安巷湘乡试馆，团结学生；设通讯处于西园龙璋家，吸收军人及帮会志士；复与北正街圣公会牧师黄吉亭结识，借其房屋，作秘密集会地点。各方安排，到处活动。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黄兴密函禹在湘设立分会，并推销《民报》，革命声势日见浩大。及姚宏业、陈天华灵柩运抵湘垣，禹遂趁机一试，领导学界万余人，结成十余里长队，大张旗鼓，进葬岳麓山。一时禹之谟三字，如雷贯耳，湖南大小官员闻而设慄，噤若寒蝉。惟劣绅俞诒庆竟敢螳臂当车，出而阻挠。禹以命顽固成性，破坏革命，不加严惩，难绝后祸。一

日，侦得俞在樊西巷妓女春苔家吃花酒，即指挥学生，当场拿获，罚俞跪地，令春苔裸体骑其头上。又取春苔房中“十分春色无人管，一径苔痕带雨青”对联挂于两旁，拍其丑照，通街宣传，使人得知俞身为全省教育长官，实乃衣冠禽兽。俞恨之刻骨，屡向北京告密，清廷以湖南历任巡抚懦弱无能，致禹结党猖狂，将危社稷，特派庄荫良为湖南藩司，协助拿办。庄与巡抚鹿鸿书商妥，遂借湘乡盐案，下令捕禹于圣公会，时在一九〇六年八月十日。顷刻，全城震动，庄、鹿不敢提禹讯问，至夜静人稀，派兵押禹上船，发往靖州，交酷吏金蓉镜处置。九月十九日，被解抵靖州狱中。党人陈荆、宁调元逃往上海，作《湖南黑暗记》，为禹鸣冤。禹妹偕陈松藤由日回国，运动绅商，为禹脱罪。但以禹为清廷所忌，又为劣绅所仇，风寒易水，壮士安望生还。金蓉镜屡用酷刑，逼禹供出同党姓名，禹正色拒绝，始终未供一人。同盟会湖南分会名册素由禹掌管，他人不知，假使禹畏死，有所透露，则株连何可胜数。禹系狱数月，受审多次，筋骨断碎，肌肉被烂，一九〇七年一月五日，被绞杀于靖州东门外，甫上绞架，即绝呼吸。如此民族英雄，革命巨子，壮烈牺牲，可歌可泣！

禹之谟牺牲后，陈荆抚棺痛哭，取其血书以归。陈荆，号树人，湘乡县青树坪十竹山人，同盟会会员，为禹之忠实朋友，改姓易名，由沪至靖，入牢探禹。禹狱中致伯母书云：“树人不辞劳苦，徒步千里，患难相顾，有古人风。”辛亥反正后，湖南都督府派陈荆为代表，回青树坪起运禹柩，进葬岳麓山，并在青树坪、长沙两处，开会追悼。彭谦谷挽禹联云：“生死见交情，故人尚有陈荆在；英雄论成败，今日惟传上将功。”盖禹进葬麓山之日，适黄兴由汉回湘，原在禹柩前执紼者，多弃去迎黄。此联当日传遍长沙全城，迄今相隔六十载，能记而诵之者，尚不乏人。陈荆挽

禹联云：“曾为入半通讯客，来吊闾堂塞署人。”盖禹为制止湘乡奸商浮收盐价，曾率学生至县衙门请愿，湘乡知县秉省方上司意旨及俞诒庆之运动，乃构“闾堂塞署”定禹之罪。贪官劣绅合谋陷害，禹竟由此而死，何殊岳飞三字冤狱。陈荆此联，可称符合史实。

禹之谟一生革命事迹，详见姚渔湘所撰《禹之谟传》及颜昌峻所撰《禹之谟墓志铭》。余与禹居同乡里，所闻稍有出入。爰不揣冒昧，为之补述。至姚、颜称禹受清两江总督刘坤一保荐官职一事，余遍问同乡先辈，俱言不实。当年禹在长沙，工人、学生都呼禹老师，惟奸商不满禹禁运关货，有呼禹织匠者。禹死后，其家庭亦以出身工人，有损声誉，故请人作传志，辄加上一些假头衔，借以炫耀。特予订正。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史研究馆供稿）

## 记蒋翊武之死

万武

蒋翊武，湖南澧县人。辛亥武昌起义时，翊武为文学社长，先期鼓动，俟发难，被推为总司令。事定，袁世凯许为天下才<sup>①</sup>，欲糜以官爵，翊武拒之<sup>②</sup>。癸丑讨袁，功不成。翊武将往桂林图再举，道出广西全县，为巡防营统领秦步衢所获。

步衢为逊清举人，以在籍办团练起家。辛亥革命后改团为营，自为渠帅，兼桂林巡警道。时陆荣廷为广西都督，令步衢驻防全县。

壬子冬，余为全县牧。次年秋间，步衢命弁持书向予假加重刑具，云：黄沙河哨弁某解来要犯数人，于其囊中检出财物甚多，询知为蒋翊武，盖岑峰所悬购者也。余立往面步衢，伪为道贺，以规诚伪。步衢曰：“今晨，黄沙河哨弁见二人各乘肩舆，一仆紧随，由湘入桂，在岭头立谈甚久，一人由原道返，一人率仆匆匆向桂林大道去，颇以为异。要而问之，自称蒋氏。检查行李，旅资甚厚，故将其解部。吾初以为系唐蟒，及询则知其为蒋翊武。时文案某方阅《申报》，乃知为袁悬赏通缉之要犯。当弁逮时，翊武曾倾囊与之，许以富贵不相忘。幸吾弁不为所动，否则彼其漏

①袁世凯致黎元洪电，“蒋公天下才，鄂省不得而私之。”见《中国国民党史稿》《蒋翊武传》

②袁世凯授蒋翊武陆军上将军衔，勋二位，并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蒋拒受。（同上）

网矣。”余曰：“我与翊武旧相识，俾余一见，真伪自明。”步衢令导往署所见之，果翊武也！

余趋出，星夜往桂林，谒陈炳坤谋营救。不料步衢邀赏心切，不先呈报地方，迳电袁贼表功。迄翊武解桂林，陈已先得袁电，令其就地处决。陈出电示之，翊武神色自若，索纸笔作遗书付从者。翌日，即在桂林丽泽门外从容就义，时年二十九岁。

编者按：万武先生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我们于一九六一年收到来稿后，又收到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寄来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万武先生口述的补充材料。摘要如下：

我认识蒋翊武，是在湖南时务学堂，当时我是校外生，蒋是正式学生。不久蒋即赴湖北参加新军。传闻他到武汉后曾去过广东，因不在一起，彼此无来往。辛亥革命后，我任全县知事，在蒋被捕时又重见了他。

蒋在讨袁之役失败后，携一老仆人，从汉口逃往广西，准备再举。走到全县边界黄沙河时，巡防军统领秦步衢部下一排长，见其形迹可疑，捕送秦处。我当时正任全县知县，并不知道此事。因秦步衢派人到县署借僚饬，始知蒋已被捕。我即借故为秦道贺，去拘蒋处所——江西会馆，见蒋被绑在会馆内的戏台上。蒋虽与我为旧识，见面不敢打招呼。我归后即连夜到桂林，求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陈炳坤为之营救。陈说：“我要救他，只有我造反。因为我是袁总统手下的师长，怎么能把蒋放掉呢？”

蒋被捕后解到桂林时，押在第一师的黄克昭营部。蒋自知必死，曾向师部书记陈家正（我和蒋介绍给陈炳坤的人）说：“请你向师长说一声，这两天天气很热，如明天就杀我，最好不要在中午，以免尸体腐臭。”闻之令人惨然。我见到蒋时，彼此无话可说。蒋当时有诗赠我，年久不复记忆了。

## 仇 亮 事 迹

胡 达

仇亮，原名式匡，号槐存，湖南湘阴县人，前清廪生，于一九〇三年春选拔出洋，留学日本。初入振武学校，后转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一九〇五年秋，孙中山、黄兴组织同盟会于东京，亮即加入为会员，被推为湖南支部长。湖南当日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学生，多由其介绍加入同盟会。毕业归国时，黄兴赠以联云：“天生此才必有用，我与子别当谁从”，亮答之以诗，有“誓把雄心挥一剑，积尸不谖敌人多”之句。抵北京后，向清廷陆军部报到，奉派往山西与阎锡山同练新军。辛亥山西光复，阎锡山任都督，派仇亮代表南下。嗣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为陆军总长，任仇亮为陆军部军衡司司长。

南北议和后，政府北迁，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同盟会在北京创办《民主报》，推仇亮主笔政。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与各小党派合并为国民党，亮任本部会计部长。复与黄兴创办垦植协会，推黄兴任会长，亮副之。翌年宋案发生，袁世凯竟为谋杀主犯，亮借《民主报》伸张正义，痛诋袁氏。迨李烈钧溯口讨袁事起，《民主报》即被查封，亮逃往天津。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四散，多有流亡日本者。亮则暗地回到湘阴家乡，至一九一五年，隐居既久，思出一游。其父景祺先生，亦冀其有所建树，同意其行。适北京陆军部次长蔣作宾系亮同学，函约其游京。亮亦有事在京

待理，遂应蒋召进京，住同乡梅蔚南家，拟探问亲友，料理私事后即行他往。不料为袁探所侦知，至被逮捕，系于军政执法处。蒋作宾等虽欲营救，在专制淫威之下，无能为力。当时掌握执法大权者，为残暴的陆建章。迭次刑讯，亮均慷慨抗辩，始终不为稍屈。并在狱中作绝命诗六章，悲壮沉郁，不忍卒读。一九一五年农历六月初九，被害于北京鬼门关二龙坑，由仇鳌之二兄仇昆山为之收殓。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明杀仇亮后，肆虐海内，帝制自为，愈无忌惮。仇亮痛恨元恶大奸，口诛笔伐，不避斧钺，致遭杀害，为国牺牲，事迹伟烈，未可淹没，特为写出，并录其所作绝命诗六章于次：

### (一)

非种锄除绝稗莠，无端荆棘冒山溪。  
有人竟指鹿为马，争食何分鸛与鸡。  
和议铸成顽铁错，冤魂长伴宝刀啼。  
高冈忍令生象豕，敢信人天物我齐。

### (二)

祖龙流毒两千年，百劫残灰死复燃。  
碧血模糊男子气，黄袍姣宠独夫天。  
那堪新莽称元首，定有荆轲任仔肩。  
世不唐虞心不死，望中凄绝洞庭烟。

### (三)

一别家山痛绝裾，壮怀几幸汉朱虚。  
十年大梦羞屠狗，万卷残编饱蠹鱼。

却恨诗书真误我，从知魑魅不欺余。  
戈挥落日终难返，青史千秋自毁誉。

(四)

兰荃憔悴不闻香，欲托湘累续九章。  
大地风云斗龙虎，孤臣铁石铸心肠。  
沧桑一觉黄粱梦，傀儡谁登劫火场。  
三尺剑锋霄鹗鹗，几回搔首问苍苍。

(五)

曾将宝鼎铸神奸，自笑天生本性顽。  
热血尽堪膏野草，痴情偏欲学文山。  
闾扉寂寞空回首，泉路交游不赧颜。  
努力追随宋渔父，头颅同我索生还。

(六)

南冠佩客任浮沉，九死何曾有悔心。  
独恨魔王能作怪，忍教壮士早成擒。  
当途豺虎塞天地，片刻波澜变古今。  
谁与招魂归故里，茫茫湘水俯千寻。

一九六二年三月

# 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

刘安鼎

我的父亲刘揆一，字霖生，出生于清光绪四年农历十一月初十（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三日）。我家原笈衡山，后来迁至湘潭。

为了便于叙述父亲的生平事迹，以下准备按时间序列分为若干段落来写我的回忆。

## （一）

我父亲是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的旧知识分子，祖父名叫刘方亮，原为衡山乡间的一个自耕农，因其膂力过人，闻名乡里，在太平天国时期，被湘军征募入伍，离乡背井，走上与汉族同胞自相残杀的战场。他曾在军中以只手当风擎大旗，不稍动摇，被誉为“刘大旗”，擢升曾国荃某部的掌旗官。天京被困之役，他奉命在一次夜巡中，偶然捕获一个推城而下的太平军将佐名林敬荣者，审讯时，其人拒不下跪，指营帐上所悬岳飞像对我祖父慷慨陈词，宣传民族大义。祖父听了以后，且惊且慨，寻思良久，终于放走了这个俘虏。自己在放走俘虏后，夺马狂奔，逃回故乡；继而携眷逃亡到湘潭县白石铺八斗冲，买了几亩田，改名刘明远，以务农为业。十多年后，家口日繁，负担越来越重。他托人在湘潭县衙门找到一个差役的职位，把家搬到湘潭城内，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在封建社会中，衙门差役是属于所谓“三教九流”的下层

社会，为一般人所鄙视。祖父望子成龙，要父亲和叔父读圣贤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以便改变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父亲早年在回顾他读书情景时，曾对我说过：“我和你叔叔最初都上过私塾，学的是一些旧东西。我们读书都很发狠，为的是光宗耀祖，不被别人看不起。后来新学在湖南开办了，我们才打开眼界，晓得废科举以后，旧学的那一套已没有用了，才改治新学。当时，我们什么书都看，什么新知识都想学到手，为了苦学博览，我们曾把自己倒锁在房里，可以几个月足不出户，饮食便解都由家里人从窗口送进送出。那时，湖南开风气之先，常有名人来长沙讲学，我们也不怕路远，跑到省里去听讲。我喜欢看梁启超写的文章，但他的演讲却不高明，我是领教过的。”

我不清楚祖父在县署里当差役是干的什么事情。有一次，我看到他为祖父写的类似传记的文章中，提到祖父的职务是个“里门樵”。顾名思义，这样的差使大概是相当于法警或捕快之类的职务。做这种工作，就必须和下层社会保持联系，深入了解一些游民无产者的活动情况，以便掌握线索，通过他们去侦查案情，缉拿罪犯。因此，祖父和会党中人是经常有接触的。可能由于这个原因，父亲平日在言谈中，对《史记》中荆柯、聂政以及朱家、郭解这类人物的豪侠精神，津津乐道，极为倾慕。他很早就和哥老会党中人有过交往，一定是受了祖父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民怨沸腾，人心浮动，变乱有一触即发之势。清廷为了防患未然，密令各地方官更派兵缉拿会党首领人物，就地正法。马福益在湖南、江西一带拥众十余万人，正是清廷亟欲捕获的对象。当时，湘潭县署接到此项密令，将派兵前往搜捕正在湘潭附近活动的马福益。祖父闻讯后，乃密嘱父亲向马通风报信。据说，当时父亲通过会党中人的指引，在湘潭郊区江

边的一家小客栈中找到了马福益，密告一切，嘱其远遁。马感祖父救命之恩，对父亲遂以“恩哥”相称。他们之间的这一友谊，想不到以后竟成为华兴会联合会党行动的契机。

一九〇三年春，父亲以自费生东渡日本留学。他后来经常向我提到，祖父当时拼凑给他两百六十元，以后就再也接济不上了。这笔钱除了川资等费用外，仅仅够他在日本留学一年的使用。怎么办？到东京以后，打听到只有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八个月就可以毕业回国。因此，进了这个学校。入校后，他很快就和黄克强结成密友，相互切磋砥砺。

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因为清廷腐败无能，要救亡图存，首先要推翻清廷的统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非武装起义不能成功。他们经常和其他留日学生联系，讨论此事，为学成归国后进行武装起义作准备。还和兰天蔚、李根源等组成“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技能。父亲以自身的体会鼓励我锻炼身体说：“我在日本学过军旅之事，参加过行军、射击的训练。最初因为身矮体胖，常常掉队，落在别人后面。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就能逐渐跟上来。”

## （二）

一九〇三年夏秋，黄兴、陈天华先后返国，从事革命活动。随后，我父亲也回来了。黄兴应聘在长沙明德、经正学堂担任教师，父亲则在醴陵渌江中学堂任监督，课余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清廷种种罪行。经过一段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决定筹建华兴会这一革命团体。关于华兴会的成立经过、策动马福益参加革命和甲辰长沙起义及失败出走经过，父亲在所撰《黄兴传记》中已有详细叙述，这里就不赘述了。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会成立时，

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干事。后来我父亲也加入了同盟会，并被任为庶务干事。父亲对孙中山是非常敬佩的。我在童年时，他向我讲起，孙中山对欧美的民主政治有精湛的研究，他的先进的革命思想体系就决定了他有资格成为同盟会的当然领袖。并说，孙中山特别长于口才，有些反对他的人，在听了他的演说后，每每为之折服，而成为他的信徒了。

一九〇六年长江流域各省大水灾，国内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孙中山、黄兴认为形势有利于革命的进行，乃派我的叔父刘道一和蔡绍南等潜返国内，运动新军和湘赣等地会党，酝酿武装起义。叔父返抵长沙后，立即召集在长的同盟会人在水陆洲一本船上开会，密商进行方略。计议既定，乃决定由我叔父留驻长沙，掌握全盘并负责与同盟会本部及与各方面的联络工作，蔡绍南则前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和军队。十二月四日，蔡绍南、龚春台、姜守旦等领导的萍浏醴起义爆发了，当时声势浩大，起义军中安源矿工参加人数竟有六千人之多。清廷急令湘、鄂等省驻军前往会剿，大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刘道一当时正在长沙为起义作最后的部署准备，致被游击熊得寿发觉逮捕。清廷怀疑我叔父即刘撰一，而又查无佐证，乃以其佩章上刻有“锄非”两字，罗织成罪，判处极刑。同年十二月卅一日，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刘道一是同盟会成立后为革命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道一烈士身殉革命，当时我的祖母曹庄在长沙周南女学堂读书，闻讯后就自缢于学堂宿舍中。我祖父在惨遭家难后，急得中风，不久死去。剩下一家老少妇孺，在哥老会党人的帮助下，由我母亲黄自珍带领，辗转去到日本，和父亲一起过着流亡生活。全家在东京住了五年之久，到一九一一年春，为生活所迫，又冒着风险，潜返故乡，匿居八斗冲。那时，全家生活困窘，靠母亲替别人做些裁剪缝补的活计来

勉强维持。

萍浏醴起义失败叔父牺牲的噩耗传到日本以后，父亲悲痛万分，愤不欲生。当时，留日的同盟会人亦莫不痛心疾首，纷纷请缨归国杀敌。其中，秋瑾烈士对叔父之死，尤为愤慨。不久，她就与光复会的徐锡麟发动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事件，使清吏为之震慑。徐当场即被捕牺牲，秋瑾旋亦被清吏捕获，就义于绍兴。

孙中山和黄兴对道一烈士的殉难，都曾写有悼诗，传诵多年。孙中山挽刘道一的诗是：“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 (三)

同盟会是由几个反清团体组织成的，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记得我父亲早年也对我谈到过这些分歧的由来及其后果。他说：同盟会成立之初，孙、黄之间为设计国旗问题，就发生过争执，后经他调解后，黄强先生才做出让步。另一次意见分歧是，一九〇七年清廷要求日本政府驱逐中山先生出境，中山先生离开日本时，接受了日本朝野一笔赠款，准备用于发动武装斗争，同盟会内部章太炎等人借此攻击诋毁，引起纠纷。当时黄兴恳切告诫党人：中山先生德高望重，应该倾心拥戴。父亲在党人中做了许多排难解纷的工作，说服大家要以团结为重，按照中山先生的策略行事。中山先生离开日本后，把同盟会东京本部的总理职务委托黄兴代理。不久，黄亦往越南筹备在河口、镇南关等地的武装斗争，总理职务又交由我父亲代理。从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一年，父亲代理此项职责达六年之久，做了大量的工作。

武昌起义成功后，我父亲自日回国，应黄兴之命，返湘向焦

达峰要求派兵援鄂。在返湘求援途中，火车尚未抵长沙，就听到焦达峰被乱兵刺杀的消息了。关于请兵援鄂问题，谭延闿在接任都督后，一口答应了。但兵发岳阳，又意存观望，踟蹰不前，屡电催促后，才开抵汉阳前线。这批援军，既无纪律，又缺乏战斗力，以致汉阳一战，首先就是从他们所守的阵地被突破而溃败的。汉阳之役失利后，黄兴和我父亲先后去沪。

#### （四）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间，南京为革命军攻克，各省代表在南京集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据我父亲告知：他那时是湖南省的五代表之一，其余是谭人凤、邹代藩、廖名缙、欧阳振声。

一九一二年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我父亲对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本不赞同。宋教仁主张实行西方的责任内阁制，使袁世凯不能大权独揽，为所欲为。他对此也有怀疑。所以，他在同盟会解体后，即另组一个名叫“相友会”的小团体，未再参加国民党。

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之间，我父亲一度入阁，担任北京政府工商总长。在他任职期间，曾发起组织一所名为“大同学院”的学校，目的在于为未来的革命工作培养一批人才。不料，袁世凯在暗杀宋教仁以后，对我父亲的所作所为，猜疑日甚。父亲乃以协助处理宋案为名，遍赴上海和孙、黄秘密会晤。随后亦职前往天津，创办《公民报》，运用报纸为武器，不断揭露袁贼的罪行。

在他亦职去天津办报之前，袁世凯就派当时的内务总长朱启铃查封了开办不过半年的大同学院，遣散了大批学生。在他去津办报初期，袁世凯派人来我家找父亲密谈，以金钱官爵作诱饵，条件是不再在《公民报》上刊登反对帝制运动的言论，父亲严词拒

绝了。

一九一五年，袁贼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密谋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袁之族侄袁瑛（号不同）出于爱国之动机，从其父袁乃宽内室窃得藏有此项密约付本的文件包，逃往天津，交给我父亲（袁不同在日本加入过同盟会，故与父亲相识）。当时，外间对袁贼与日使接触频繁，虽有怀疑，但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却了无所知。迄《公民报》获悉密约内容，予以揭露后，遂轰传一时，引起国内外的一致反对。《公民报》社址原设在天津旧日租界的旭街，父亲想到揭露《二十一条》的内容后，日租界当局必不会容忍它继续出版，故预先将全家迁出日租界。不久，报馆果然被查封了。同年冬，蔡锷秘密出走抵津，急趋我父亲寓所，以避袁探跟踪。父亲极力为之掩护，并为代购赴日船票，使其绕道去滇。蔡本拟约我父亲同去云南举兵反袁，因祖母劝阻乃止（祖母逝世后，父亲在补告中述及此事经过）。

### （五）

一九一九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我的父亲却静静地守在家里，闭门课子，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一九二一年前后，母亲的病势越来越严重，父亲决定由天津迁家到北京就医。

一九二五年春，孙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我记得父亲曾怀着悲痛的心情写过一首很长挽联去吊唁过。接着，段琪瑞被赶下了台，曹锟贿选总统，发生了护法运动。许多拒绝受贿的国会议员为了免遭迫害，纷纷来到我家避难。当时，我家住在北京西城的灵境宫，比较偏僻隐蔽。他们受到父亲的掩护，躲了几天，才陆续转移到南方去参加护法运动。不久，父亲也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初，他又失望地回到北京，退隐家园。

很少与外界接触。那时，家境十分困窘，他为生计所迫，就闭门著书，用回忆录的形式，写了《黄兴传记》。这本书在京华印书局印刷后，由我送往北京各书店去寄售。当时，家里的生活就是靠这笔书款贴补过来的。

## (六)

“一·二八”事变以后不久，父亲把全家迁回湖南故乡，我由天津转到上海求学，父亲也常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那时，他和章太炎常相过从，并不断以诗词唱和，借古讽今，抨击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他所作的诗词，登载在一些非官方的报刊上，因而遭到反动当局的嫉视。

一九三四年前后，有一次，我在暑假中到南京一家旅舍去探望父亲，看到他正在分发一本题为《救国之我见》的小册子。内容是呼吁国人督促政府恢复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以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这大概就是他最后的政治主张了。

抗战期间，他一直隐居在湘西洪江，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贫困夺去了他的健康，得了肺结核病。但是，他的性格却还是过去那样倔强，并不以清贫为苦。

一九四八年，父亲已经七十岁了，章士钊在上海记起他的诞辰，特亲自撰写了一篇《寿序》派人送到湘潭，以表祝贺之忱。原文对我父亲的一生作了概括的评价。略谓：“先生性长厚，寡言笑，实心任事，不计劳怨。弱冠即好与会党中游，马福益其至友也。吾识先生在甲辰、乙巳间，时黄克强先生创立华兴会，首事者十二人，先生与吾皆在其列。领其事者，虽为克强，而会中一切之计，则先生独尸之。”

解放前夕，我父亲一度去到长沙，和程潜、黄一欧等有过接触。不久，就又回到湘潭了。解放后，父亲被聘为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一九五〇年秋，听说父亲病重，我又回到故乡探视，并侍奉汤药。当时抗美援朝的战争爆发了，父亲虽已病倒在床，每天还要我给他读报。同年十一月一日（农历九月二十二日），父亲病故于湘潭，终年七十二岁。湖南省人民政府致送了丧葬费。

父亲死后，我想找到外间传说他已写好的《革命春秋》一书的遗稿，却始终未能寻获。只在书桌抽屉里发现有毛主席写给他的两封亲笔信，章太炎早年和他唱和的十多首诗，章士钊所撰的那篇《序》和一本为纪念叔父刘道一牺牲而编印的《衡山正气集》。

## 龙 璋 事 略

### 龙 伯 坚

先伯名璋，号特甫，字砚仙，湖南攸县人。生于公元一八五四年，卒于一九一八年。他二十三岁时，中了举人，与湘潭王闿运同榜，以知县分发江苏候补，做过沅阳、如皋、上元、泰兴、江宁等县的县官。一九〇七年丁母忧去职，以后就没有再做清朝的官吏。

龙璋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是儿女亲家。少年时代，即喜研究政治，博览新书，尤服膺卢梭的《民约论》。他认为改革政治，必须启发民智，发展工商，开设路矿，因此对创办学校，振兴实业，极其热心。在如皋任内，就捐资办了一所新式小学，这还是一八九七年的事。一九〇二年冬，胡元侠由日本留学归国，以兴学事亲到泰兴去访问他，他立即捐钱一千串，同时又写信给先父（龙绶瑞），叫他也捐出一千串，作为明德学堂（现长沙市第三中学）的创办基金。我省私立中学，以明德为嚆矢。后又与其他朋友创办南云商业学堂和湖南商业铁路学堂，以及观海学会等等，这里就不细说了。

他与同盟会的革命志士，很早就有往来。黄克强就是他的密友之一。由于这一关系，凡是从事于反清革命的，无论老少，他都引为同志，先后为革命捐输的款项，至少当在二十万元以上。章士钊（行严）在我所收集的《近代湖南手札》所作的跋语中云：

“辛亥以前，由海东贯长江，略洞庭而南，上下数千里间，吾党所为处心积虑，不论微随隐显，殆莫不有龙氏一门之心计与血汗渐渍其中。”

当黄克强于一九〇三年由日本返国后，准备回湖南组织秘密机关，从事革命活动。路过上海时，与当时主持《苏报》笔政的章士钊协商，认为首先必须解决经济问题。他们素知龙璋热心赞助革命，于是偕往泰兴，专以此事就商，结果如愿以偿。然后同返长沙约集同志，积极筹备成立了华兴会。这个秘密团体与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是鼎足而三的。一九〇五年，在东京合并改组为中国同盟会，由中山先生统一领导。

龙璋自一九〇七年解组回长沙后，除与同盟会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外，即按照他的初衷，从事教育和工商业。他办过贫民工艺厂、军用干粮厂、轮船公司等等。在航运方面，他购置了两艘汽船，往来于上海，长沙之间，运输客货，获利较多，从而引起他人相率成立华商轮船公司，对当时壟断长江航运的日商轮船公司给予了一定打击。同时他还代革命党人秘密购运枪械，对辛亥长沙起义也作出了相当贡献。某次周旋鳞为革命向他筹饷，他一时拿不出现款，竟以汽船一艘捐助给他。龙璋与谭延闿虽有世谊，但政治主张是对立的。谭在辛亥以前，根本没有参加过革命活动。他是清朝最末一届的翰林，父亲做过总督，与维新派人物常有往来，其所以被推为湖南省谘议局议长，显然与以上的几点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在长沙光复以后，就毫不费力地一变而为都督。他虽挂名为同盟会会员，走的却是宪政派的道路。他通过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的关系，倒向黎元洪的怀抱里，在二次革命时期，表现得极其露骨。龙璋与他的矛盾，也以此时趋于白热化。龙璋逝世后，谭做了一付挽联悼他：“三世数交亲，视我犹弟，俾

公犹兄，顿伤昔旧风流尽；十年经患难，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真觉平生负愧多。”这是套着左宗棠挽曾国藩的两句成语凑成的，因为曾左晚年也是意见不和，生死见交情，寓有忏悔之意。

龙璋平生好与青年人交朋友，看到青年人奋发有为，或具有某一点长处，总是多方奖掖，另眼相看。关于他提拔后进的事实，可举一例：地质学家丁文江，隶籍泰兴，其父亲当时在泰兴县衙门充当传达。丁文江时方十岁，龙璋爱其读书聪敏，特选拔入县学，以后又资助他出国游学。一九三五年丁游长沙时，犹有诗哭龙，称为恩师。自谓当年一次面试题为《汉武帝通西南夷论》。其后他研究地质及少数民族文化，以滇黔两地为多，所著地质学论文以及《徐霞客年谱》、《露文丛刊》等，据说是受了这一题目的影响。

龙璋出生于清代的一个仕宦家庭，自己又当了十余年的清朝官吏，对清代政治的腐朽黑暗，看得比较透彻。听说他年青时有这样一件轶事：郭嵩焘从欧洲出使归国后，好谈洋务，当时一般顽固分子斥之为汉奸，羞与为伍，只有龙璋和他最谈得投机。嵩焘曾感慨地说：“举世无知已，独此一少年耳！”由此可见，他在青年时的思想，就与众不同。戊戌政变以后，他目睹许多高谈变法的维新志士们遭到残酷的屠杀，内忧外患，相逼而来，认识到要挽救中国的危亡，非推翻这个腐朽的专制政权不可，因此，对孙中山先生开始所倡导的种族革命，表示衷心拥护。

关于龙璋的生平事迹，有人写过一些资料。我生得较晚，了解的也不太全面。谨就见闻所及，提供如上。

## 回忆我的父亲陈强

陈克难

我的祖父陈佑启，号我珊，曾任临武县书院山长十九年，后调岳州书院教授。晚年回常德后，又任德山书院山长，著有《耐冷山房诗文集》。一九〇〇年在常德去世，终年八十岁。父亲陈强，号惟城，又号伟丞，湖南常德人。生于一八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清光绪四年农历三月二十六）。

十九世纪末期，清王朝丧权辱国，帝国主义列强正欲瓜分中国之际，我父亲怀着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义忿，于一九〇三年留学日本。到东京后，决心学军事，以自费入陆军成城学校。一九〇六年考取官费，升入陆军士官学校，于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在步兵科第六期毕业。那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多半有革命思想，而以两湖学生尤甚。我父亲因爱国志愿相同，与当时在东京的留日学生黄克强、程潜、仇亮、曾继梧、程子楷、赵恒惕、唐继尧、章梓等一百多人组成革命同志会，反清排满，鼓吹民族革命。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先生与黄克强等发起组织同盟会于东京，又加入同盟会。他曾告诉过我：黄克强当时任同盟会庶务，对留日陆军学生的同盟会员特别重视，期望殷切，从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成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他和程潜、李书城、李烈钧、曾继梧、仇亮、李根源、程子楷等，都被吸收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互相切磋砥砺，直接听命于黄克强。此外，我父亲在

日本时跟蔡锷有颇为密切的关系；跟宋教仁、林祖荫的交谊也很深，往来较多。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文部省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忿而跳海自杀，以示抗议。陈天华自杀后，尸体被当地日本警察署捞了起来。我父亲和其他同志受同盟会委托，护送陈的尸体回国。运到长沙后，由禹之谟等发起公葬于长沙岳麓山。关于这件事，他不止一次同亲友谈过，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父亲在日本留学七年，于一九〇九年春归国。初在保定讲武堂做教官，后调回湖南陆军四十九标任管带。四十九标、五十标是湖南的新军，仿照日本陆军编制装备而成，一般中级军官多为留日士官生，士兵也接受革命宣传影响有年，大都倾向革命。清政府不敢信任这些带兵的留学生，不久调我父亲去湘西做镇竿道台，镇压少数民族。随后迫于形势，又调回长沙四十九标训练新军。他在日本受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回国后训练新军时对士兵的要求也很严格，而他自己又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那时在士兵中流行着这样的话：“早不吃粮，迟不吃粮，吃粮就遇到陈强”。

一九一一年秋间，武昌起义后不久，我父亲即随王隆中率领所属新军援鄂，在战时民军总司令黄克强领导下反攻汉口，参与汉阳防守战。焦达峰、陈作新被害后，谭延闿篡夺了都督地位。谭本属立宪派人物，平时是个八面玲珑的和事佬，在当时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中，他实际上是站在旧派一边的。但在表面上却装作赞助革命，以捞取政治资本。他见我父亲拥有武装力量，与赵恒惕、唐生智、宋鹤庚等关系密切，又是革命派的中坚人物，所以要他做参谋长，借此作为缓冲，敷衍一时。后来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为巩固其反动派统治地位，首先要剪除各地的革命势

方。袁派遣他的爪牙在各省搞暗杀、逮捕等恐怖行动，排除异己，一九一三年三月在上海刺杀了宋教仁。在这同时，长沙我家也被袁贼爪牙投掷炸弹，并派人追捕我父亲。当时北京政府陆军部还下令，将我父亲和程潜、程子楷、张孝准等“褫夺军职严拿”，指为“湘省之乱”的“执重要事务者”。在此情况下，他只好逃入汉口日本领事馆避难，化装乘日本商轮赴沪，再搭海轮往日本横滨，那时正是“赣宁之役”讨袁军事失败之后。他后来回忆这次亡命赴日，临走时多赖程潜的帮助，程当时刚交卸湖南军事厅长，有能力照料老朋友。在日本亡命期间，中山先生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要打指模，宣誓服从总理孙先生。许多同志不同意这种作法，我父亲也不同意，他与程潜、李根源、章士钊等发起组织“政事研究会”。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欧洲风云突变，他们名为研究国际时事，实系团结同志，积蓄力量，从事国内的反袁斗争。

一九一六年春，袁世凯称帝阴谋已成事实，我父亲极为忿慨，即与程潜、程子楷等相继回国，参加护国战争，在湖南组织队伍，用实际行动响应蔡锷的云南起义。

一九二一年南北军阀混战，赵恒惕在湖南标榜联省自治以自保。赵是我父亲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曾邀请他出任湖南审计院院长三年。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我父亲在南京时，蒋介石曾派贺耀组送来任命状，请他出任南京卫戍司令，我父亲当面拒绝，说：“你们杀人，要我当屠户，我不干！”此后就因与蒋政见不合，迁居上海，一直没有做过实际工作，国民党的军事参议院成立后，他被任为该院参议。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大约是一九三二年夏季，我从上海提

兰桥西牢释放出来，回家看望他。当时他对我从事革命活动表同情，说：“处在今日的中国，不革命就要做亡国奴！你们搞革命我不反对，只是要有专长，大学毕业后革命不迟”。那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也知道他富有爱国心，同情革命，因而都乐于和他接近。在上海工作的董维键、凌炳（董是湖南桃源人，留美得博士学位，大革命时曾任湖南省教育厅长，凌是湖南平江人，曾任省会议员）常来我家，同他交换对于时局的看法。

其时常来我家的，还有曾在长沙开设“三井洋行”的日本人山本荣治，他和当时中国统治阶级中的新旧人物都有关系，对这些人的特性、家产、思想以及家庭情况，都很明了，他全身中国衣冠，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很难认出他是个日本人，“九一八”事变后，一天，山本荣治又来到我家，我父亲知道他的底细，便明白地对他说：“过去我们是熟人，现在贵国出兵侵占我国土地，虐杀我国人民，已经是我们的敌国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我家！”从此山本没再来了。关于山本荣治这个人，据我所知，他确是当时日本陆军省的情报员，在中国犯了不少罪恶，日本人中称他是“中国通”，抗战中期（大约一九四〇年）在北平被人打死。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以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那时我在长沙做救亡工作，他积极支持，并向友人募捐，自己也捐了款，交给我们去慰问伤兵。他对殷汝耕、王揖唐以及后来的石友三、韩复榘这些汉奸十分痛恨，骂他们是一伙民族败类，无耻之尤。看到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有的一战即溃，有的不战而逃，而自己投闲置散，不能率部和日寇周旋，他感到十分遗憾。于是退而求其次，下决心不做顺民，向湖南偏僻地区隐蔽。从一九三八年起，先后迁到邵阳、零陵、道县、宁远、嘉禾一带避难，过着极端艰苦的生活。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病故，终年六十六

岁。时在嘉禾农村，被日寇围困于炮火离乱之中，可惜没有看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 谭延闿的生平

阎幼甫

我和谭延闿志不同，道不合，既非朋友，也无恩怨，仅仅在湖南光复初期，同过几天事。其后，仍或接谈，与其亲友接触则较多。兹就见闻所及，对谭的生平，作一鳞半爪的记述。

谭延闿，号组庵，又号畏庐。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己卯）出生于湖南茶陵县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亲谭钟麟，字文卿，咸丰年间的翰林，做过御史。后由左宗棠保荐，调任甘肃布政使。当左经略西北时，谭钟麟对左军粮秣的供应非常卖力，做到了“飞刍挽粟”，不避艰难。在西北作战，粮秣极为重要，所以左宗棠把谭比之肖何，保举他做到陕甘总督。随后调闽浙总督、两广总督。谭钟麟生有五个儿子，谭延闿排行第三，他和老四、老五都是庶出，谭延闿少年时代读书，所从的都是名师。他很聪敏，十多岁就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公子。谭钟麟任两广总督时，就在他父亲身边出谋划策。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三公子”的称号（谭嗣同，陈三立，谭延闿。谭嗣同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他们三人都随宦在各人父亲的身旁，也过问政治，所以出名。谭延闿是其中最年轻的。）

谭延闿小时，最为他的老父所钟爱。他的两个哥哥都是蹲在家乡吃地租的。四弟死得早，五弟名叫谭泽闿，擅长书法，字仿翁同和，经谭延闿极力吹捧，便成了书写名家，也以好吃著名。

谭延闿的老婆，据说是一个温顺的女人，夫妇感情很好，在谭第三次督湘时，死在上海。从此，谭延闿成了鳏夫，一直到死。他断弦后，有许多人为他介绍续娶，他便念出他的悼亡诗：“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加以谢绝。谭延闿有好几个儿女，他的儿子谭伯羽，经蒋介石提拔，做过经济部次长。他的女儿中有一个名叫谭淑的，嫁给袁树勋（字海观，湘潭人，曾做过两广总督）的第六子，谭淑的字写得好，学他的父亲写钱南园派。另一个女儿经蒋介石做媒，嫁给陈诚做老婆。

### 谭延闿的发迹

谭延闿中举后，到北京会试。其时湖南人京官中有两大巨头，一是瞿鸿机，协办大学士；一是张百熙，礼部尚书，后来改称学部大臣。这两人都是他父亲的好朋友。瞿、张两人很器重他，便对他说：“清朝二百余年来，湖南没有出过一个会元。湖南会馆有一笔奖金，曾积存到二十多万两银子，准备奖给新来的会元。但是这笔款项近来挪用一空。如果出了会元，同乡京官就无法应付。因此，湖南举子想点会元，辄为同乡京官所阻挠。你如果声明不要这笔钱，我们就设法使你得到会元。”谭延闿是阔公子，想的是会元，并不为钱。据说他曾遍请同乡京官，声明：如果他得到会元，就愿把这笔积存下来的奖金捐给会馆，由会馆去处理。由是得瞿、张两人之力，谭延闿果以会元魁天下，接着点翰林入词馆。

清末，要求立宪的风潮从各方面袭击而来，清廷被逼得不可开交，不得已筹备立宪，先设立各省咨议局。谭延闿看到“富贵逼人”的形势已经到来，就凭着他固有的政治资本——世家子弟和多绅地位，大肆活动。他有各种条件：第一，他在抚台和藩台

衙门走得通；第二，他父亲的故交和门生多；第三，他的科甲同年在省里很多。湘省大绅士王闿运、沈让溪、王先谦、叶德辉、彭青藜、龙湛霖、吴雁舟诸前辈，都是可为他帮忙的。谭三少爷请客送礼，有的是钱，所以他想得到的湖南咨议局议长一席，有如探囊取物，伸手便得。

谭凭着家世和科甲出身，攫得湖南咨议局议长的高位以后，在官场中，便左右逢源，扶摇直上了。

### 辛亥革命时期的谭延闿

清廷的腐败无能，到了西太后专制的晚年，更撑不住了。其时政治运动出现了三派：一、保皇党，二、宪政派，三、革命党。在清廷看来，保皇党受到打击之后，已无能为力。宪政派，是一些改良主义分子，可用利禄笼络之。唯独革命党不妥协，不怕死，难于应付，必须坚决铲除。

谭延闿虽是一个搞政治活动的人，但对上面所提的三派中，和宪政派的人接触的机会多，近墨者黑，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宪政派。辛亥革命高潮汹涌，他参加了铁路民办的运动，几次奔走北京，不得结果。武昌首义成功了，湖南绅士中黄忠浩和谭延闿两人实权最大。巡防营掌握在黄忠浩手中，咨议局由谭摆布。在长沙的革命党人，想把这两个人联络好，作为臂助，甚至指望他们两人能够站到革命旗帜之下，并愿以高位让给他们，借以减少革命的阻力，曾经文斐、吴作霖、易宗羲三人去和黄、谭两人分别洽谈。黄表示他将学曾文正，谭则唯唯否否，对革命并无热情。湖北军政府派来代表庞先志、蓝综两人，由左益斋介绍和谭面谈。庞、蓝告诉谭：湖北的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参加革命，已被任为军政府民政部长，劝谭乘势赞助革命，借以取得湖南民政的领导。

谭虽心动，但表面上仍是吞吞吐吐，暗中却在积极布置，企图抓到民政部长。九月初一湖南光复，他抓到了民政部长，并不满足。就在当夜他又提出设立临时参议院，自任议长（湖北并无参议院）。当时焦、陈被他瞒住，让他用浑水摸鱼的手法搞出了一个临参，还导演了一幕“都督发令条例”的丑剧，湖南文献资料中有记载，不赘述。

焦达峰、陈作新是湖南辛亥起义的首脑。他们被杀后，谭延闿继任都督。杀害焦、陈的主使者是谁，当时传说不一。有人说，谭是主使者；也有人说，谭只是杀害焦、陈的反贼们所抬举出来的傀儡。谭之为人，深谋远虑，阴险叵测，而又野心勃勃。梅馨是杀害焦、陈的刽子手，谭延闿任都督后，对梅不仅不加究办，反而重用为第三师师长和长宝镇守使，蛛丝马迹，说谭是杀害焦、陈的幕后主使者，是有一定的依据的。至于说谭是被人抬作傀儡的，显然是庇护谭，为他开脱罪责的借口而已。

谭和焦、陈，本无渊源。在焦、陈时代，谭尚貌似谨慎。焦、陈被杀，谭即取而代之。从此，谭在二十年政治生涯中，居然巍然挂起革命党的招牌，以革命先觉自居。

有人说谭延闿在光复前，曾到天心阁和新军代表讲过话。据我所知，绝无此事。谭和文斐、吴作霖、易宗羲都是朋友，谈话尚且吞吞吐吐，怎肯正式和新军代表见面呢？事实是焦、陈被杀后，新军起哄，周震麟曾经作为谭的代表，拿了几万元去劳军，向新军讲了话，遂搞成张冠李戴。

## 应 付 黄 兴

黄兴在明德学堂教书的时候，谭延闿在龙莫溪家宴会上认识了黄兴。谭迷信“看相”，看到黄魁梧奇伟，沉着厚重，两目奕奕

有神，认为是一个有作为的人，前途不可限量，内心钦敬。但由于黄是革命党，谭认为是危险分子，不敢和他亲近。

辛亥革命时，黄任战时总司令，在武汉前线指挥作战。湖南光复，谭延闿资缘时会，做了民政部长。其时鄂军中新改编的一个部队，由宋锡奎（原任协统）率领，因作战不力，失掉重要据点，畏罪潜逃，拖着队伍向湖南逃窜。焦达峰接得黄电，立即派队沿江堵截。适焦被杀，谭登台，谭知道焦是同盟会的人，原受黄兴、宋教仁的指挥，焦遭冤杀，对黄无法交代。恰值宋锡奎已被湘军捕获，谭即电黄，故作姿态地说：“焦、陈被杀，实深痛惜。群龙无首，被迫承乏。延闿不谙军事，难孚众望，请即派员前来接替。逃将宋锡奎经湘军捕获正法。并闻。”其时正当战事紧张，对湖南突变的内幕，黄还未明了，因即复电，嘱谭善维湘局，续派大军到武汉增援，其他可随时电商。谭延闿随后派代表去汉，详陈湘中一切，表示一切听命。黄对焦、陈之死，实极痛心，因大敌当前，对湖南事变，只好暂时容忍，不予追究，以免湖南革命已成之局别生枝节。以此谭对焦、陈被杀，又得以蒙混而过。

不久黄兴将总司令交给蒋翊武，自去上海筹划进攻南京的军事。谭延闿很敏感，马上又派代表携银十万元送交黄，作为进军南京的费用，借以讨好黄兴，并妄图进一步弥缝他对焦、陈被杀的罪责。

一九一二年秋，谭知道黄将回湖南视察，极力筹备欢迎，将小西门改为黄兴门，以表崇敬开国元勋的“诚意”。黄兴听到谭改小西门为黄兴门，曾对谭的代表说：“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作风，要不得。如果将黄道门（南门）改为华兴门，那门是对当年华兴会同志们在南正街进行艰苦斗争的景仰。”

黄兴对谭延闿的为人，心中是有数的。有些同志怪黄没有为

焦达峰报仇，向谭追问一个水落石出。据田兆昆说：黄兴在一九一六年的一天谈起焦达峰时说：“焦大鹏（达峰字）牺牲已经五年了，他对革命可说是交了卷。而我们对他的冤死至今还没有查出结果：对他是没有交卷的。”可见黄兴对革命同志不是淡漠的，当日对谭延闿谋杀焦、陈，黄未加根究，实由战事匆忙，湘局粗定，很可能是出自投鼠忌器。

### 讨好袁世凯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对当权人物中的一些曾在清朝居高位的官僚和世家出身的人们，进行笼络，借以分化瓦解。谭延闿正是袁要拉拢的对象之一，其他如阎锡山、汤寿潜、程德全、黎元洪、汤化龙、沈炳堃、王芝祥、陆荣廷、孙道仁等，都先后被袁收买或勾结过。

谭延闿曾派亲信秘书唐乾一（坤成）为驻京代表，每月交际费用达几万元。唐是一个无孔不入的人，在北京每天坐着漂亮的新马车东奔西跑，每两天大宴宾客一次。据唐自己说：每天必有一两个密电向都督报告京中情况。有一次，唐乾一请客，谈得高兴，他说：“我们都督和京中各方面的关系都不错，有不少是有着世交渊沉的。对袁项城和徐东海（世昌）的书信往来，都是亲笔，从不盖章。对大总统的信，称慰庭老伯大人。对徐东海的信，称弼人世伯夫子大人。这类信都是由我亲自递呈的。”唐乾一说这番话，原意在炫耀谭的家世和他在官场吃得开，却意识不到他是抖了谭的老底，留下了历史的真相。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刺，国民党大举反袁，谭延闿被迫宣布湖南独立。二次革命失败，谭即取消独立，归顺袁朝。当时报载徐世昌有电嘉奖谭，谭复电云：“湖南独立，系水到渠成，

延闓不任其咎；取消独立，为瓜熟蒂落，延闓不居其功。”他自己把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丑态勾画出来了。

谭取消独立后，来到北京。袁世凯正是气焰万丈时，深恨谭的反复无常，便给他一个做不为礼。传闻袁仅仅接见他一次，便把他凉在一边。谭耐心等了几个月，每天除到东兴楼、福寿堂、明湖春、丰泽园、便宜坊、致美斋和劝业场的小有天等处吃喝以外，就在琉璃厂的古书店里兜圈子，终于失望离京，暂时潜踪，跑到青岛作寓公，托庇洋人，苟全性命于乱世。

### 勾结吴佩孚

吴佩孚比谭延闓年长六、七岁。当吴佩孚率北洋陆军第三师驻衡州的时候，正是直皖势力发展不可一世的高峰。谭延闓却局促在湖南郴州一隅。经张其钺在谭、吴间奔走，拉拢他们的关系，因而成了好友。张其钺号子武，和谭有年世谊，和吴是老友，曾任吴的总参议。

张敬尧督湘时，军纪废弛，作恶多端，为湘人所痛恨。吴佩孚治军比较严明，对张敬尧所作所为，颇为不满，曾劝说过张，张却怙恶不悛。特别是当直皖矛盾已深，吴属直系，张属皖系，势难两立之际，吴佩孚断然从衡阳撤军北去，张敬尧则失去前王，也只好随之逃出湖南。谭延闓得以卷土重回长沙，进一步加深了谭、吴之间的关系。

吴佩孚离湘后，曾驻防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正是盛极一时。吴有一个参议名叫葛豪，岳州人，原是吴佩孚的随从副官。谭为了讨好吴佩孚，遂委葛豪为岳(岳阳)临(临湘)警备司令，领有两团军队。事实上其副司令易凤传(葛豪的姐夫)负责。吴佩孚远在洛阳，居然有葛豪这一亲部队驻非湖南，粮饷完全由湖南

担任。这就说明了谭、吴之间的关系异乎寻常。

赵恒惕得了陕西陈树藩的三十万元(一说五十万元)，即出兵攻打湖北的王占元。吴佩孚命肖耀南率军援鄂，赵恒惕被击破，在岳州吴佩孚的兵船上订了城下之盟。赵和吴佩孚并无深交，吴对赵其所以肯手下留情，据说是得到谭延闿的暗助。有人说：谭第三次督湘，被赵取代以后，赵随即派代表致送二十万元到上海，供谭花费。这一次又派人携了十万元送给谭，求谭在吴前为他缓颊。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二日，谭延闿死在南京，吴佩孚从四川送来挽联，联云：“蜀道艰难，巫峡啼猿数行泪；长沙痛哭，衡阳归雁几封书。”其时李肖聃正在治丧处，看到此联，认出是吴的亲笔。从这付挽联，也可以看出谭、吴之间的关系。

### 投 靠 孙 中 山

谭延闿对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认为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革命党。民国成立后，经宋教仁向他详细介绍，才知道孙先生好学深思，一贯主张共和政治。癸丑(一九一三年)湖南闹独立时，谭对人谈及中山先生，虽有所赞扬，但并非衷心推崇和竭诚拥护。湖南独立失败，官僚们弹冠相庆，叫孙中山为“大炮”。这时谭延闿每谈到中山先生，仍是用绰号“大炮”作代名词。

谭延闿第三次督湘时，中山先生派人和他谈：湖南当南北之冲，应起革命前卫的作用。希望积极领导湘军，为民前锋。谭对孙先生的指示，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只是虚与委蛇，私下仍是或明或暗地派代表奔走广西和北京，搞他的见风使帆和投机倒把的手法。结果，两面不讨好，被赶出湖南。谭延闿被逐后，在上海作寓公，时常和杨庶堪往来。杨对谭说：“全国懂得革命的，只

有孙中山一人，你要诚心帮助孙先生，政治上才有前途。”谭正处在四顾茫茫、无处安身的苦境，便托杨向中山先生输诚。恰值杨因事要去四川，就向中山先生推荐谭延闿接替他的秘书长职务。谭才第一次宣了誓，履行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这算是他归附孙先生的开始。

谭延闿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后，一切奉命唯谨，凡是孙先生交办的重要文件，谭都亲自拟稿。有一天，孙先生接到康泉(南湖)一封信，请他为良弼祠题一幅楹联。孙先生大为愤怒，对谭说：

“反革命想拉我和他们做配享，真是做梦！我们革命为民权为公理，许多同志牺牲了，还没有来得及表扬，却要我为反革命题联，他们的无知妄想，深堪痛恨！你代我拟一封回信，教训教训他们吧！”谭随即拟了一稿：“米函具悉。独以宏愿为良弼建祠，伟笃故人，足征深厚。唯以题楹相委，未敢安承。在昔帝王常表一姓之忠，为便私图之计。今则所争者为民权，所战者为公理，民权既贵，则民权之敌应排。公理既明，则公理之仇难恕。在先生情殷故旧，不忘麦饭之恩。在文则素昧平生，岂敢雌黄之素。况帝毒未清，人心待振，未收戡政之骨，先表武庚之顽，深恐惶惑易生，是非滋乱也。看宝刀之血在，痛及先民，临书墨而心伤，难望我见。有方台命，敬乞鉴原。”<sup>①</sup> 这封信明明白白是开教训的，许多人见了都说：非孙先生的坚强意志，不能站稳自己的革命立场；非谭延闿委婉圆转的笔墨，不能写出这样的骈四俚六的书札。可怪的是，康泉接到回信后，拿把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诸人

---

<sup>①</sup>据有关资料记载：孙中山复函南信遗老康泉，拒绝为宗社党人良弼祠题联，系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

看了，都认为民党领袖既有回信，就是殊荣，居然登载在精印的良嗣纪念册《地老天荒录》中。

### 效忠蒋介石

国内军阀混战时，有人品评当代人物，指出：吴佩孚是“刚愎自用”，因为吴处事任性，从来不肯采纳旁人的意见。段祺瑞是“刚愎他用”，因为段把大权交给小徐（徐树铮），任小徐去胡作乱为。而谭延闿则是“柔愎自用”，因为谭对人从不表示自己的意见，和人家谈话，总是顺着人家说话，好像他很能接受人家意见似的。其实，他心中有数，结果总是照他自己的意见行事。

蒋介石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和谭延闿的柔愎自用碰到一起，一刚一柔，互相利用，从无冲突。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〇年，从未发生过彼此过不去的事。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时，蒋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谭任第二军军长，第二军的一切都是受蒋控制的。宁汉分裂时，谭和蒋始终保持暗中的联系，这是人所共知的。谭延闿任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实际上作了蒋介石的傀儡，也是人所共知的。

所谓宁汉合作，谭延闿就是当时的轴心。谭对蒋的反革命，不是不知道。只因“臭味相投”，所以一拍即合。

在谭延闿任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的几年中，蒋介石反革命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有人向谭进言，应加纠正，谭付之一笑，反而替蒋涂脂擦粉，文过饰非，以换取蒋对他的信任。谭延闿效忠蒋介石，为时最长，作恶更多，是罪恶滔天的独夫蒋介石的得力帮凶。

### 谭延闿其人

不学无术 谭延闿出身科甲，对科场制艺和封建典籍，有着

一定的造诣。可是当谭从事政治活动，已是反封建的时代了。作为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时应当具备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知识，那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知识，他却一窍不通。谭在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中厮混过很长的时间，并且窃居首要地位，从未发表过有关政治经济的文章和稍有像样的讲演词之类。柳聘农曾讽之为“不学无术”。有人说谭的一生，“书非三代两汉不读，官非迭任、特任不做”。我亲耳听到谭说过：“要我像谭复生（翼同）那样，洋书也读，‘帮书’（指帮会的“海底”、“香堡”之类的小册子）也读，我办不到。我曾试读过，读不进去。”还听说过：“见事行事，书有什么用！”追随谭将近二十年的吕慕第也说过：“畏公从不在摩登书中找材料，而他的经济才是无与伦比的。”所谓“见事行事”，所谓“经济才”，无非是长期从他的大官僚家世和封建典籍中所吸取的，以及他自己长期在官场厮混所积累的那些投机取巧、尔虞我诈之类的肮脏东西。这就决定了谭延闿在革命阵营中混不下去，必然要背叛革命，滚到反革命阵营，则头头无道，官居极品。

**相信迷信** 谭延闿迷信旧社会的看相和算命。他常说：“命里有，终须有；命里无，莫强求！”他认为人生富贵穷达都是命中注定了的。又说：“命运相连，才起作用。”在宿命论的基础上，加上他的那套处世和做官的运用，就可以飞黄腾达。从这个侧面，也暴露了谭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官僚的嘴脸。

**擅长书法和影戏** 谭平居无事时，喜欢写字，师法颜真卿，变体学钱南园。中年以后居高位，还写字当作消遣，有求必应。他的墨迹，流传甚广。还擅长封建社会和官场中的文牍。封建遗老们誉之为“写作俱佳”。他的作品，旧时颇为收藏家所珍视而加以搜罗。

**好吃能饮** 谭以好吃著名。家里雇佣名厨多人，经常宴客。有所谓“组庵鱼翅”、“组庵豆腐”等名菜，在官僚和商贾的酬酢间，脍炙人口。谭常说：“嫖、赌、吃、喝，人生四大嗜好。嫖赌同我无缘，吃喝在所不辞。”谭善饮，酒量很大，饮的是绍兴花雕。宴客时，频频干杯，从不拒绝。饮到微醉，更是谈笑风生，笑话连篇，从不涉及正事。有人企图利用他酒醉，从醉后露真言中获得一些政情，无不以徒劳告终。

**浑号水晶球** 谭在旧社会的官场中，厮混了几十年，总算是官运亨通，失意的时候少。谭是精通仕宦之术的，靠的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即是他所自诩的“见事行事”。有人说谭擅长“混”，以“混”起家，靠“混”升官。谭的为人，貌似浑厚，心实险诈；外表迟钝，内却机敏。所谓“混”，仅是谭的应付环境的表现，也是他生平对付官场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诀窍所在。曾记得一九一二年在长沙，某天，贝允昕（浏阳人，律师，刘人熙的女婿）走访谭延闿，谭问贝：“近来怎样？”贝说：“混”。谭大笑，接着说：“好！鱼龙混杂是混，仙女游戏也是混，混之用大矣哉！可惜混世魔王程咬金、混江龙李俊混得太粗野一点。若象《聊斋》上的马二混，混得多有意思啊！”谭所说的“混之为用大矣哉”，顿时传遍长沙，远及京沪，成为当时宦途中的“处世名言”。谭的一生，既以善混见称，遂博得了“水晶球”的浑号。谭死后，上海某小报还披露了署名“解组”的一付挽联云：“混之为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的本能滚而已，滚去滚来，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寥寥几句话，可以概括谭的一生。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于北京

## 孙中山、黄兴来往书信

编者按：一九一四年夏，孙中山、黄兴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东京，酝酿改组国民党，再次掀起反袁运动。在讨论组党问题时，彼此有书信来往。一九一六年五月，黄兴由美国回到东京，孙中山在上海有函致黄兴，托宫崎寅藏转交。这里录载的孙中山的三封是原函，黄兴的一封是偶用日本美浓纸写的信稿，无落款及日期，依孙中山的两封信推测，当写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原件由湖南省政协黄一欧副主席收藏，一九六一年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时送交政协全国委员会，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我们这次系根据黄一欧先生保存的原作图片录载。并对其中个别漏字及人名、事件作了简注。标点符号是我们加的。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一、孙中山致黄兴书（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克兄鉴：来示悉。所言英士(1)以兄不入会(2)致攻击，此是大错特错。盖兄之不入会，弟甚满足。以宋案发生之后，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第二次失败后，兄仍不能见及弟所主张是合，兄所主张是错。何以言之？若兄当日能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功，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及借款已成，大事已去，四都督(3)已革，弟始运动第八师营长，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又为兄所阻，不成。此等情节，则弟所不满于兄之处也。及今(4)第三次，弟欲

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之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于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以遂生平之志，以试生平之学。今在筹备之中，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禁止兄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绝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之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此等流言，由兄部下言之，确确有据。此时虽无大碍，而他日事成，则不免生出反动之力。兄如能俯听弟言，竭力禁止，必可止也，则有赐于弟实多矣。

至于英士所不满意于兄之事，多属金钱问题。据彼所称：上海商人尝言兄置产若干，存款若干。英士向来皆为兄解辩云，断无此事。至数日前报纸载兄在东京建造房屋，英士、天仇<sup>(4)</sup>皆向日友解辩，天仇且欲写信令报馆更正。有日人阻之，谓不可妄辩。天仇始发信问宫崎<sup>(5)</sup>，意以为必得否认之回音，乃与该报辩论。不料宫崎回信认以为有，二人遂大失望。并从而生出反动心理，以为此事亦真，则从前人言种种亦真矣。尚俱真的，则克强岂不是一无良心之人乎，云云。英士之此种心理，就是数日间所生者也。如兄能以理由解释之，彼必可明白也。

以上则兄与英士互相误会之实情也。乃忽牵入入会之事，则甚无谓也。且金钱之事，则弟尚不在意，有无弟亦不欲过问。且弟以为金钱之于吾辈，不成一道德上良心上之问题，不过世人眼浅，每每以此为注意耳。今兄与英士之冲突在此点，请二人见面详为解释便可，弟可不必在场也。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

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此复。

孙 文

五月二十九日

## 二、黄兴复孙中山书（一九一四年）

接读覆示，因来客众多，未即裁答，殊为歉念。今请露肝胆披心腹为先生最后一言之。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即以用兵论，忆最初弟与先生曾分电湘粤两都督，要求其同意，当得其覆电，皆反覆陈其不可。今当事者俱在，可覆询及之也。后以激于感情，赣省先发，南京第八师为先生运动营长数人，势将破坏。先生欲赴南京之夕，来弟处相谈，弟即止先生不行。其实第八师两旅长非绝对不可，不过以上海难得，致受首尾攻击之故。且先生轻身陷阵，若八师先自相战斗，胜负尚不可知，不如保全全城之得计。故弟愿以身代先生赴南京，实重爱先生，欲留先生以任大事，此当时之实在情形也。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但弟自抵日以来，外察国势，内顾党情，鉴失败之主因，思方来之艰巨，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纳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

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画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今先生于弟之不入会以满足许我，虽对于前途为不幸，而于弟个人为幸已多，当不胜感激者也。惟先生欲弟让先生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至云弟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云云，弟自闻先生组织会时，即已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弟并未私有所标帜以与先生异，故绝对无部下名词之可言。若以南京同事者为言，皆属昔日之同志，不得谓之部下。今之往来弟处者，半多先生会内之人，言词之有无，弟不得而知，当可为先生转达之。又英士君之攻击于弟，弟原不介意，惟实由入会问题，则弟不肯受。今先生既明其非是，弟亦不问，听其所为而已。国事日非，革命希望日见打消，而犹自相戕贼若是，故日来悲愤不胜。先生今力任大事，窃附于朋友之义，有所谏，终望采纳，不胜幸甚之至。

### 三、孙中山复黄兴书（一九一四年六月三日）

克兄鉴，长函两悉，共感盛情。然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若兄分途并进，以行暗杀，则殊碍吾事也。盖吾共利袁之生而扑之，

如兄计画成功，袁死于旦夕，则吾之计画必坏。果尔，则弟从此亦不再闻国事矣。是兄不肯让弟以二年之时间，则弟只有于兄计画成功之日，让兄而已。此复。又，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幸甚。

孙 文

六月三日

#### 四、孙中山致黄兴书（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克强我兄大鉴： 临

兄邈返东瀛，甚慰。甚欲

兄来共商种种，固尚有所事，未果。兹有要件求

兄臂助，本拟电告，惟各情非简单之电报所能尽，故谨托宫崎兄代达。

至最近国情及弟所主张图谋者，请撮其概要述如下：

一、袁氏尚有负隅恋栈之志。一面为缓和人心之计，如提议妥协停战等事，一面则嗾起北方军人为自保保袁之密函。日夜谋借外债，不能偿其希望，则欲实行纸币政策，以企财政持久，从事战争。津门消息，早传彼作退位准备，而北京探报，则至今不特袁氏无此种意态，即一般官僚顽迷如故，自信甚深，即段祺瑞亦然。段组内阁，而财权完全为梁（c）所把握，即实权仍在袁氏。可知谓段能踵袁往日故事，以袁迫清者迫袁，未免去事实太远。此时就彼一方，并无比较的乐观。

二、冯（f）本与段、黔约，使先发而后应之。其时，冯曾予知袁偕帝密谋，倘能不失败。滇、黔起义，冯得信后自京，实受

唐、蔡<sup>(8)</sup>之賜。顧其態度始終曖昧，以口頭與滬上諸人接洽者，則皆可聽。而事實及書面之發表，則迥然相反。近有南京會議事件，或受袁之愚，作保袁之計，或謀自保而團結一神勢力有所覬覦，均未可知，要之，此輩衷情叵測，決不能與南方同其步調。故現時滬上諸人亦漸覺悟，認為無甚希望。

三、弟到滬後，決定贊助南方，共同討賊。九企西林<sup>(9)</sup>能統一各省，以對內對外。近察情勢，則西林地位亦至艱窘。云、貴既不尽同情，而西林勢發毒甚于張勳。西林或迫于事勢，不能不姑息彌縫。然先與龍<sup>(10)</sup>提挈，以臨民軍，各派俱不能俯首听命。岑、龍乃會銜出示，謂北伐編師，限于有六米里八、七米里九槍，及每槍配足子碼百枚者，否則遣散。又其原為地方軍隊多團者，要復其旧，不得應選民軍。有不遵从此命令者，合力剿辦。弟于十二三兩日電岑，告以已飭執信、仲元<sup>(11)</sup>所部改換旗幟，取一致行動，并戒此後與龍毋相攻击。又與青木、松井<sup>(12)</sup>商定，為我軍購械，編作北伐，由溥泉、孝懷、飲甫<sup>(13)</sup>電岑，請認許。事過一周，尚無復答。即弟前致云貴兩廣之通電，云貴已復，而岑亦不答，令人愛莫能助。龍氏在粵積惡，粵人恨之甚于袁氏。龍甚險詐，自岑到粵，龍勢轉張，蓋名义上有所凭借。且托同北伐，据有省庫，更廣招兵，專力對待民軍。事体稍妥，龍必反戈。其次亦為南面張勳，而斷不能如岑所期望。岑僅帶有桂兵二千，肇慶李耀漢<sup>(14)</sup>有十五營，而李則人盡可屬。敵弱廣都司令及護軍府根本極薄弱，可忧，周孝懷等皆知之。

四、滬上形勢最為重要。英士于肇和事件<sup>(15)</sup>失敗後，迭遭挫折。同時惕生<sup>(16)</sup>亦經營進行。顧前此不能為一致之行動，故常有積極的無形之衝突，兩難奏效。弟到滬後，各人感情漸洽，方與惕生謀合辦方法，而英士慘遭不測矣。英士死後，所創必大受影

响。但冀将来由惕生专任歼彼杨、卢〔17〕二贼，事当有济。然军队运动已久，而屡不得力，其卑劣之观望，正未易破。冯在南京，为阴为阳，卢、杨益有所恃，其部下更难决心。大抵民党他方无特别之势力发展，则沪事急遽无好希望也。

綜上情形，大局殊未易定其归宿。欲求达共和之目的，倒袁为必经之路，而吾人达到与否，视倒袁经过之事实如何。若民党势力只如目前，即侥幸以何等妥协了局，则必比前此之南北议和为更不逮。已往将来，中国问题实为新旧之争。换言之，则为民党与官僚派之争。其孰胜，即为国家治乱所系，孰胜孰败，则视彼此之团结如何。民党以主义、政见为团结，官僚派以金钱饭碗为团结。主义虽同，而政见或异，民党性质本来不好苟同，故时有参商。官僚则惟利是视，反为不可破之团结。已往之历史，已足教训吾人于将来。是以弟熟思审虑，但求贯彻吾人之主义，而宁牺牲一切之办法，求最大之团结力，以当彼官僚一派。近与各派接洽，幸亦俱无何等意见，盖皆知大敌当前，不宜立异。此亦为前途一线之曙光（其间各与疏通，则溥泉、亮畴〔18〕之力为多）。然武力之发展，此时尤不容缓。统观全局，独由东方面有可为之基础，且可即时布置。合觉生〔19〕与吴大澂〔20〕等兵力，有二千余枪，已占领潍县、周村等处，进战退守，均有依据。若能由此益进，则扼北方之咽喉，不难转移大局。惟靳氏〔21〕尚能支拒于济南，吾人武器不足，即须为之加增。并就此招募人士，训练成军。假有二师（二师之中下级军官，已略有准备），可以攻齐鲁而迫燕赵。弟经以借购军械之事，与岑木、松井商量，伊亦赞可。惟此事重大，外交上须有种种之手续。此时兄尚在日本，惟兄足以助成此举。并拟以兄、弟二人名义，提出请求，须得同意认可。吾人积多时之公心，为所发舒，固急欲一当袁氏，而与南方相联并

进，亦惟此着最为有力。机局紧急，袁系方张，民党元不相提携之理。况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违之感情，弟信兄爱我助我，无殊犹日。此事成否，关系全局如上云云，望兄以全力图之。事有把握，仍企来沪一行，共商进行各事。东京究隔膜，即弟亦颇恨到沪之迟也。余事更托宫崎面达。专此，即颂

近安！

英士兄以十八日下午五时被刺，系在萨坡路十四号山田家会客。先两日，英士病颇剧，杜门，而是日则约有两处人相见。第一起为刘基炎（说出），为鸿丰煤矿公司西华人一日本人，坐顷，更有二人入。坐客兴辞，英士亦起身，客即以枪击英士头部，立倒地。丁景良、吴忠信、萧纫秋、余建光在外室闻枪声，闯门欲入。数响手枪乱放，丁景良亦中枪，余人走避。凶手等且放枪且逃，丁、吴从后追呼。凶手等本乘汽车来，此时汽车夫先走往捕房报，故获得凶手许国霖。又一凶手王介凡，则跪于道，或云自杀，为①云其伙杀似灭口。维获李海秋一名，则介该公司与英士交涉，而是日同来者也。李与日人供云不知惜（日人亦可疑，然此时未捕）。李海秋与王介凡为英士素识，许国霖与一程起鹏则是日始问姓名。许被获，已认凶手，并云王程李皆凶。王已死，程未获。李之介绍鸿丰公司人来，谓有矿产将抵押与中日实业公司，借五十万，而请英士担保，可借二十万与革命党。英士固常闻人云，鸿丰为侦探机关，然不料其有大不测之举动。且见沪事再失败，前费巨款无效，谋再起，因急筹款，则姑与接洽。事变突起，未尝防备。闻捕房查得是日到者十六人，把门守路者皆持

---

①当作“成”。

枪击人，盖非寻常暗杀事件可比。英士头中一枪，颊中两枪，故登时殒命。丁景良伤腹旁，非要害。一厨人伤手，一下女伤耳，均轻微。一曹姓同志伤手臂。英士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国民党不可多得之人，年始四十，遽被贼害，伤哉！数年来，如宋钝初、范鸿仙、夏之麒俱为逆贼胸凶刺死，今又继及英士。君子何厉，天实仇之，令人生无穷恚忿。

孙 文

五月二十日

注 释：

(1)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

(2)指加入中华革命党。

(3)指湘、赣、皖、粤四省都督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

(4)戴季陶后改名传贤，字天仇。

(5)见本书载一版《辛亥革命杂忆》一文。

(6)梁士诒号燕孙，广东三水人，北洋军阀交谊系的首领。

(7)江苏都督冯国璋。

(8)唐继尧字蓂唐，云南东川人，云南都督；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9)岑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时为滇、黔、桂、粤四省护国军军务院特派军长代理抚军长。

(10)广东都督龙济光，字紫丞，云南芒白人。

(11)朱执信，即朱大符；邓铿字仲元。

(12)日本驻沪武官青木宣纯海军中將。松井为其属官。

(13)张继字鸿猷，河北沧县人；周善培字孝怀，四川人；温宗尧字钦甫，广东台山人。

(14)李耀汉，广东新兴人。

(15)钮永建字惕生，江苏上海人。

(16)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五日，革命党人策动在上海的肇和兵舰起义，炮击上海制造局，放火。

(17)杨善德，袁世凯委派的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字子嘉，山东济阳人，第十师师长兼淞沪护军付使。

(18)王龙惠字亮畴，广东人。

(19)居正字觉生，湖北人，孙中山委派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

(20)原属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后改称山东护国军，自任都督。

(21)山东都督靳云鹏。

## 黄兴诗、词、联选

### 咏 鵬<sup>①</sup>

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  
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  
一去振沧海，高扬摩碧穹。  
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

### 挽刘道一烈士<sup>②</sup>

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沁中原侠骨香。  
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  
嗷嗷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  
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

①载《黄克强先生荣哀录》，一九一八年三月出版。据黄一欧云，此诗为黄兴吉年时在两湖书院作。

②据刘氏后人影印件，原题为“挽道一弟作”。刘道一，湖南衡山人，生于一八八四年。一九〇三年在长沙加入华兴会，后赴日本留学，一九〇五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一九〇六年冬奉派潜行回国，运动军队，重整会党。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刘道一在长沙被捕下狱，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二十二岁。

## 西乡隆盛墓前①

八十子弟甘同冢，世事唯争一局棋。  
悔铸当年九州错，劝王师不扑王师。

## 为宫崎寅藏书条幅②

妖云弥漫岭南天，凄绝燕塘碧血鲜③。  
穷图又见荆卿苦④，脱剑今逢季札贤⑤。  
七日泣秦终有救，十年兴越岂徒然。  
会须劫列金蛇日，百万雄师直抵燕。

①载《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东京平凡社1976年版，693页，原题为“南洲墓前诗”。一九〇九年一月十一日，黄兴与宫崎寅藏自神户抵鹿儿岛，谒西乡隆盛墓。西乡隆盛（1827—1877），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家，号南洲，萨摩藩士出身，倒幕运动的参加者。明治维新时期，领导倒幕联盟，推翻江户幕府，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专制政权。一八七七年被萨摩军武士推为首领，举行叛乱，兵败自杀。

②影印墨迹，载《宫崎滔天全集》，第三卷。一九一〇年春，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宫崎寅藏乘机运动长谷川大将，向陆军大臣寺内正毅铺张中国革命党势力。寺内派其亲信儿玉右二随宫崎赴香港，调查中国革命党情况。是年五月，黄兴由新加坡到香港，与寅藏欢聚数日。宫崎临别时，黄兴书赠此诗。

③作者自注：“庚戌正月广州之役，倪浑（映典）死于此。”

④作者自注：“北京炸弹案，指卫，复生被陷。”

⑤作者自注：“君与道南君南来。”道南，即儿玉右二。

## 和 譚 石 屏<sup>①</sup>

怀锥不遇粤运终，露布飞传蜀道通。  
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  
惟我年来频败北，马崩毡拜敢称雄。

## 贈 宮 崎 寅 藏<sup>②</sup>

独立苍茫自咏诗，江湖侠气有谁知。  
千金结客浑同事，一笑逢君在此时。  
浪把文章震流俗，果然意气是男儿。  
关山满目斜阳暮，匹马秋风何所之？

## 三十九岁初度<sup>③</sup>

升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罢不如归。  
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  
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①载《黄克强先生集哀录》。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前，谭人凤（号石屏）奉黄兴之命，奔走两湖，策划起义活动。

②载《黄克强先生集哀录》。武昌新军起义，黄兴到武汉，任战时民军总司令。后离汉东下，于镇江与湖江西上之宫崎寅藏相遇，宫崎随黄兴一道到上海。据黄一欧云，此诗当作于此时。

③载《黄克强先生集哀录》。一九一二年四月，临时政府北迁，黄兴任南京留守。六月辞留守职。十月二十五日，由上海乘楚同舰启程返湘。是日适为农历九月十六，黄兴三十九岁初度，乘舰夜航江心，斐然有感，因赋此诗。

### 题林文烈士遗集①

汉上风云纪后先，中原光复倍凄然。  
不知何处接弘血，祇剩遗编是昔年。

### 祝湖北《民国日报》②

一九一三年元旦

万冢箫鼓又喧春，妇孺欢腾楚水滨。  
伏腊敢忘周正朔，典尸犹念汉军人。  
飘零江海千波谲，捡点湖山一语新。  
试取群言问兴废，相期肺腑副天民。

### 吴淞退赴金陵口号③

一九一三年七月

(一)

东南半壁锁吴中，顿失咽喉罪在躬。  
不道兵粮资敌国，直将斧钺假奸雄。  
党人此后无完卵，民贼从兹益恣凶。  
正义未伸输一死，江流石转恨无穷。

①载何伯言编著：《黄克强》。

②载《黄克强先生荣哀录》。一九一三年元旦，黄兴在汉口接任汉粤川铁路督办，同月底即辞职赴沪静居。

③原载《民国杂志》第一期第六号。一九一三年七月，黄兴到南京，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誓剿讨袁。旋以讨袁军事失利，离宁赴沪。

(二)

诛奸未竟耻为俘，墓土重来共守孤。  
岂意天心非战罪，奈何兵败见城屠。  
妖氛煽焰怜焦土，小丑跳梁拥独夫。  
自古金陵多浩劫，雨花台上好头颅。

亡命美洲太平洋舟中作①

一九一四年七月

口吞三峡水，足踏万方云。  
茫茫天地阔，何处著吾身？

由美洲归国途中口占②

一九一六年五月

(一)

太平洋上一孤舟，饱载民权与自由。  
愧我旅中无长物，好风吹送返神州。

(二)

不尽苍茫感，舟行东海东。  
干戈满天地，何处托吾躬？

①据薛君度复制件。②据黄一坎抄件。

## 赠进藤先生①

沧海横流漫九州，问群谁与证盟鸥？  
而今濯足扶桑后，要到昆仑顶上头。

## 书赠山田君②

岂是前身舒道安，遇人不看鹿皮冠。  
接盃澆酒扑头坐，祇作先生醉黑看。

## 蝶恋花

### 辛亥秋哭黄花冈诸烈士③

一九一一年秋

|          |          |
|----------|----------|
| 转眼黄花看发处， | 回首羊城三月暮， |
| 为喝西风，    | 血肉纷飞，    |
| 暂把香笺住。   | 气直吞狂虏。   |
| 待酿满枝清艳露， | 事败兵成原鼠子， |
| 和风吹上无情墓。 | 英雄地下长无语。 |

①据黄一耿抄件。

②据黄一耿云，此系黄兴书赠日本人山田纯三郎者。山田纯三郎历年赞助中国革命，奔走甚力。其兄山田良政，一九〇〇年与郑士良同入惠州，参与三洲田之役，因失路为清兵所擒被害。

③影印墨迹，黄一耿藏。

## 蝶恋花

### 赠侠少年①

|          |          |
|----------|----------|
| 华舸天风吹客去， | 昨夜晚凉添几许？ |
| 一段新秋，    | 梦犹惊回，    |
| 不记新词句。   | 犹自思君语。   |
| 前道高楼人独住， | 不道珠江行役苦， |
| 感怀定有登临赋。 | 祇恍惺浪推雄铸。 |

### 为蒋作宾(雨岩)书扇面②

谁教失脚下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  
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  
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方知事最微。  
醒便行吟理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 为覃振(理鸣)书条幅③

西风肯结万山缘，吹破浓云作冷烟。  
匹马径寻黄叶寺，雨晴犹数早秋天。

---

①一九一二年三月，黄兴以此词书赠居正，题作，“词寄蝶恋花 赠侠少年也”。据黄一欧云，此词系黄兴于一九一一年广州事败后避居香港时作。侠少年指李沛基，奉黄兴之命，潜入广州，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炸毙清广州将军凤山。

②据黄一欧抄件。

③据黄一欧抄件。

## 东京席上和涩泽清渊翁①

一九一六年六月

莽莽神州付劫灰，红羊苍狗不为媒。  
挥戈未必能沉日，薄海风云盖地来。

## 赴沪为汉阳革命军事题词②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

明月如霜照宝刀，壮士淹油涛。男儿争斩羊  
于首，祖龙一炬咸阳烧。偌大商场地尽焦，  
革命事，又丢抛，都付与鄂江湖。

## 挽花黄岗七十二烈士联③

一九一二年三月

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  
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

---

①据黄一耿抄件。

②载《昆仑杂志》五卷二期。

③据薛君度复制件。

## 挽宋教仁联①

一九一三年四月十三日

前年杀吴稚晖，去年杀张振武，  
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  
我说确是袁世凯！

## 挽林述庆联②

一九三一年四月

风雨无情，落花满地惊春梦；  
江山如故，何日重生此霸才！

## 为萱野长知(凤梨)书联③

满目云山俱是泪，  
一毫荣辱不须惊！

---

①《黄克强先生荣哀录》。

②据薛君度先生云，林述庆，前镇江都督，辛亥克复南京有功。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在武昌被伊乐部赴梁士诒宴，归家即拜，医治罔效。十五日夜身死。弥留时，口喷热血，遗体皆黑。

③据薛君度先生云。

## 为寿元书联①

古人却向书中见，  
男子要为天下奇。

## 为蔡松坡书联②

一九一三年六月

奇字远从千里外，  
论交深在十年前。

## 挽袁世凯联③

一九一六年六月

算得个四十年来天下英雄，<sup>陆</sup>徒逞野心，假筹安两字  
美名，一恣进行，居然登学森公路；  
仅做了八旬三日皇上皇帝，伤哉短命，援快活一时  
话，两相比较，毕竟差胜郭广威。

①据薛君度复制件。

②影印墨迹，薛君度寄。黄兴在书此联时，蔡松坡任云南都督。

③见《黄克强先生荣哀录》。

## 凌容众东游日记

编者按：凌容众，号虞仪，湖南平江人。一九〇五年春赴日本留学。同年秋，加入中国同盟会。因触清廷忌，于一九〇六年冬被驱逐回国。翌年春，与其妻李樵松（日本实践女校毕业）创办平江启明女学堂，凌任外经理，李任监督。夫妇致力教育事业，维护启明女校二十余年。凌容众卒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终年五十七岁。

日记系毛边纸线装本，毛笔书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收存，现藏湖南省图书馆。

这里抄写的是——一九〇五年春东游部分，记载了作者当年从武昌到东京的一段旅行。日记原系农历，编书时加注了公历，以备查考。

甲辰（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公历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二日）

阴雨。上午十点钟，与考取赴日本同学警察四十八人及学普通科四十五人，齐集平潮门外迎队营。南皮宫保<sup>①</sup>莅送江干，警察总办员黄以霖率入行四拜礼，作望尘之状。有热血者，咸以为耻。于纺纱局设茗果，一旬钟久。军乐三奏于堂下，闻海水决决，目见金戈铁骑之现象，令人有远大之思想。同庵有漠然若归西席而悲之慨，诚不解其心何居？吾辈四十八人中，候补府县及佐杂、教官、学生、武弁，色色形形，盖不一也。登舟过汉，已六下钟矣。

十一日（一月十六日）晴。午后六点钟上江永轮。凌研舫、李午云、李凤甫送至江干。九点钟启碇，过黄州又天晓也。

<sup>①</sup>湖广总督张之洞。

十二日（一月十七日） 晴。燥热异常。六点钟到安庆，雷电暴雨。

十三日（一月十八日） 早，自芜湖启碇，午刻到南京。访张莘涧于筹防局。莘涧约在同柳园小饮。旋偕回寓，抵掌畅谭。莘涧赠以诗云：“勉奋搏雷翮，愿从御寇游。消狂凌祭酒，豪迈李潭州。鲲化今伊始，龙争莽未休。腐儒身世感，难解杞人忧。”“同片宜共济，足慰客怀孤。宫阙三山路，车书万国图。学成期玉汝，官美羡金吾（此去学习警察）。好候西归日，取饷贡帝都。”附录于此，拟迟日和之。

十四日（一月十九日） 便道访余雁舲，于小队背晤张伯生。酉刻出城，莘涧、雁舲同送。由城北至下关十数里，枯杨残柳，败瓦颓垣，暮色凄凉，野磷无焰，同见于丛竹间，六朝佳丽地，破坏至斯，而树刚拱把。想见曾忠襄未破南京举火时，断不若是荒凉也。触目伤怀，大有亡国之恨。

十五日（一月二十日） 未刻上江平轮船，莘涧、雁舲送至舟中始别。同学吴壬仙、罗衡荫已由汉附江平轮到，遂得相晤。八点钟至镇江，大雨。

十六日（一月二十一日） 阴。未初，至吴淞口。雾縠望炮台不见，兵船五六艘，横于江心，其中虚无兵丁，望之有腐败死气而已。申刻抵上海，住长发栈。

十七日（一月二十二日） 偕壬仙、衡荫、小溪雇马车游愚园。亭台幽邃，石径逶迤，瘦石撑空，树木葱秀，外国花草盛放，大有春意。羽族有孔雀，有鹰，有雉；毛族有猴，有鹿，有虎。园丁索番银二角，云能使虎戏，持竹竿撸之，虎舞爪张牙，呜呜震耳。困兽犹斗，是岂驯之使戏耶。盖猛为兽长，陷阱既入，人遂得玩而弄之。落阱下石，中国人手段往往如是。门外有猓獬，

已死，而贮之玻璃室，酷似人形，第黑毛茸茸遍体耳。小溪云，五月到沪，曾见其有抑郁若不自得之慨，斯亦天壤间之一似人种类也。彼外人方耽耽欲分吾地、灭吾种而自殖其种矣，而吾人犹梦梦，百年后不若野人之锢闭供人玩弄也，几希！恐欲求为印度之充奴种而不可得也。

二十三日（一月二十八日） 日本邮船名平罗者到岸，同人买船票，拟二十五日启行。晚林邇凡约同壬仙、小溪、薇荫至万年春番菜馆小饮后，到小广寒书馆听戏，十二点钟始回寓。林为文忠公之族孙，名炳华，丁酉拔贡，在京师（大）学堂充教习，此次为京师大学堂派赴日游学者，邂逅于此，遂约同船东行也。

二十五日（一月三十日） 阴。檐雪未融，寒风刺骨。是日午正上日本平罗邮船，小溪、壬仙、薇荫外，一为镇江唐伯元，一为广东邇凡。唐则与小溪同学普通者，林则京师大学堂派赴日游学者也。邮船上等舱价七十元，中等四十七元，三等则十四元六角，此上海到横滨价也。三等舱分为二：一坐中人，一坐日人。中国人共四十人，游学者十之八，余则经商者。湖北派赴日学普通者有五人。

二十六日（一月三十一日） 早七时开船，初经黄海，风景不殊。长江至绿水洋，舟大震荡，不可起坐，呕吐之声，不绝于耳。予晕船，粒米勺饮不敢入口，唯啖生梨以度日而已。

二十七日（二月一日） 下午至黑水洋，舟尤震动，殆元史所谓落漈也。天风海涛，泱泱盈耳，四十人均则被假卧，无能饮食者，足见海军中练一兵目之为难也。

二十八日（二月二日） 天曙抵长崎，口上停轮，关人来验病，中日人分班立，先察中人脉，次西人、高丽人，次及日人，较察中人更详，然无不拱立安详，听其察视，日人可谓有国权者

已。夫三岛仅及中国之一大省，独能于亚洲诸邦首屈一指，中人对之，能勿自伤自怜乎。验病后，开至长崎市间停泊。长崎市四面皆山，秀媚玲珑，若小盆中之点缀草石然。树木葱翠虬曲而不长，布帆无数，出入波间，有若宁波船式者，有若巴陵划子式者。望市中房屋，小而精洁，若中人之扎冥屋，盖无结实意也。市皆背山面水，依山麓层累而成。中国若此等地，悉奔为石田矣，惜哉！九时，同人约坐划登岸，所历街道甚洁，有松、竹、凤尾蕉间植掩映。男子，上等人半西装，平民悉汉族衣冠，女子则尽汉服，长衣不辨。十时，与迺凡、小溪、壬仙、蕲荫至第一楼小酌，楼为福建人所设，堂倌则悉日妇人。市中买菜佣履声轰轰如破竹，而荷担踟蹰者，皆明眸皓齿人物耳。日人男女不平权，至见男子有跪接之礼，非抑太失人权耶！此亦宜改良者也。然日用动作，男女共为，较中人女子无所事事，差胜一筹耳。迺凡复约至清国理事府见卞领事（即前湘抚卞宝第之子）。茶罢，其随员周伯伊偕出游公园（周为广西人，寄籍湖北，公园为人民游览地），园依山而成，古木参差，红梅瑞香，芬芳扑鼻，春意十分矣。道旁有施福多君纪念碑，字刻有古意。左则长崎出产陈列所也。归途经登山学校，儿童百十人，正踢球体操，无介绍不得入。三时回船，四时复鼓轮出口，水浅碧色，不复若昨之震荡。是日，天晴燥热，只可着袷衣，非上海严寒光景也。晚雨，飓风大作，又不复能起坐矣。

**晦日（二月三日）** 自昨日开始，沿岸岛屿，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昨夕所过淡门安别，中国人所传为神仙岛者，无人指视，不识庐山真面也。早七时，抵马关，头入症病如昨，市面依山如长崎，而海港之长过之。日以贫小之困，而铁路、轮船、电线、德律风，处处经营尽善，山水房屋，又若北宋图画，要亦天

然位置也。马关对岸为门司，日邦产煤区也。中日甲午战役，议和订约于此。马关者，中人肉袒牵羊割地赔款之地也。日人由是寝强，中人不肯卧薪尝胆，作沼吴之想，于是遂不振矣，吁！三时启碇，耽搁八句钟之久。天晴无风，海波碧绿，不觉海船之苦也。十时，剪烛书此，中历岁除。除夕颇忘饮酒，无从酤货，船上饭餐，唯白菜、豆腐两品而已。遥想蕪松、菊清手抱田儿，囹圄岁酒，不无儿女情怀也。原定海船至横滨起碇，附火车赴东京，风涛太险，恐太平洋震荡不安，遂与迴凡、壬仙、蕪荪、小溪约同明日到神户，即奔舟登陆，火车一日夜可抵东京也。

乙巳（清光绪三十一年）正月朔（二月四日） 此乙巳岁次之元旦也。晴。下午四时至神户，验病毕，与蕪溪、壬仙、蕪荪、迴凡、均登及学普通五人束装上岸。神户气局堂皇，非长崎、马关所能比也，税关查行客外，有专查手中小皮包者，包纸税一角。中人于外洋物入口，完税无权，海关则仗两人征收，对此似勿伤无国权之苦哉！五时，至田中回漕晚膳，日俗犹古风，席地而坐，纳屐户外。其三层楼阁，明窗净几，洁白无尘，且器具精良，紫铜色火盆，色类饕餮宝炉，茗碗紫壶，亦雅洁。役使番女子，无一不略通汉字，且略识英国之普通语。到此愧言语不通，幸江夏黄子文至，为作舌人。午后十时上火车（二等车去钱七元），子文送至此回船，盖渠于横滨始乘车来东京也。

初二日（二月五日） 晴。行经大府一带，山野田隰，村舍篱落，酷似吾平江形势。其树多松栎，间有枫竹鹤顶红茶花等树，而坡土之麦，油油可覩。申初抵东京，盖十七句钟行一千四百华里，可谓迅速，然犹非急行车也，宿三崎店（店在神田区三崎町）。初，车到新桥，言语不通，幸高野屋人（日本旅店接客人）指引，始投店。

初四日西历二月七日 晴。同小溪见湖北学堂监督宝子升明察，不遇。至安田馆会警务同学裴范青、王韵楼诸人。过森田馆晤唐伯元，迂道至清国留学生会馆一观，局面不阔，而布置颇好。晚回寓。日俗寓客出门，门不加锁，盖贼不开门窃物，可谓文明之盗矣。墙壁均本格纸糊，推侧门，掩侧壁，盗不文明，亦无从防也。道上间有攫物者，亦只施之于外国人为多，亦可谓之爱国之贼。盖日人无论男女无不入学，爱国教育，幼即入于脑经，而牢不可解。又，日人自待甚非，贫富男妇，悉着木屐，屐以木为底，而钉绳作人字式，挟于拇指间，得得而行，若吾国草鞋然。数千年风气，至俭至薄，不一变，此其一征也。而于国家大举，若军士餉项、恤赏，则挥金如土。

八日（二月十一日） 晴。早起改装剪辮，小溪继之。此次鄂中同寅来东者六十人，均结其发于顶，垂角前峙，若猧猧然，固固不忘本也。

## 陈嘉会日记摘抄

按考按：陈嘉会（一八七五——一九四五），字凤光，湖南湘潭人。早年肄业于西湖书院，后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辛亥革命时，从黄兴参加革命活动，曾任临时政府陆军部军法局长、南京留守府秘书长；一九一三年充国会众议院议员，后又随黄兴参加二次革命及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一九一八——二〇年间在广州参加护法国会；一九二三年参加曹锟贿选。一九二六年七月，他同另一湘籍众议员李诗与吴佩孚之代表张其桂密商，谋以所谓“纯粹绅士资格，抱定湘民救湘宗旨”，由北京南下回湘，假借借“南北军急争”之名，进行政治投机。一九三八年张治中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时，成立临时省参议会，陈任该会副议长。

这份日记，原存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系四寸长、二寸宽怀中日记本，用毛笔书写，共六十四本，自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起至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止，最后一本标为九十九本，中缺三十五本，存者亦间有虫蚀、脱页。现已全部散失。这份资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摘抄的，辑录部分主要是有关一九二三年曹锟贿选时期国会活动的史实。摘抄时略去了有关个人生活的琐细记载。日记所涉及的一些人物与籍贯和他们当时的政治面貌，除众所周知者外，均尽所知作了简注，不知者不注。

###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七月十一日 午间往民治社<sup>①</sup>开谈话会。因曹（锟）都连日筹备急选总统，向各省议员分头賄逼，已颇有把握。其赴津、沪议员有多数西面受贿，托其同乡先期电告，便回京投票者。余等

<sup>①</sup>系国会中以孙洪伊为首的一个小集团。

深恐大局将更陷纷乱，特讨论反对办法。议决坚持完成宪法及和平统一之主张。如果直派诚意与民党首领言和，吾等当本公正之意思努力进行，以谋和平之实现；如其不幸发生意外，则吾等唯有坚持第三者之地位，以待最后之解决。

七月十三日 至民治社。闻此次政变发动，乃因靳云鹏提国会查办□□□万元之参战借款案，乃伪云助黎（元洪）二百万元争总统选举，乞其回护。黎甚喜。及黎筹发制宪出席费以为竞选入手，则又语曹部在津者曰：事急矣，黎已着手争下届总统矣，宜速驱之。日夜与张志潭献策于曹锐、边守靖之前。靳、张皆段党，盖密谋阻国会之查办，进而并毁黎、曹及国会。

七月十四日 往太平湖饭店。因十政团今晚约王承斌、熊炳琦、高凌霨于此，将以不可速选总统警告之，遂商议发言之纲要。闻伯简<sup>①</sup>言：张书元<sup>②</sup>等直系议员殊反对余等今晚之宴，谓其贿买京、津、沪议员事大有成功之望。八时半，王、高相继至，熊因病，遣代表来。入席后，余与贡三<sup>③</sup>及胡祖舜<sup>④</sup>相继发言，皆力主完成宪法，从速进行和平统一，不可贿买议员速选总统。余论尤痛切。王、高受感动。王答词已在津时为游移。王寓吴景濂宅，知其受恶空气之传染。果也，大局将不堪回矣。客散，余与贡三、伯简讨论良久，终恐无法应付。余叹曰：此事自关天数，大战一开，四处扰乱，将横尸无算，吾等虽具婆心，终难挽回也。

七月十五日 午间赴王承斌之宴，在座为多数政团之中坚分子。王演说仅敷衍门面，冀和缓吾等反对急选总统态度。同人相

①陈伯简，福建人，众议员。

②张书元，河北人，众议员。

③牟贡三，字琳，贵州人，众议员。

④胡祖舜，湖北人，众议员。

继发言，皆主张制宪与和平统一为先，王语塞。散席后，同人商议定十七号晚在众院小议场开各政团协商会，协商余与贡三所提之查办军警及公民团案。吴景濂初甚反对，继见众议全同，亦不坚持矣。三时与贡三同至伯简处，议定请阎范亭<sup>①</sup>赴沪，由余等作书致伯澜<sup>②</sup>，商议解决大局事。

七月十七日 午后赴宪法会议，不足人数。旋至伯简处与贡三、范亭、李位斋<sup>③</sup>密谈。因直系议员张书元、吕津林<sup>④</sup>、万鸿图<sup>⑤</sup>等借民治社名义，得曹党重贿，欲将同人一齐贩卖，连日反对余等阻止连选及所提查办军警案甚烈。且伯澜今晨有电致张，主张速选；速选办不到，便先行开战，以浙江地方让孙传芳，劝其回闽与齐燮元同时出兵攻浙。此在伯澜虽欲倒安福系而助曹，已太过，殊与和平统一之旨违背，亦不过为金钱驱使，直将其十年来投身民党之历史自行背弃。余等极不直之。前数日，张语伯简，谓伯澜但议言和，乃遮颜面，君等何必实行。乌乎，伯澜竟一变至此乎。余等乃议决，推范亭赴沪为严切之忠告；如执迷不悟，则余等当脱离民治社，以保全人格。晚八时，赴众院小会场开政团协商会，由贡三提议查办军警及公民团，并延长众院会期，以存此唯一合法机关，为解决将来纷争之枢纽，征求同意。议决先请议长开常会，一面推举代表商请政府向参议院提出延长众院会期案，俟参院议决，众院再议决之。余被推为代表之一。阅报，

①阎范亭，字洪起，山东人，众议员。

②即孙洪伊。

③李位斋，山西人，众议员。

④吕津林，陕西人，众议员。

⑤万鸿图，字切干，河南人，众议员。

知中山已复电伯渊，略云：转来仲珊<sup>①</sup>电悉，和平统一宗旨，仲珊既表赞同，乃数月以来所见事实，则乱闽、祸川、扰粤，无不与和平为敌，今兹云云，其觉悟耶，抑敷衍耶？我与人以诚，亦望人能以诚与我交，能逆臆不信，然不直则道不行，主张武力，谁为我首？徒托空言，天下谁能信之？请本此旨，质问仲珊。如实觉悟，则我亦可相谅。中山胸中空洞，与人为善，凡能服从其救民主张者，虽仇亦友，故着眼全在一诚字。惜乎曹虽略知此意，而其左右之鹰犬狐鼠尚无丝毫觉悟也，奈何？

七月十九日 午间因王乃昌<sup>②</sup>自沪来，黄三约往渠宅谈话。闻王云，中山又有第二电致伯渊处，言曹馄如确有诚意，可容纳和议。盖中山亦实苦于环境，战事又穷于筹饷也。上海中国国民党曾发布中山一函，属国会议员一体南下。其实中山原文系“行住听便”，唯留京者必宜奋斗。民八议员张知本乃改为“一体南下”耳。伯渊为张书元、吕泮林、万鸿图等恶化，原主张速选总统，后闻余等反对甚力，恐将舍之而去，则民治注所剩者为卑劣无知之直系议员，遂表示赞同余等之主张。旋交出伯渊致余与黄三书，则云以和平统一为唯一方法，不言及速选矣。阅报，知浙江议员及公民通电，反对国会迁杭迁沪，谓国会所迁之地，即为兵祸所至之地。

七月二十四日 五时，伯渊约往谈大局事。黄三等已先至。闻吴景濂自政变以来，包办总统选举，四处敲詐，已得款约百万元。近更开列其党员及亲友名单，交与高凌霨、吴毓麟，要索京内外高官美缺共七十余。其党员已得交通部高等顾问者二十七人，

<sup>①</sup>仲珊，曹馄字。

<sup>②</sup>王乃昌，广西人，众议员。

每名月薪四、五百元，均倒填去岁年月。凡派遣内外差缺，非先得吴景濂同意不可，俨然以太上阁总自居。前数日，高以其友林大回任农商部次长，景濂愤其未用已所荐之刘奇瑤，拍案骂高。高不能堪，托病请假。吴毓昌谓高曰：选举事大，吴景濂为议长，若与决裂，吾辈对保方负责任不起，昨乃销假。可见景濂之势焰薰天矣。

七月二十五日 午后赴众议院开常会，亦不足人致。旋黄三、伯简、司徒颖<sup>①</sup>、胡祖舜、谭瑞霖等邀余至太平湖饭店，因吴景濂恣欲横行，摆为激动政潮之源，于解决时局殊多障碍，不可不有以遏抑之。商定明日向当局警告勿为所愚。傍晚赴直隶人蔣某之宴，亦民治社社员之亲曹者。散席后，张书元邀往渠宅谈话。张书元与万鸿图要求余等助曹。余与黄三、伯简仍主张以孙（中山）曹（錕）携手实行和平统一为前提，否则当退出北京。谈无结果。本社将有分裂之势。

七月二十六日 午前十时至太平湖饭店，偕黄三、伯简、司徒颖、谭瑞霖、胡祖舜、张佩绅<sup>②</sup>、范鸿钧<sup>③</sup>前往警告吴景濂，属其勿为吴景濂所骗，仍须注重和平统一。吴唯唯而已。午后又同往警告高凌霨。高意亦为吴所苦。余最后告以若和平统一无办法，则余等亦当出京，不复过问。高力求大家维持法局。

七月二十七日 得曹錕致余与黄三电，言另有长电见复。与黄三、伯简等往访颜惠庆谈解决大局事甚久，渠对组织阁尚在考虑中。

<sup>①</sup>司徒颖，广东人，众议员。

<sup>②</sup>张佩绅，众议员。

<sup>③</sup>范鸿钧，湖北人，众议员。

七月二十八日 与黄三、伯简、胡祖舜、司徒颖等人讨论解决大局办法。闻吴景濂反对颜惠庆代组阁，欲以王承斌充任，盖反对与中山谋和，以便易于操纵也。

七月二十九日 午间往黄三处，因伯简前派王乃昌赴保，洛催促议和，王回京约往谈。闻曹錕已再三表示与中山诚意携手，但对段党之卢永祥则决行攻击，已增兵苏皖，令齐燮元主持战事，吴佩孚则骄恣殊甚，不仅不愿与中山议和，且不服从曹。

八月一日 午后往太平湖饭店。旋赴众院常会，又不足人数。因徐世昌、张绍曾为报复曹錕计，均派人宴请议员，以利诱其不出席。而曹部诸人又庸鄙无能，久下筹发岁费，议员见其无力维持，连日赴津、沪者愈多，且制宪出席费亦告罄，明日宪法会议已不能发通告。北京国会殆濒于绝地矣。

八月二日 午后在太平湖饭店。闻制宪经费已尽，吴景濂改为每星期只开会二次，以示节省，但款之有无尚不可知也。安福系人李恩浩日前交贿八万元与吴党人胡鄂公<sup>①</sup>，托其贿正十人（计每人千元，胡独得三万元）赴沪，故连日出京者益多。吴正保胡长教育，以补充现内阁，今忽为此，甚恨之。

八月九日 赴宪法会议，不足人数。四周借黄三、伯简至太平湖饭店。闻此闻连日暗中戒严。有言冯玉祥军队将闹饷者，有言奉天派便衣兵士多人入京，将扰乱秩序者，有言曹錕党欲利用地方糜烂急选总统，如袁世凯民国元年不肯留下纪恩，致使北京兵变。

八月十六日 午后赴宪法会议，不足人数。在休息室见湘议员自津、沪领款回京者八人，赠书彭邦桢<sup>②</sup>，盖开会议员奔聘南京

①胡鄂公，湖北人，众议员。

②彭邦桢，湖南宜章人，参议员。

领款者不下四五百人，不独此间开会不足人数，而滞留沪上者尤少，留沪议员遂责其无耻，言至何时不去当除名。渠等乃致书于彭，责褚辅成、杨潜、邵同、田桐、彭程光、熊易堂、覃振、杨永泰等领款舞弊，黑幕重重。有给千元者，有给千数百元至二三千元者，渠等得款独少，赧颜不回沪。闻褚等得款巨万，种种笑话均闹出矣。同一被金钱驱使，革命云乎哉，谋国会自由云乎哉，真不值识者一哂也。

###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编者按：日记原本标明为第四十册，所记主要系曹锟贿选时期纪事，日记本虽残缺甚多，九月份及十月五日以前缺处。

十月五日（前缺）曹部诸要人自凌晨膳以下均至。入门先赠纪念章。各休息室设备西美，有招待员百余人。自晨□□，遣议员□□□乘汽车四出口出席（下缺若干字）除过百之价无从商议外，拉□□半，凑足五百八十七人，超过法定数六人矣，遂开会。有三人者，由电话中闻已足数，知索高价之时效已过，恐并前所领之五千元支票亦不能兑付，最后亦由六国饭店逃出，踉跄赶至议场，面呈灰黑包，种种丑态，均现于一目之中。余在休息室□民党诸人（缺若干字）曹錕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缺数字）批孙文者仅三十四票而已。六时散会。

十月六日 午后赴宪法会议。协商结果之国权章十七条条文全数通过，并议决民六争执之悬案如解散权等，共五六条。

十月八日 午后赴宪法会议，将宪法全部十三章共百四十一条通过三读会，终究宣告成矣，定双十节国庆日午前公布，会场拍掌欢呼，用电光摄影散。领上星期出席费。

十月九日 午间往武三宅，与民治社干部诸人谈话（缺数字）

常会，议定明日午后行国会第三期常会闭会式，后数日再依据宪法开临时会。闻报，知曹馄定明晨入京就大总统职。自保定至京，沿途戒备，布兵四万，每半里一棚。此间军警当局公布警卫秩序单，有云：车站内站台上由四郊游击大队一营分两层站队，里层面向车站，外层面向站外，不得回视，自西便门豁口至所有沿途地段铺户房屋及各巷口，由提署警厅内緝口各该管警汛警区扎守。盖知临大敌。

十月十日午前九时赴众议院领得宪法印本及宪法成立纪念章，章为民六所制，财政部抵押(于)某银号，昨晚始赎出者，金质做景泰蓝瓷，殊美观也。十时半宣布宪法，十一时半礼成，欢声雷动，在场内用电光摄影，又至场外摄影。进入休息室茶会。十二时庆祝双十节，曹馄入议场宣誓。(同时举行)国会第三期常会闭会式。旋赴民治社庆祝宪法成立欢宴会。宴毕，偕伯简至生生观剧幕。归设色画江山胜览图，纪念宪法。

十月十一日 傍晚，伯简来言吴景濂请组阁。黄三欲得众院议长，托余为力。

十月十二日 闻报，知旅沪议员反对曹馄为总统，并反对宪法，连日鼓动市民为激烈之表示，双十节有最幸旗者，对于此国议员概行诋毁。

十月二十七日 傍晚赴民治社新丰楼之宴，仍为王湘①运动议长也。(报载)中山通缉在京议员电，有令各官查抄家产之语，谭无畏(按，即谭延闿)因通电罚湘议员之在京者各五千元。此在无畏虽是变计敷衍，而中山过于偏激，概从抹煞，以图泄忿一朝，亦是失人心之一端。其历年无成均坐此。黄克强而在，决不肯如此

①王湘，四川人。参议员。

函莽。当时黄时常与中山不合而苦口劝之，劝亦毫不见听，且令其左右攻黄也。此皆余所目击者。

十月二十八日 傍晚赴李燮阳<sup>①</sup>之宴，民党议员到者数十人，讨论对付中山通缉在京议员并查抄家产事。有主张解释者，有主张反驳者，众推余草拟电文。余谓暂可不理，静观数日再说。旋闻在沪议员对此间同人已和缓攻击，拟要求中山恢复民八国会，而彼处人数太少，仍需同人出京。

十一月五日 午间赴位斋之约，至渠宅与伯简、贡三谈话。同时浙籍全体议员请宴，为孙生琦疏通组阁，未及去。午后赴众议院开谈话会。至则议长锁门，自秘书长、警卫长、庶务长以下之职员皆避匿矣。吴(景濂)派便衣暗探三十余人散布室外，众大呼。由川议员王揖唐等招我一人交卫兵看管。吴得消息，知不可久遁，乃于二时后到院。众入场，连座临时坐席二次，以吴党地孽，开会不成。最后吴竟违法挟武装警卫兵冲至议长席，王揖唐、褚辅成<sup>②</sup>、王乃昌等十余人趋拒吴下。吴抗拒，其党相率上，团起格斗。吴乘间遁，一哄而散。在休息室闻在沪议员无款可发，回京者三十余人。晚阅报，知吴景濂向曹錕恳求以通过孙阁为释众议长之交换条件。

十一月七日 午后至俄国代表加拉罕之宴，参观俄民革命六周年纪念典礼，与加拉罕促谈甚久，由吾人转译。傍晚至新丰楼宴客，仍代民治社为王湘疏通选举议长也。席间闻邵瑞彭<sup>③</sup>之惶曹促贿选，乃得安福系六千元、徐世昌一万元。

①李燮阳(伯简)，众议院。

②褚辅成(伯明)，众议院。

③邵瑞彭(伯明)，众议院。

十一月九日 午间往张书元宅，与民治社干部诸人谈话。闻高凌蔚、王毓芝等在甘石桥组织宪政党，邀本社加入，万鸿图、张书元等已自由列名该党。余谓此事宜极慎重，不可自行拆台，抛弃从前之历史。诸人议论不一，未得解决。

十一月十六日 午间往张书元宅，与民治社干部诸人讨论加入宪政党事。诸人皆谓议员入该党者已达五百六十人，因有津贴夫马费之故，将来加入者必更多。本社此时正谋争取参众两院议长，实无金钱可与，抵抗加入，则不得其相助之益，且该党分子复杂，必不能支持许久，本社同人只好暂时以分子名义加入，而仍保全本社名义之存在。如该党能为吾等利用则利用之，到不可利用时，本社固仍自在。余亦不能反对矣，议遂决。午后至众院休息室会集议员二十余人，往吴景濂处索民六欠费。

十一月十八日 午后至伯简处谈。闻近日发见王湘、万鸿图假民治社名义，专谋个人权利，贡三亦不免，万与李筠则更倾轧卖友。余为之大叹。民治社干部不过十一二人，惟伯简最公正而多能，位斋守正而老实，贡三平日较明白而今复若此，习惯之移人真可惧哉。吾国人此时程度实不够办党也。旋因宪政党邀宴，偕伯简姑往一观。至则开始发布所拟(政纲矣)，殊欠斟酌。有人出而反对。一般附势者竟不许其发言。双方争执，秩序大乱，闹出笑话甚多。后见其欲投票举理事，并由贡三出名条，开列王毓芝、高凌蔚、程克及某某共五人，请人照投，余与伯简即退出。

十一月二十三日 王湘勾结王乃昌、李筠、万鸿图等欲硬取本社公积金五万元，为王购买参院议长，余与伯简、位斋极不谓然，诸人粗恶，亦无可如何。

十一月二十八日 午后，因吴景濂仍假行议长职权，发布议事日程，开会议孙宝琦阁总同意案，议员反吴者甚多。二时往观。

入场则两派正在互殴，牵连而及者不下百余人，负伤者约十人，一哄而散，各赴检察厅验伤起诉。至休息室，则闻吴昨日以银二百元或三百元賄买中立派议员助已，共用去数万元。段时并挟警方人员及警卫为助。(下缺一段)旋赴西安饭店，诸人已赴宪政党开会讨论惩吴方法矣。遇伯简，袖出曹锟请余为顾问书，云午间遣张书元托其送交者，因渠与余交亲也，渠已代受，遂不能辞。

十二月三日 午间赴政团协商会之宴。旋伯简来。闻吴景濂挟王承斌之助，连日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署顾问聘书百份及每票千元之支票，运动中立法派议员，准备组织统一党，与宪政党相抗。

十二月五日 十一时得众议院函，吴景濂又发议事日程，定明日开会。旋得贡三电话邀往西安饭店，讨论抵制方法。

十二月六日 午后贡三、谷芝瑞等邀同往宪政党开大会，冀得多助，使吴景濂等开会不成。同人到者二百数十人。议决对于议长问题未解决以前，暂推年长者为临时主席，以便进行职务，并先组织院内行政委员会，即由到会之二百数十人署名提案。

十二月十八日 午后往众议院，则吴景濂已霸占议长席。反对派戴书云、黄翼发言请吴退席，另推年长者为临时主席。吴派纷起反对，欲借反对金佛郎案大题目先行议决，暂置议长问题于不顾，以冀吴混充一次主席，借口大家已承认其为议长。反吴派力争。吴派乃诬指为赞成金佛郎案，大呼卖国贼，吴乘纷扰之际，令其党余绍琴<sup>①</sup>千人丛中提出反对金佛郎案通电稿。吴即急言赞成者请起立，又急言起立者多数，而人声嘈杂，台上台下，集成无数团，多不知吴言何事。吴则大声宣布已议决一案矣。反

<sup>①</sup>余绍琴，四川人，入京

对派胡源汇<sup>①</sup>登台声明，金佛郎案无论何人皆反对，但吴不能主席，须另推主席，依法正式开议，不能由吴派少数人自喊自叫即算议决。吴派即大呼打。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卷入漩涡者约百数十人。吴派薛丹牺、陆昌狼、石凤岐、江瑞自掷墨盒，击破陈纯修右额，血流被面。于是，台下墨盒向吴掷击者纷如雪片，中吴左额，亦血流被面。吴急挥警卫兵三四十人，携刀入场，跳越议席混斗，拳打脚踢，俯仰撑拒，响声四起。景耀月压倒警卫兵三名，夺得肩章二、刺刀一。旋警卫兵将刀夺去，劫去川议员黄翼。吴将门紧闭，其党仍大呼开会投孙宝琦阁总票。反吴派不能出门，退至国务员席者百余人，议席人数已不足。吴令秘书发票给其党徒各二张三张不等。及上台投票，不过五六十人，盖中立派亦恶其蛮横违法，徒闹笑话。其党之懦者且畏祸，皆未投票。吴恐暴露其弱点，将票瓶封存未开，急召照像者拍照全场情形，意谓可以迫辞退至国务员席诸议员。前后左右，连用电光拍照数次。及至演台拍其伤痕时，响声一出，电光坠下，烧伤所雇打手，哭呼倒地，所携小刀并伤腿部，急由警卫兵抬去，一时慌乱哭笑声并作。旋又召检察官当场验伤。检察官某谓皮破血流，系轻微伤。吴愤极，唾其面，批其颊，大骂“混蛋、混蛋！拿去、拿去！”继伤毕、开门，一哄而散。陈纯修等乃验伤。

本日吴派之拼命，其原因有三：一、欲借金佛郎案之紧急乘机窃取议长；二、联络孙宝琦，谋舞弊通过同意案，推倒高凌蔚之代阁，以包庇政府，泄其私愤；三、利用张英华债王克敏查办铜元舞弊案，骗得张款十万元，以金佛郎案推倒王克敏，借其金钱分润同党，团结一气。情形复杂，不惜流血以争之，可哀亦可

---

<sup>①</sup>胡源汇，河北人，众议员。

笑，而国会尊严则扫地尽矣。

十二月二十一日 午后三时因金佛郎案往宪政党开会，由王毓芝、高凌霨报告经过情形，解释并未承认，以后如何应付，均公开讨论。余等议决通电维持众议院从前否决之原案。旋闻吴景濂昨晚乘汽车遁天津，乃议决由议员发通告于下星期一自行开会。

十二月二十五日 晚至西安饭店与同人晤谈。领得昨日出席费百元。得吟秋书，劝余宜乘时作官，盖本五十服官政之言也。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午间至新丰楼，与黄三等宴请中立派新疆议员继孚、张瑞，请其共同维持国会。余草拟决议案云：依照参议院成例，由各省区签定一人组织院内行政委员会，执行院内一切行政事宜，即日由行政委员会依法组织院内警卫。属其以中立派资格提出，向吴景濂派疏通，于数日后先开谈话会，协定，即开大会通过之。旋张书元袖出众院秘书厅庶务员某开单陈诉吴景濂侵蚀众院公款罪据，自去年至今已有百余万元。吴及吴党诸人寓所所用煤斤、器具与吴妻之化妆品等，皆出自公款。去岁在某金店定制最劣之徽章，亦浮报数千元为其妻购金珠宝首饰，其他可想而知矣。最巨者为出席费，每次由政府领出为五百余人之额数，发给者恒不过三百余人或四百余人，计所吞不下五十余万，真堪痛恨也。三时往财政部索欠费，仍无着。共计众议员欠费仅三万数千元，而王克敏不能如约筹付，其理财伎俩，除卖国营私外，实不过尔尔。

####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一月五日 午后赴众议院开谈话会。闻政府已令布众院议员改选期，四月十四日初选，五月十四日复选，系由吴佩孚、齐燮元不照第一届国会延期，而高凌霨复欲利用议员各回本省争第二

届选举，则国会开会不成，孙阁同意案无形打消，渠可改代为署，且逆料未统一前，选举必不成，竟无国会监督，渠与王克敏可为所欲为，金佛郎卖国案其最注重者也。官僚狡狴，诚不可及也。

一月九日 午后赴众院开会。因院内警卫未能改组，乃先开谈话会，由目前所推代表数人报告高凌霨、王克敏单独扣留众院岁费、坚不肯发，并拒绝交涉改组宪警，众均愤愤，认定政府故意拆国会之台，主张即开大会，组织院内行政委员会以便进行一切，推中立派议员万钧为主席。吴派马骥等初欲反对开大会，见众怒难犯，乃要求同时投孙阁票，众允其请。而纯粹政府派议员谷芝瑞、葛庄等坚持应推年长者主席及同时改选议长之议，占据议长席，大闹不休，希冀开会不成。吴派及中立派群起毆之。谷、葛由后门遁出，嗾使警卫长拆断场内电灯线，并擅开议场门，诱走四十余人，而其余之三百余人皆不动，谓今日不得一结果，下次必不能开会，仍闭门点查人数。时场中已黑暗，正议购洋烛，而屋顶电灯忽同，乃议决临时行政委员会组织人等。一面商定行政委员，一面投孙阁票，以二百五十票通过，高阁遂倒矣。孙阁同意案提出已久，从前竭力运动，无苦何穴哉，今因高之弄巧反拙，谷、葛等密横拥高之反动，才收渔人之利。天下事之得失，诚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富贵不可强求如此。

一月十四日 午后过西安饭店答访友人。闻前晚发表之内阁名单，系曹氏强迫孙宝琦副署者。孙极忌王克敏声名恶劣，退而悔愤，昨已辞职不就，遁往海甸。王初以其宠妾小阿凤媚结曹之嬖幸李彦青，取张弧而代财长。此次亦李推荐。李山东人，充公府会计处长兼军才处副处长及平市官钱局总办，与曹有斯滥之缘，公府咸呼为李六，继以其妻所谓六奶奶者与其妹交相感曹，一白之宠，遂冠新华。曹自入府以来，昼夜荒淫，恒十日不见一客，

近患肾亏颇重，盖与黎元洪在位时之纵欲同出一辙。昨见报载，曹遣李至洛与吴佩孚商议要政。吴勃然怒曰：总统习性行动余知之最深，窃疑中央近来政事，总统未必尽知，必有李莲英，安得海其人在也。李惶悚，汗出如雨。以今日所闻，果不诬。闻李系曹之跟班出身，齐燮元、肖耀南、张福来辈近皆与结为兄弟。李所畏者唯吴佩孚一人而已。

一月二十三日 午间至贡三宅与民治社干部诸人谈话。闻公府党决意承认金佛郎案，坚持非王克敏就财长职不可。王恐众院反对金佛郎案之严厉，且提弹劾、查办两案，非暗中消灭众院不可，决定扣留岁费，迫众议员渐渐自散，不能开会。连日行政委员会借索历年关岁费，至今尚丝毫不着，院中茶水炉火均无钱取办矣。官位好险，令人痛愤。午后往众院开大会。因议事日程列有改正众院议员选举法一案，希冀借此延缓新选举日期，暂保旧国会，以便严厉制止政府之卖国。政府大恐，且恐今日通过弹劾案，遂禁使一部分议员不出席，致不足法案人数，乃改开谈话会，议决仍由行政委员会仍认定孙宝琦总理一人，向当力索岁费。在场闻王克敏暂不敢同意，然已暗中在私宅视事，准备借以历年夜之餽款问题，外间传言迫逐孙宝琦，并归咎国会之反王，王乃乘机就职，发帑卖好，以倒危台不拔之基。

# 湖南辛亥革命书录

刘志盛

本书录以湖南省图书馆所藏有关湖南辛亥革命史籍为主，参考其他方面收藏的史籍资料（包括正反两方面的），择要排比，混合编制。并就个人所知，略加论注，借供研究湖南近代史者之检索。凡罕见之书，则酌注典藏处所，以备查考，挂一漏万，识者正之。

《摘叙两湖自立会匪紧急情节告示》 张之洞等撰。木刻本一期。北京图书馆藏。

《自立会始末记》 张薰溪著。稿本一册。著者为康有为弟子，曾参加自立会，记述会中故事甚详。附有唐才常正气会序（按：自立会原名正气会）、会章及自立会会章、安民告示、中国国会宣言、讨贼布告、自立军人物志以及康有为所撰有关自立会文字多篇。

《自立会志士事迹略稿》 赵必振著，稿本。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赵必振，湖南人，曾参加自立会。此稿记当时参加自立会及自立军诸志士行动，较为详尽。

《仁学》 谭嗣同著，民国日报铅印本。湖南省图书馆藏。又一八九九年曾由日本横滨《清议报》印行。其中有关反清的激烈言论，为康有为、梁启超擅自删去。

《谭浏阳全集》 谭嗣同著，一九二五年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

又有三联书店铅印精装本，湖南省图书馆藏。包括年谱、文集三卷，诗集一卷，仁学二卷，笔识二卷及续编等。

《谭嗣同真迹》 谭嗣同著。文操等编辑。一九五五年上海出版公司影印本，湖南省图书馆藏。包括谭嗣同遗影、书简、诗及谭嗣同全集拾遗等。

《陈天华文集》 日本东京刊本。收录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篇，约二十万字。

《陈君天华绝命书(附陈君行状)》 新化自治会出版，有像。

《黄克强先生荣哀录》 黄蔡二公事略编辑处编。湖南省图书馆藏。一九一八年三月版。内分四章：一，事略、遗稿、轶事；二，公电；三，追悼类；四，营葬纪事。有照片。

《黄留守书牋》 新中国图书局一九一二年印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书收录一九一二年四至六月间黄兴担任南京留守时的重要文电、书札、公启、批示等，末附劝募国民捐章程。

《中华大统元帅黄兴历史政要》 古余斋刻本。

《黄兴传记》 刘撰一著，一册。一九二九年京津印书局铅印本。著者原系华兴会、同盟会主要人物，自叙随黄兴参加辛亥革命经过极详，可作为两人的合传看。

《黄克强》 何伯言编著。一九四五年青年出版社印行。

《黄克强、蔡松坡佚事》 天恒生、冬生编。有图。一九一六年上海文艺编译社出版。湖南省图书馆藏。

《蔡松坡先生遗集》 八卷，首一卷，末一卷。蔡松坡撰。一九四三年铅印本。线装八册。湖南省图书馆藏。其内容为：遗墨、传、年谱、国民篇，军事计划，军政文电，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省经界纪要，经界法规草案，杂著、恤令、唁

电、祭文、輓联、碑铭等。

《蔡松坡电讯稿》 蔡松坡著，稿本一册，折装。湖南省图书馆藏。包括：给云南唐都督、贵阳刘都督、戴总司令、长沙袁财政厅长等的六封电报手稿，极为珍贵。

《蔡松坡》 李旭编著，一九四五年青年出版社印行。

《松坡军中遗墨》 一九二六年八月松坡学会重印本。二册。梁启超作序，说明编辑与影印过程。辑入书四通、电稿一〇三通，均系蔡松坡在护国军书牘手稿。书眉有梁启超笺注。

《焦、陈实录》 民权报编，一九一二年三月出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黄蔡焦陈四公事略》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印。收有黄兴、蔡锷、焦达峰、陈作新四人传记。湖南省图书馆藏。

《革命先烈传记》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一九四二年九月初版。书中收有黄兴、宋教仁、刘道一等人传记。

《湖南先贤事略》 傅家圭著，一九四六年三月初版。湖南省图书馆藏。书中收有谭嗣同、宋教仁、刘道一、黄兴、蔡锷等人的传记。

《宋渔父》 徐天复、邵力子、叶楚傖等合编。一九一三年出版。分上下卷，二册。

《宋逖初先生大政见》 宋教仁著，中国国民党印行。内容包括宋教仁对政体之主张五项，关于政策之主张十种。

《我之历史》（即宋渔父日记） 六册。一九二〇年湖南桃源三育乙种农校石印本。北京图书馆藏。又《建国月刊》自九卷四期起至十一卷四期止，分期连载，题为：《宋渔父日记》。此为宋教仁自述其在华兴会与同盟会时代种种活动之重要史料，亦为同盟会成立时唯一存留的直接史料之一。

《宋渔父遇刺记》 一九一三年上海铅印本。一册。

《宋逄初被刺始末记》 沈翰编，一九一三年上海石印本。二册。

《渔父痛史》 一九一三年湖南木刻本。一册。

《桃源痛史》 一九一三年上海铅印本。一册。

《华兴会革命运动史》 张次溪辑，稿本一册。本书所记事实，出自华兴会主要人物章士钊口述。并搜集有杨守仁、陈天华、马福益、黄兴等人有关华兴会革命活动的记载。

《浏阳烈士传》 肖汝霖著，一九一三年铅印本。湖南省图书馆藏。书中收唐才常、唐才中、焦达峰、余昭常、龚春台等人传记。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 杨世骥著，一九五七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铅印本。湖南省图书馆藏。

《武溪杂忆录》 龙绂瑞著，长沙龙氏排印本。本书记载华兴会甲辰起义失败后黄兴避难西园经过和其他有关辛亥革命前的湖南史事，均属第一手资料。

《新湖南》 杨笃生(守仁)著，署名湖南之湖南人。线装一册。共分六篇：绪言，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现今大局之危迫，湖南新旧党之评判及理论之必出于一途，破坏及独立。首卷有湖南全图。一九一〇年日本初印本，一九一三年重印本。

《革命逸史》 冯自由著，共五集，商务印书馆出版。一集《毕永年开发记》、《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革命军起义实录》、《武昌起义与黄克强》，二集《新湖南作者杨笃生》、《猛回头作者陈天华》、《杨卓如》、《丙午靖州禹之谟之狱》、《光复军司令李燮和》、《湖南都督焦达峰》，三集《广州保亚票之革命运动》、《葛陵事略》、《谭馥事略》、《罗澍苍事略》、《曾传范事略》、《黎尊事略》等篇，均系有关湖南辛亥革命史料。

《武昌革命真史》 曹亚伯著。分为前编、正编。一九二八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前编中有关湖南辛亥革命的有：第一章《黄克强长沙革命之失败》，第四章《陈天华投海》，第十章《禹之谟之死难》，第十三章《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第十四章《杨笃生蹈海》，附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杨毓麟、杨卓霖等人遗像。第一章记载华兴会甲辰起义失败后，作者参与掩护黄兴出走的经过极为详尽，属于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正编中有：（四）《九月初一日湖南光复》，（七）《九月初十黄兴、宋教仁抵鄂》。本书其他各节中亦有关于黄兴的资料。

《武昌开国实录》 胡祖舜著。作者原名恢汉，武昌起义后任辎重队第二营管带。本书对华兴会活动、黄兴到武汉督战及湘军援鄂经过，均有记载。

《革命党小传》 上海自由社编，一九一二年刊。收党人传一百六十八篇，附图像。其中湖南人有黄兴、陈天华、禹之谟、杨守仁、李燮和、易堂令、周之贞、焦达峰、陈作新、胡瑛、黄鹄鸣、张振武、杨佳、余昭常等。

《湘事记》 于雁子（唐乾一）编，一九一四年北京正象印书局印。一册。本书分二卷：卷一，起义篇、军事篇。卷二，内政篇、财政篇、商业篇。著者自述其在辛亥八、九月间至武昌，亲身经历湘事始末，于焦、陈被害及谭延闿继任湘督经过，叙述甚详。

《湘路文电辑要》 一九一五年刊。内容为清末湖南人民积极投入保路运动，反对清廷向帝国主义列强出卖铁路权的文牍、电报，择其要者汇为一编。卷首有刘人熙序。

《湖南文献汇编》 一九四八年湖南文献委员会铅印本。共三辑，

二册。湖南省图书馆藏。收有湖南辛亥革命时期人物传记资料以及覃振《辛亥革命起义的回忆》、梁贻时《湖南反正追记》等。

《近代湘贤手札》 龙英溪辑。计有谭仲麟、谭继洵、王先谦、欧阳中鹄、刘人熙、杨毓麟、谭嗣同、唐才常、黄兴等人的书简。覃延阁于每篇末作跋语，所记皆辛亥革命以前湖南近代遗闻轶事。

《故宫辛亥革命南方档案》 原件，藏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馆收藏近代史档案甚多。其中关于湖南辛亥革命前后活动方面者有：（二）唐才常汉口起义档案；（十五）两湖民变及会党档案；（十八）萍浏醴起义档案；（三十二）湖南起义档案，等等。此项档案，均系当时清朝官吏与清廷往来报告请示镇压革命运动之函电，是研究湖南辛亥革命的重要反面资料。

《湖南省志稿》关于辛亥革命及护国之役的史料材料 一九四八年邵阳文献委员会编，复印材料三份。湖南省图书馆藏。

《辛亥革命史料》 陈步舟等撰。一九四八年湖南文献委员会收集。包括：《上前清湖南巡抚余诚格书》、《辛亥革命起义的回忆》、《先叔革命文略》。湖南省图书馆藏。

《岳阳军首义护法始末记》 一九四八年湖南文献委员会收集，稿本一册。湖南省图书馆藏。

《黄帝魂》 一九〇三年在上海刊行。编辑者署名“黄帝子孙之一个人”，据章士钊考证，为善化县人黄藻，字菊人。所收鼓吹反清革命的论述文字，计四十五篇。其中如第三篇《君柄》摘录谭嗣同《仁学》，第二十六篇《新湖南》摘自杨守仁所著《新湖南》，第三十三篇《阅湖南官报》，第三十七篇《庚子年》，第三十八篇《黄二姓》等，均系有关湖南辛亥革命史料。

《中国国民党史稿》 邹鲁编著，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四年增订版。一九六〇年中华书局铅印本。六册。其中有关于湖南辛亥革命的史料多篇。

《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八册。第二册有陈天华各种著作、宋渔父日记(节录)、萍浏醴起义史料。第四册有刘揆一撰《黄兴传记》。

《衡山正气集》 刘揆一为纪念其弟刘道一烈士而辑录编印的专集。

《刘人熙日记》 刘人熙撰，六十一册。湖南省图书馆藏。本日记起于一八七〇年，止于一九一九年二月。著者在辛亥革命前，周历豫赣湘桂等省，辛亥革命长沙光复后，电促王芝祥策动陆荣廷宣告广西独立。一九一五年以后投入反袁驱汤运动。日记中记有关于这方面的活动，均系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

《凌容众日记》 凌容众，号盛仪，湖南平江人。一九〇五年春赴日本留学。同年秋，加入中国同盟会。一九〇七年春与其妻李樵松创办平江启明女学堂，致力教育事业二十余年。日记系毛边纸线装本，毛笔书写。其中有关于辛亥前后的湖南史事。湖南省图书馆藏。

## 编 后 记

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革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政协工作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随着政协各项活动的积极开展，过去被林彪、“四人帮”及其伸进湖南的黑手干扰破坏，而被迫停刊十二年的《湖南文史资料》，在举国上下进行新长征的战斗号角中，又和读者见面了。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在当前大好形势下复刊，是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胜利成果之一。

一九六一年，湖南《文史资料》创刊时，适逢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我们出过两辑专辑，选载辛亥革命时期的史料。这一辑，仍以辛亥革命时期史料为中心内容，选载各种体裁的史料三十篇。主要是本省地方性的史料，有的是与本省有关的全国性史料。在现尚健在的作者中，有十四位年在八十岁以上，最大的今年九十八岁了。大家年老体弱，有的还在病中，不顾身体条件差，写作上有困难，热情撰稿应征，趁此选辑复刊的时候，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热忱希望具有丰富阅历的革命老同志和各界爱国人士，继续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共同把我会的文史资料工作搞好，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作出有益的贡献。

